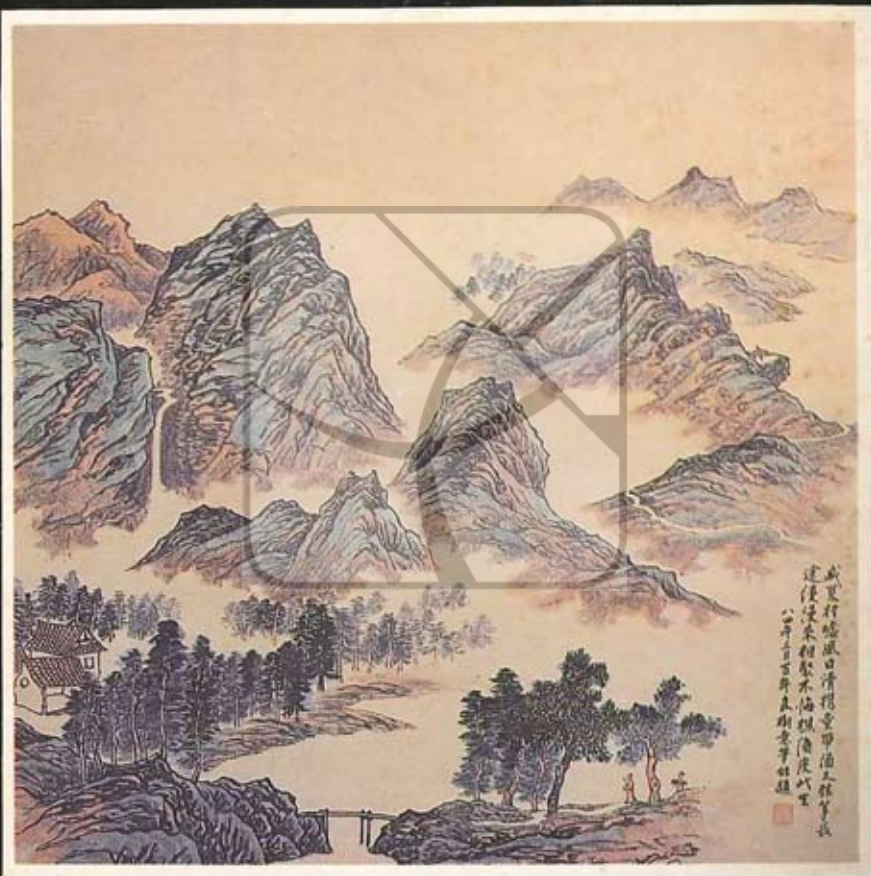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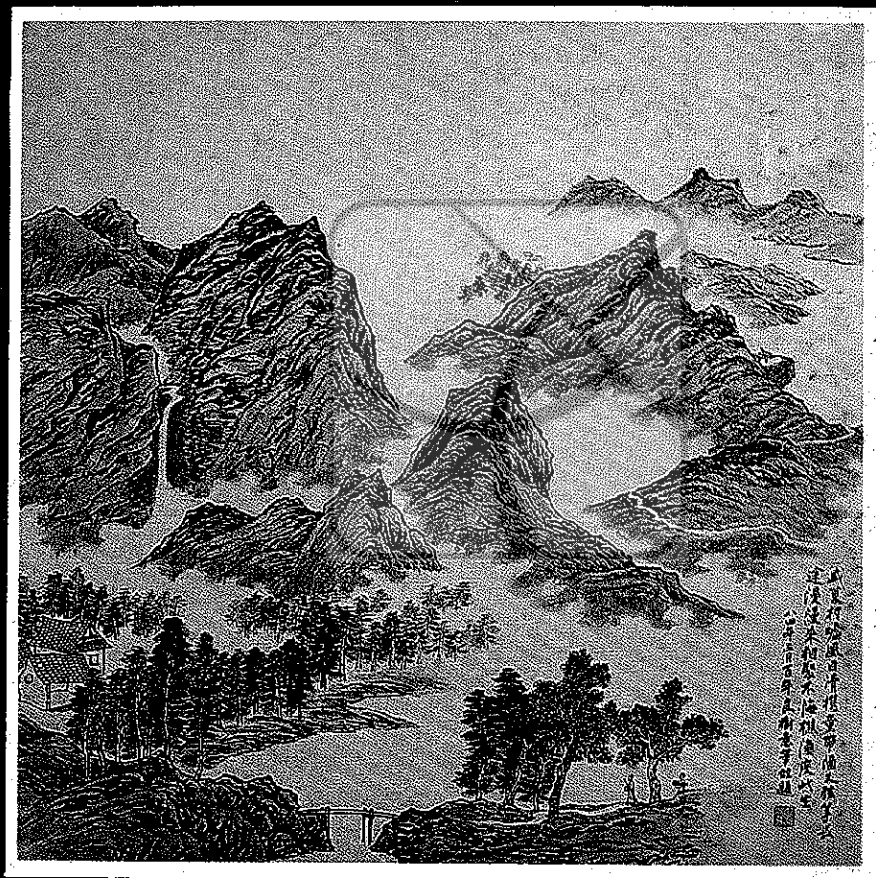
國之中央



鄭百年

蕉風文丛
蕉风出版社出版

國之中央



鄭百年

蕉风文丛
蕉风出版社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蕉風文叢

中央之國



蕉風出版社出版

蕉风文丛

中央之国

出版者：蕉风出版社

Chao Foon Pres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印刷者：马来亚印务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总经销：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1A, Bras Basah Complex, Block 231, Bain Street, Singapore 0718.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一九八五年五月出版

每册定价：M\$3.00

目 录

自序	5
1. 飞临长城脚下	7
2. 香港的山峦和海峡	12
3. 寻根的学会	18
4. 海外亲情	24
5. 千里相思	29
6. 中央之国 (一)	34
7. 中央之国 (二)	40
8. 中央之国 (三)	45
9. 文化协会两年	51
10. 国宝	56
11. 根的文化	61
12. 文人的书房	66
13. 血缘凝聚文化	71
14. 师友记	76
15. 移民·愚民	87
16. 许云樵教授印象记	92
17. 扶桑·汉学	97
附录：1. 第一代知识分子	103
2. 迎接家岳李海萍首次画展	110

自序

打从中学时代开始，对文学创作就怀着无比的热爱，虽然不曾参加过什么比赛、得过什么奖，不过，报章副刊及杂志上偶而也占过一点点补白的小位子。大学时代却有不同的发展，首两年酷爱新诗及小说的创作，后两年完全沉醉到古典文学去；考进研究所后，精力完全集中在学术研究的工作上，把昔日的嗜好完全生坑活葬了。

学术研究并不是一项十全十美的佳事，最起码的缺点是它桎梏了一个人的灵性，让你的才思和情意给枷住了。一九六五年考进研究所以后，整整的二十年来，就一直生坑活葬着才思和情意，生怕“污染”了学术研究，生怕自己的学术研究动了“凡心”。

在人际关系频仍的社群里，尽管你自称学术工作者，应景的文章还是不可没有；就好像你天天闭门从事研究，不管你心甘还是不情愿，偶而还是必须出门应酬，搞到深夜十一、二点才回家一样。在诸多应景文字里，为《蕉风》写专栏是最特出的一个例子；既然对文学创作“六亲不认”，却偏偏要为文艺杂志写文章；既然只承认为应景工作，却偏偏要订期交卷，每月一篇。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发酵酝酿，几次都想“一刀两断”地封笔，《蕉风》的保姆姚拓就说：“以目前华人社会的情形而言，写文章已经是一种责任了。”语重心长，寓意深远，所以只好停停写写、写写停停下去。而昔日酷爱文学创作的那股热忱，就如一缕轻烟、一息游丝，不停地在我的研究方桌上萦绕迴腾，让我时动“凡心”，无法坑尽埋绝。

十多年来，这些应景式的“游击战”，累积起来倒也有点可观。《说因缘》出版于一九七六年，《十年传灯》面市于一九八二年；而今天，《中央之国》又

告献丑了。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受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及台北出席一系列有关家谱研究的国际会议，会后又受日本东京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之召，前往作学术演讲，前后历时一个月。《中央之国》系列的文字，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所写的。我不善作空言阔论，尤不愿艾己怨人，一生仰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洪流里，不是该不该、愿不愿的问题，而是挥不掉、剪不断的文化渊源，使我必有所感必有所思，而这一篇一篇的短文，就是旅途中所感所思的结晶品。

我应该感谢姚先生，以及赖顺裕（川谷）、梅淑贞二位，在他们主持《蕉风》的当儿，让我有机会在严肃寂寞的研究室里，保持一点创作的心火，养活我的才思和情意，使我的灵性不至于“枯槁”“涸竭”下去。但愿有朝一夕，这一点心火会焚燃为一堆熊熊的柴燎。

飞临长城脚下

每次来香港，当飞机瞄准跑道下降时，我总有来到万里长城脚下的感觉。中国，以一片秋海棠的嫩叶的姿态，展开千千如丝的叶脉，托出年年如故的河山，静静地看着我再次飞临她的脚边。除了台湾，这里是我所曾经踩踏过的第二块中国土地；在台湾，要了望万里长城，必须隔着一道风浪险急的海峡，而香港，只要举头北望，中华民族的龙就蛰伏在你北边绵延不绝的山峦上，五千年的烟霞嬗嬗上升，在你北边广袤数千里的山山水水上。

万里长城是一条巨无霸的脐带，哺育着龙的家族的生命。记得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张清徽（敬）教授到美国度长假，这是她第一次远离万里长城，飞出龙的脐带。一年过去，我们到松山机场接机，当她出现在机门时，我们惊怪不已，“老师的头发全白了！”我们都喊叫着。“去国相思！”张老师给我们四个字，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印在脑里。离开台湾，就好像离开维系精神生命的脐带，龙的家族失去那千千的叶脉，宜乎一年而白发苍苍。

飞临长城脚下，与其说是愉快，无宁说是一种负累；余光中从美国而台北，由台北而香港，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了。他在美国时，尽管写过《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也写过《用十七年未履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鹳鸽的重庆，代替回乡》，不过，隔着太平洋，就不如他到香港教书时的真实感受了。在中文大学教书，只要头向北，“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北望），这种真实感，真非隔着太平洋可同日语。你看，他在《九广铁路》里说：“香港一种鉴然的节奏，吾友／用一千只铁轮在铁轨上弹奏／向边境，自边境，日起到日落／北上南下反反覆覆奏不尽的边愁／剪不断辘不绝一根无奈的脐带／伸向北方的茫茫苍苍／又亲切又生涩的那个母体／似相连又似久绝了那土地”；

万里长城简直是一条无情的长辫，永远攀长在他的脑后，抓住他满脑的神经。第二届世界比较文学会议召开时，我在台北遇见他，那时他只五十出头而已，竟然白发苍苍，很有不胜荷负的感觉。对多情的龙的子孙来说，飞临长城脚下，是一种沉重的负累。

对一名在南洋长大的华裔，来到长城脚下，来到龙族的大家庭，似乎另有一种感受。几十年来搞中国古籍和中国历史，两鬓已经白冉冉，如何再有力量像他们一样，载起更多的华发呢？心里虽是这么想，可是，各种各样的感受却像广九的火车，时常北上而又南下地捶击着我，其声如雷，不绝如缕。

谈论中国的问题，报导中国的现况，似乎是香港的一种风气。打开任何报章，扭开任何广播，中国的新闻就如漠北的风沙，吹刮你的耳际，扑向你的面孔；有时风沙钻进你的耳孔，让你恨不得立刻抖出来，不愿意接受它；有时风沙沾进你的眼膜，让你痛得直刺心坎，热泪盈眶，通身瘫痪。在马来西亚，隔着一道南中国海，海宽三、四千哩，另一方面，那里新闻报章的报导大部分都“顾此失彼”，所以，没法感受到这几十年来漠北风沙的酷厉。飞来香港，就等于飞临漠北暴风半径内，不管你喜欢或者厌恶，它就天天吹着你、刮着你。

有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从澳洲访问归来，路经香港，到香港大学来访问。那天下午，我也受邀参加座谈会，就在中文系的讲堂举行。到访的团员约莫十名，各方面的学者都出席，从医学到文学（团长即一位著名女医生，曾为周恩来医过病），从英语语文到考古；和我比较接近的有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教授及民族研究所的李有义教授。李学勤研究的是甲骨文、金文及古文，著作非常多，他和友人合著的《殷虚文字缀合》，我早就拜读过，可谓心仪已久矣。

“你的文章我都读过，你批评得很对！”寒暄一过，他就送给我这么一句话，使我感到惊愕不已。我给了他们什么批评？真使我感到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你们新马出版的学报，我们院里都看得到。”他看我无以待，立刻补充一句。呵，我想起来了，他指的大概是我在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汇刊第二期所发表的那篇论文。在那篇“论帛书本战国策的整理问题”里，我批评古籍的整理

和出版，不应该采用简体字。李先生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们又在摩星岭道新华社招待所见面，我们谈得很晚，话题都是学术研究和文物出土。最刺痛心坎的是下列一段话，“马王堆还出土了周易以及孔子和学生讨论周易的帛书，格于环境，不但不能发表，也不便向外界透露”。马王堆出土帛书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我听到这段话是一九七九年上半年的事，相差已七年，与孔子有关的资料还是一块“禁脔”！政治干扰学术，莫以此为甚；漠北的风沙真是酷厉不情。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我在明报（日报）读到一条这么样的新闻，标题是“孔子故乡开放，文化遗迹修复”，内文首段说：“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诞生地曲阜，已于今天对外国游客开放，孔子曾被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批判，最近恢复名誉。”两天后，又有一条新闻说：“著名的山东省曲阜县旅游区孔庙、孔府、孔林等，从二月起正式对外开放。为了迎接来访的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曲阜县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就组织人力对曲阜县的名胜古迹进行修葺。「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一千多间（座）殿、阁、楼、堂、祠、厅、庑、厢、房、亭、坛、轩、台、榭、门、坊等建筑物，全部修缮一新。孔林的长达十四华里的林墙，以及所有的林道、碑碣、墓葬等普遍进行了修整。孔庙高达三十一米、占地一千八百三十六平方米的巍峨的大成殿，殿前的十根盘龙戏珠浮雕柱石，以及屋上的双层黄瓦飞桶、彩绘斗拱，经过重新修饰，更加鲜艳夺目。”这两条新闻发得实在很滑稽，让你觉得眼前有一位小丑，在向你表演各种滑稽的动作一样。试问，以圣哲如日月之光的孔子，他的名誉还要人来恢复吗？去掉孔子，跟去掉中华文化，又有什么不同？居然有人自作卑贱一至于如此，要清算孔子的思想；居然又有人自作丑态一至于如此，要恢复孔子的名誉！孔子绝对没有叫后人如我们固守他的思想，你们不能活学活用，是你们愚笨之处；孔子思想不合理之处，我们尽可修改，至于说全部要斩草除根去得一干二净，那真是愚不可及。一个人如果必须仰赖辱骂及痛斥圣哲的先人才能生存下去，那么，却也未免太可怜了。

访问中文大学音乐系的时候，我听到另一件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搜集了全中国各地方的地方戏，数目在三千多种以上。在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这几千张唱片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然后全部毁掉。前几个月，民族研究所的学者到中大音乐系来参观，发现这里保存一千多种，高兴得如获至宝，准备派人来研究。

我们居住的伯里基学堂，几乎每个星期都人来人往，各种各样的学者都有；对他们来说，来到香港而不进大陆去走一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甚至有一些学者，就抱着到大陆去走一阵子，才来这里歇歇脚的，比我早到几个月的李培德副教授（语言学家李方桂的公子），就是这种情形。伯里基学堂无形之中，就成了大陆内情的交换所。

“中国五千年的帝制，就好像舞台上失去控制的绒幕，不但收也收不回，反而沉甸甸地把整个舞台遮盖下去……。”

“中国人太驯良了。中国人的容忍力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儒家传下来的那一套道理，难道就是这么样地优柔文弱吗？难道就真的要一忍百忍吗？……。”

只要话匣一打开，管叫你难过，也管叫你茫然失措。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知识份子忧虑的是什麼，我才知道为什么广九铁路的奏曲会催白了余光中的头发。香港，这个到处是人类、到处是石阶的地方，广袤不过几十公里，就挤着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口；曾经有这么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香港要是有地震的话，大家也只好躲在公寓里听天由命，要是全部的人逃出屋子，也就没什么地方可以躲；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走都走不动，还说逃难！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挤到香港来？为什么天天都有“难民”从广东来？

上个月，当我来港开会时，报章及电视天天报导，福建成批的“船民”，纷纷抵达港九海外，准备随时登陆，港署警厅二十四小时戒备，随时逮捕非法入境者。据估计，随后而来的船民至少有三千名。为什么突然从福建飘来这么多船民？难道福建发生了大旱灾吗？报章说，原来邓小平的权力还未能控制福建的军队，福建的军方为了向邓小平施压力，乃向香港借刀——到处造谣，说唐山式的大地震将在福建发生，极力鼓励没有受教育的老百姓夺船向香港逃难，给香港制造困

扰和危机，然后让香港当局派人到北京干涉，给邓小平出丑（据后来报导，香港政府致电北京交涉，邓小平回电说，他对福建船民事件“毫不知情”）。

来香港，天天北望，夜夜刮风，其实是一件苦事。尽管在情感上，这块泥土的地下水和你的血脉有相通之处，这里的山水在你下胎时就印在你的脑际，不过，作为一名知识份子，你的两鬓会有多少华发呢？你的眼眶能承受多少风沙呢？教育，通过教育，提高老百姓的知识水平，也许是当今最好的良策。除了国家兴办教育之外，也应该鼓励及协助民办的教育，试问当今世界的强国，那一个不是从教育着手？那一国不是国民教育水准高超？是为民着想的时候了，难道要让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应验吗？旧约上说：“神看见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呵，愿光暗永远分开，愿北望不再生华发！

四月二十九日



香港的山峦和海峡

品读隽永的名著，必须于文学批评中索得一条适当的途径，往返开发探求，才能得其奥妙内蕴；欣赏奇伟的人物，必须于历史洪流中探得一个正确的立场，左右拓殖寻求，才能见其壮伟偶觉。欣赏名著、钦仰古贤是如此，对于一座似乎没有生命的城市，如果要加以品味和鉴赏的话，更应该如此了。

香港，这个被赞誉为东方明珠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头在攒动，高耸云霄的大厦在比肩，几乎淹没了她的英姿和奇伟，让人们觉得她只是个“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而已。前年，当在我那儿作客四个月时，才投身于一个适当的角度，设身于一个正确的方位，品尝到她的隽永，咀嚼到她的甘醇。于是，我开始往返开发她的神奥，拓殖她的神奇，进而品味及鉴赏。

启德机场周围的山峦，是我多次过港时最爱凝望神思的。山峦并不高，蜿蜒似卷云，起伏如波浪，肩并肩地排坐一起，就好像一堆弥勒佛。由于机场非常平坦辽阔，这一堆弥勒佛就如环坐在你的面前，伸着头露着脸在向你这位外来者上下打量。山的颜色是暗绿色，和国画的墨青相仿佛，内蕴丰厚，古意盎然；肩膀和头额边的云雾，轻薄得如面纱，纤细得如羽丝，柔情似水，舒卷自如。弥勒佛高高矮矮地鼓着大小不同的肚皮，定立，禅坐，任各式各样的飞机喷烟而降落，展翼而升空，自其常笑自如的面颊旁穿梭而过，如孤鸟过山谷，如落叶下溪流。如果是寒凉天气抵港，那么，踏出机舱，举头四望，只觉弥勒佛拂送给你满袖满衣的寒风，披散你黑白相间的发丝，撩开你的西装和风衣。呵，发丝万里长的风神，你真是柔情如水，柔情万千。

港九之间的千顷汪洋，是另一处最令我凝想神思的地方。风浪相当急，渡轮穿梭往返，就如泛游于大海一样，成排成排的巨浪或前或后地向你推挤，一块一块的浪花此起彼落地向你辉映。如果是夏天的话，你会觉得她很清凉，有热带海

风的盐味；如果是冬天的话，她是一顷寒意醒人的冷水，从你的渡轮，一块堆砌一块，一排堆挤一排，摇摇晃晃地伸展到平板板的海岸，东歪西倒地平舒到朦朦胧胧的远方。那一望无垠的高楼大厦，划岸为界，往界后一路站过去，平地挤不下脚的，就往山坡站上去，七零八落地一直站在山顶上，让肩膀或头额淹溺在云雾里为止。港九已经有通车的海底隧道，去年又有穿梭两岸的地下铁，但是，只有在渡轮上，你才能利用那熙熙攘攘以外的十分钟，静静地坐在甲板上，离开那闹喧喧的高楼大厦，让冰凉的一顷汪洋，濯你的衣裳，濯你的手足，濯你的身与心。

谁说香港没有甘醇？谁说香港不耐品味？

每年，香港大学以副校长的名义，从大英联邦及亚洲国家内的所有大学内，邀请一位学者到香港大学来担任研究员（fellow），作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和她相应的学系的学术人员交换学术心得，并作一二学术演讲。那一年，很幸运地，笔者被遴选为其研究员，和中文系的学者们相处。我们得到非常周到的礼遇和招待，住在专供来往学者及研究生居住的伯里基学堂（Robert Black Hall），与黄丽松校长的官邸相距仅一箭之遥，朝夕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及研究生们相处。今年三月底，受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的邀请，到香港及台北出席会议及考察田野工作，我们又有机会投身于前年的角度和方位，来品尝咀嚼她的甘醇。虽然在港为时仅一周，不过，我们已结缘在先，何愁不相识呢？

有贵族大学之称的香港大学，座落在薄扶林道的一座山坡上。校址相当挤迫，从最底下的学校银行，一直到最顶上的伯里基学堂及校长官邸为止，大概不会超过一千公尺；至于横度，大概有半英里；整个大学一级一级地建设在这块斜坡上，包括一个小型的校园及几幢高大的学生宿舍。

闻名的冯平山图书馆原本座落在东侧的一座旧式楼房里，现在却迁址到总图书馆的楼上来，原址改为艺术学系及艺术陈列馆。甫抵港大，中文系主任马蒙教授将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黎先生介绍给我认识，让我日后能得手应心地仰泳于书堆里。中文部的图书一部分是开架式的，另一部分属于冯平山图书馆的却是闭架式

，必须通过卡片方能觅得原书。向来用惯开架式的我，幸得黎主任的允许，使我到处通行无阻，包括杂志期刊室及特藏室。四个月的作客，在这座图书馆留下太多太多的恋情，品尝到香港的甘醇。上个月，即使会议及应酬排满了一周的时间，我还是设法到那里泡个“不知有秦汉，更不知有魏晋”，花了二天的时间，把新到的杂志书籍涉猎一番。

英国传统的学术自由在这里保存得非常完整，任何主义及思想，只要已经发表及出版成书，这里就可以读得到。三、四年前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时，就发现了这个优良的传统；今天，我又在香港得到良好的印证了。大学是领导国家，如果不能让大学图书馆保存各类书籍，无疑的，将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大学学术人员应该都是独立思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走在政坛人物的前端，如果不能让他们研究各类思想，进行评介、修改及发明的工作，将是改进国家的一大损失。也许就是基于这些原因，英国建立了这个传统，香港且保留了这个制度。我不是学政治的，对于任何主义也没有兴趣；不过，我很憎恶文史期刊书籍渗杂一些政治的标语及八股文字，如果认为采用这种“无孔不入”的方法，就能将它们“混”进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人的脑筋里，就未免太过幼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激赏英国人的学术自由传统，因为他们认为，大学里来往的都是具备有独立思考及判断能力的人，与其禁止书刊而壅塞思想，毋宁解除禁令而考验当前的思想。如果当前的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对其他思想有什么顾忌？如果当前的是不合理或是落伍了，我们为什么没勇气去更新呢？英国人具有此开阔的胸襟，所以，他们极力维护大学的尊严，将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学术的领域里。

港大的中文藏书相当丰富，由于地理上的关系，东西南北的书都聚集到这里来，更不必说大陆及台湾的了。他们很舍得花钱买书，例如两三年前台北大乘法出版社出版一大套佛教论文集丛，价值马币数千元，他们一口气订购下来；又例如大陆甫正广召订户的“甲骨文合集”，厚五、六巨册，由郭沫若主编，价值也是马币几千元，他们早就预先订购了。至于其他零星的书籍，他们似乎“乐此不疲”地全部“扫”进来。只要你踏进他们偌大的特藏室（约等于四间普通教室之面积）

，你准会被他们的“阔气”所惊动，而且，你准会羡慕港大师生们的福气。他们采购的对象非常辽广，只要是中文书，举凡文史、科学、医学、体育、经济及艺术等，林林总总，全被“横扫”进来；站在中文系的立场来说，似乎有点驳杂了。洋装书之外，冯平山图书馆也庋藏了不少线装的珍本书；饶宗颐先生好些年前就编了一本有关的目录，可供参考。最使我留连不走的，莫过于杂志期刊室；在那里，你不但可以读到一部分旧学报、旧期刊，而且，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这几十年来所出版的主要期刊学报，全部都很完整地排在书架上，任君选读，任君影印。从期刊室所陈列的，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书本买得多完整，资料来得多迅速；这些，都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基本条件。

除了书刊，演讲会及研讨会的风气也非常流行；整个来说，港大的学生不但非常关心中国大陆的动态，而且，也主动地参与香港社会的活动，成为社会前进及思想刷新的真正推动者。我聆听过两位学者及一堂学生进行的“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教育”演讲会，我看见过他们发起中文运动，使华语及中文成为港九的主要运用语文。

也许地域的关系，港大的学生嗜爱书写大字报，一排一排的纸板，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墨字，有时是历史的考据（如南沙群岛主权问题），有时是时事的分析（如中国惩罚越南的背景），有时是政治的评论（如港督过访中国与港督任期的延续），有时是校政的责询（笔者作客之际，适巧一群学生书写大字报，邀约马蒙教授对话），把图书馆的门口围成一道一道的纸墙。如果你想了解港大学生的部分活动以及所思考的部分问题的话，你应该伫立驻足，仔细地读完它们。也许不太凑巧，我没见过港大学生站在校园里当众演说，发表他们的伟论，一如从前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以及英国海德公园的说客，所以，对港大的学生来讲，大字报似乎是传达情感及思想的最佳工具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港大的学生正利用校园所提供给他们的环境和机会，进行“领导社会”“影响群众”的实习工作，他们有充份的自由和足够与自己挑战的对象，来进行这些实习，庶几乎有朝一夕投身社会，保证是社会的活跃和领导份子。

四个月的作客，我见证到英才的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我见证到英国传统耐人咀嚼的甘醇。

大会堂和艺术馆是香港官办的机构，分别座落在中环及铜锣湾，一个是十多层的高楼，一个是二、三层的建筑物。它们非常活跃，从年头到年底，节目排得满满的，绝少有空档。在大会堂，我分别参观了陶寿伯和赵少昂的画展，陶擅长于画梅，赵是岭南派的巨擘；去年年底刘海粟到香港开画展，据说就是在这儿举行的。除了画展，大会堂也主办各种演讲会，订期性的有国学演讲会等，每期半年一年，每周一讲；非订期性的则临时编插，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前几个月到港，就在此作临时性的演讲。此外，还有花展、邮票展、手工艺展等等，名目非常多。在艺术馆，我参观了王世昭家藏珍品展览会，品物相当多，场地非常理想。

最使人感动的节目是每年一度的“亚洲艺术节”，由香港官方主催，在大会堂的大厅演出，历时数周。歌舞是一个民族的另一种语言；通过这种语言，这个民族把他们对大自然以及对人际的相互关系的感受表达出来，或出自于豪歌、或出自于轻舞、或悲鸣、或疾蹈、以手以足、用舞用蹈、把情感纯真地倾吐出来。相同的一种相互关系，由于民族性格及民族气质的不同，极可能有不同的感受；相同的一种感受，由于民族文化及民族背景的差异，也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歌舞的艺术，我们不但可以观察出其他民族如何排遣各种可歌可泣的感受，也可以了解他们如何向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奋斗。一个具备有“民胞物与”的胸襟的人，当他在观赏其他民族的歌舞时，他会为他们奋力应变各种复杂难当的相互关系的热诚，而感动得击出泪珠、愕出吟叹。只有了解艺术文化的深意的人，才会尊敬别人的艺术及文化；只有尊敬别人的艺术及文化的人，才会体会出：在大自然底下，人类原本是四海一家，不分肤色。在这个概念之下，“亚洲艺术节”年复一年地举办下去，参加的国家也年复一年地增加，而演出的时间也年复一年地延长，成为香港最盛大的节目之一。

每当节目来临之前，所有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章、电台及电视台等，都极力宣传，为香港掀起观光热。各国都遣派最优秀的歌舞队，包括马来西亚及新加

坡，此外，欧洲若干国家，也派队来参加这个盛大的集会。由于各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不同，由于各民族文化及背景的不同，由于各民族所遭遇到的大自然、人际关系的不同，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歌唱和舞蹈，百花齐放，百家齐鸣。同样是歌颂爱情，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英国人有英国人的表达方式；同样是赞叹宇宙的伟大，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语言，印尼人有印尼人的语言；同样是描述人间的美好险恶，印度人有印度人的手姿，菲律宾人有菲律宾人的手姿；惟其不同，方知人间之多姿多采；惟其迥异，才见文化之繁富缤纷。从亚洲艺术节里，我们见证到不管是艺术或者是文化，多姿多采胜于单调统一；繁富缤纷胜于简一齐同。整个亚洲是如此，一个国家更莫不如此。香港何地？蕞尔小岛，竟能够兼收并蓄地让各民族的艺术来此表演观摩；除英国人开放的传统，还要作何解释？来香港而不去欣赏艺术节，怎么算是设身于一个正确的方位？怎么会品尝到香港的甘醇呢？

四月廿八日

寻根的学会

和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结上因缘，细细数起来，应该是四年前的事了。那年，家谱学会的代表沙其敏先生（Mr. Melvin P. Thatcher）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不知是何因缘，突然飞临我的研究室，带给我一个不太感兴趣的消息——家谱学会准备把全球性的计划延伸到马来西亚来。当然，言外之意是希望我能够给予实质上的支持和协助。过后，这位长得高高瘦瘦带着极浓的书卷味的美国年轻人，就不晓得又失踪到什么地方去，杳如黄鹤，让我忘得一干二净。

前年七八月，当我从香港大学作客回来，刚刚卸下满身的北方风沙，就接到一封长信，是从新加坡发出的。写信的人就是那位醉心古籍的美国人，他大概知道我有健忘症，或许知道我是个大忙人，所以，先从两年前结缘的事件说起：“你应该会记得，两年前我曾经很突然地到你的研究室，和你讨论一些春秋史的问题，也和你提起家谱学会的工作计划……”；于是，犹他州家谱学会挟其庞大的计划，举步跨进马来西亚来。开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行得不够顺畅，所以，成绩并不很理想。去年十月开始，取得马来亚大学当局的合作，成为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的计划之一，于是，举步才逐渐平实，工作也颇为顺利。本来对家谱族谱没有什么兴趣的我，在搜集及保存华人史料及文献的大前提下，半推半就且又顺理成章地被邀约为本区工作计划的指导教授（Supervisor），义务负责搜集资料的全部指挥和督导工作。此次的参与，对我整个的学术生命会有些什么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法子预测出来。就算是一块处女荒地，也要坎坎伐檀、丁丁伐木，经之营之，数年后方始有成；我是不是善于经之营之，就看这两年是不是还有多余的时间。

家谱学会好几年前已经在台湾推行其庞大的搜集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竟然获得数千种的家谱族谱；光是这些资料的目录，编印起来就已是皇皇一大册。

香港方面，罗香林教授逝世后，就停工了好几年；最近在香港大学讲师林天蔚先生的协助下，又开始工作。对新马两地而言，这个计划还是非常新鲜，而且也丝毫没有任何工作纪录和经验可以依循，与台北及香港相较的话，简直只是个小老弟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家谱学会于今年三月底及四月中旬在香港及台北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及田野搜集实例，邀约我前往出席及参观，以利此地未来工作之推展。

自从美国 Alex Haley 的畅销小说「根」(Roots)面市以后，世界各地纷纷掀起寻根的热潮。电视节目、电影及戏剧等，都莫不涉及寻求根源的内容，而保存及编修自己的家谱族谱，更是备受重视。其实，世界上任何东西，不管是生物或者是植物，都莫不有其根源；人类怀胎母体时，那条宛如铁链的脐带，从人类的肚子通往母体；母体就代表你的家谱，更代表你历代的祖先。没有它，人类不能脱胎；没有它，人类不能续种；谁说人类没有根源？谁说人类不应该寻究自己的根？

欧美一些家庭，偶而在客厅里挂着一张家族树 (Genealogical tree) 的图画。图里画着一株树，树根底下写上夫妇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孩子们及其配偶的名字就写在树枝上，有多少孩子就画多少树枝；然后，又把第三代的写在分枝上，把第四代的写在细枝上，大约每张家族树图，可以推上四五代。据说，欧美家庭只要记得四五代的老祖宗就够了，四五代的老祖宗就算是他们的根了。沙其敏先生告诉我，犹他州摩门教的教徒大部分的家庭都保持着自己的族谱，他们不但父亲这一支有族谱，母亲那一支也有族谱，而且，男女在族谱里的地位是平等的，男人固然要登录，女人也必须入谱；果真如此的话，犹他州摩门教教徒的族谱恐怕是世界上最周全细密的了，连家谱族谱最发达的中华民族也望尘莫及。

为了了解港台的田野工作情况及吸取其经验，我三月二十六日应邀，自新加坡乘中华班机直飞香港，出席他们所安排的会议和节目。沙其敏先生小我好几岁，专门研究春秋史，虽说我们认识了好几年，不过，在我来香港之前，我们只见过几次面，通过几个电话及来往过几次信而已。他的中文名字，还是出了启德机场林天蔚先生无意之中脱口说出来让我知道的。所以，对这位瘦瘦高高的美国书呆

子，虽说书卷味非常浓厚，我还是不知该和他多谈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在他中环的办公室里，他突然对我说：“像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人，世界上没有几个！”我才大受感动，坐在面前的，竟和我一样，是一位和齐桓公、晋文公及楚庄王等人握过手行过礼的人，我怎么不感亲情如手足呢！顿时，我撤除了横隔在我们面前的无形藩篱，把他当作知己朋友。

由于来得太匆忙，我们无法在香港大学安排到宿舍，港大那栋古色古香宫殿式的伯里基学堂，更无法让我们回去重温旧梦。沙其敏先生非常客气，一再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府上去作客，他那儿地势很高，环境清幽，空气新鲜，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可是，一来他家里孩子多，我们不想再给他太太添麻烦，二来我这时还没撤走横着的那扇无形藩篱，心中不免有些顾忌。所以，我们只好像打游击战似的，住进 Y.M.C.A.，第一天住四楼，两天后搬到三楼，再过三天又搬下二楼后座，把 Y.M.C.A. 每一层的房间都住遍睡遍。

抵港的第二天，我就随林天蔚先生，到大屿山去参加他们田野工作的行列。虽然我经常阅读田野考古的报告书，去年也跟魏维贤先生做过近乎两个月的 field work，把大半个马来亚半岛踏遍，不过，参加像这样大的一支田野工作队，还是生平第一遭。林先生是指导教授，我是客人，外加六名港大学生，抵大屿山之后，我们还有一位领队的先生以及一位司机先生；浩浩荡荡十个人，共乘一部吉普车，来到大屿山杯澳南区乡事委员会的会所。一路来虽然知道学问并不光是在研究室里做，不过，倒还没真正领略过在室外群体做学问的乐趣。这六名学生，经过林先生分配工作后，好像六只小龙一样，有的用录音机，有的用摄影机，有的用笔记本，有的填问卷，每人占据会议桌的一个角落，纷纷向该区的老辈们提问题追线索，把三月寒冷的会所搅得热腾腾翻滚滚，热闹得使人脱下身上的大衣和羊毛衫。

这六只小龙在会所里翻滚了约莫两个小时后，又像一阵旋风，把其他的人也卷回吉普车，然后安坐在车后，等待另一次的翻腾。林先生坐在司机先生的旁边，样子有点像罗马时代驾御六匹雄伟如奔龙的战车的战士，我陪在他身边，有时做

笔记，有时查地图，静得有如中国古代的驂乘。这部战车，在林先生的指挥之下，开足马力，翻山越岭，左拐右弯，或直冲向山头，如起飞的喷射机，仰身破云而爬上天外；或俯奔向山脚，如鸢鹰之擒弱肉，伸颈收翅而横冲平地。我们坐在车子里，载着一车的笑声和青春，左摆右摇，前俯后仰，翻滚身子如翻滚欢欣，好像乘离心滑车似的，在大屿山群峰的颠顶，东窜西钻，冲上又爬下。最后，穿过一片松林，又穿过一阵轻雾，奔进一条羊肠小径，就在一座大佛庙前刹车停下。座后六只小龙，如脱了缰绳的狂马，纷纷往庙后树边跑去，消失无踪。和林先生下了车，定神一看，才知道来到了大屿山最壮伟、最古老的宝莲寺。

港九有关家谱族谱的潜藏量，肯定地会比新马来得丰富，尽管林先生一再说“这里文化水平很低，不能跟台湾、大陆相比”，不过，和新马相比，这里又丰富得多多了。跟林先生跑了这一趟，虽然所闻所见不多，港九的情形却也颇为了解。

林先生是罗香林教授的入室弟子，研治唐宋史，著作甚丰。为了继承老师的遗志，他今年在港大系中开一门方志学，鼓励学生研究方志，并协助犹他州家谱学会搜集家谱族谱及方志等历史文献。香港恢复搜集家谱族谱的工作，不过这二三个月间的事，可是，林先生却有一个很大的抱负，他要在港九筹募一笔大得使我无法记得牢的基金，然后，把犹他州那一套的微卷全买过来，再配以港九影印的一份，成立一个家谱学会香港分会，供本地及东南亚学者研究。他说，他已筹得一部分基金，还有一些朋友答应支持他。林先生今年五十四，长我十余岁，在学术上还有此番斗志，真令我折服再三，祝他早日成功，为学术界开天地。

犹他州家谱学会亚洲及太平洋区的办事处原本设立在新加坡，主持人沙先生两年即通过该办事处和我连系，并且协助指挥一部分大马的田野工作。去年年底，他们为了把工作推展到中国，决意把办事处北迁香港，以利工作之进行。当然，大马区的指挥和督导工作就得完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平日除治学及教书之外，要不是看在保存华人史料份上，我那有时间来承担这工作？将来做得好，不见得会获得家谱学会的感激；做得不好，于自己名誉有损；所以我说，沙先生不

知是何原由要我和家谱学会结上因缘！这次来港，我才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办事处，所谓亚洲及太平洋区办事处，其实，人事非常简单，设备尤其朴实，一般上的繁赘冗余，这里完全看不到。卫城道（Castle Road）摩门教的会所非常高大古雅，一点也不像局促在香港弹丸小地，而沙先生的办事处，就在会所的第三楼，一扇木门对着一一条窄迥廊，一口七尺木窗照着许多屋顶，两张桌子，两个办事人，再加上一个拍摄微卷的暗房。你要是问问沙先生你们还有些什么人和设备，他准会对你摇摇头，所以，一踏进房门，只举头环视一圈后，我就静得不敢启口，尽是深思和咀嚼。

“一把无情之火，可以把保存数代的文献化为灰烬；一场政治暴乱，可以把市内图书馆的珍本图书夷为平地；在人类的历史里，这种破坏性的威胁一直存在着。如何保存世界上价值连城的手抄纪录、历史文献以及族谱，以免遭受时间的腐坏以及人类的摧毁，似乎是人类永远思索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家谱学会说明手册第一页的文字，又不停地在我的脑际萦迴。

犹他州家谱学会成立于一八九四年，总部设于该州的盐湖城（Salt Lake City）；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两座规模宏大的保存所，在城里的是一座二十八层的建筑物，行政、阅览、图书都在这高大的建筑物里；真正的文献保存中心，是距离该城三十二公里洛矶山脉中一座花岗岩山（Granite Mountain）的特设隧道保管库（Records Vault）。

家谱学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学术团体，经费来自于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的会员。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聘请了近乎六百名的全职人员，来推展超过四十个国家的史料搜集和保存工作。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及南北美洲，他们都有计划在推展着，至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亚细安五国、纽澳、印度、锡兰、南非洲及以色列等，也都在他们的计划内，其气势之雄伟，真令人叹为观止。

当年斯坦因及伯希和到中国西北访古时，把敦煌宝贵的手抄卷子带到英法；如今，英法两地成为敦煌学的世界重镇。今天，家谱学会把世界各地的家谱族谱

等集中在犹他州，谁敢不说将来研究各民族的历史，非到该州不可！斯坦因及伯希和是非法地带走，家谱学会是以保存文献为出发点，经保存者的同意，摄制成微卷（microfilm），甚至于付出若干费用。对保存者来说，他不但不会失去其原本的文献，甚至于对该文献多了一份安全感——他有一个副本，永远保存在犹他州的山库里！家谱学会的计划，如何不叫人激赏呢？

五月三日



海外亲情

无可否认的，香港的学术界是比我们那里热闹得多，研究亚洲问题的欧美学者，没有不到香港来访问及搜集资料的；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想到外国来，大部分也都以香港为出入门径，南洋以及纽澳的学者如果想北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及韩国的话，也都乐意在这个缤纷多采的城市歇歇脚，和许久不见的朋友聚一聚；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香港是东西南北的中心，资料比香港人还要多，也比香港的高楼大厦还要集中，东翻西检，犹如穿梭香港的闹区，热闹得好像天天都在度新年、过佳节。

虽然住在青年会，无法像两年前住在伯里基学堂一样，可以直接地和学术界交往，不过，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电话，却依旧让我和外界保持了一线的联络。如果我们留在宿舍内，电话铃声会直接叫我们去赴会；如果我们已在外头，柜台小姐会把铃声一五一十地化为纸条，留在我们的锁匙边，万无一失地等着我们回来。电话使我们东西奔命，也使我们欢乐愉快。

内人表哥詹伯慧教授出入香港两趟，虽然通信了多年，不过，这一趟他出入香港从事学术活动，却依赖了这千里一线牵的电话来和我们见面，完成了这一段海外的亲情。

“我是伯慧呀！你们什么时候来香港的，我还以为……。”一个朗爽宏亮的声音在线的另一端传过来，兴奋得我们俩人争着把耳朵往听筒里塞。

表哥是中国当今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入室弟子，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跟王先生学习语言调查的方法和工作，后来又到武汉大学担任助教、讲师以至副教授，一年前应东京大学之聘，前往担任客座教授，为期两年。著作非常丰富，对于方言调查及汉语研究有很大的贡献，早年与袁家骅合著汉语方言概要，

最近又出版现代汉语方言，至于单篇论文，总数在四十种以上，是一位学术生命活力非常旺盛的学者。如果从辈份来说，他是当今中国第三代的语言学家了。

当我乘巴士、乘渡轮、又乘巴士，再步行一段路到九龙土瓜湾的袁家时，一路上，心里有说不出杂乱的感触。这一段不算远的路，翻山越岭，过河涉水，颠颠波波，摇摇荡荡，就好像我的脑筋，忽而浮上，忽而下沉，东歪西摆，比下渡轮穿马路的人潮和闹声还要杂乱。我们和表哥通讯了很多年，所习的又有些相近，平日虽然称兄道弟，且互换相片，不过，他到底长得一幅怎么个样子，还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其次，我们完全生长在不同的国度里，所闻所见以及所思的，几乎都不相同，小焉一言一语，大焉一思一念，都有很大的差异，今天相见相握在香港，如果不是这一份亲情，又如何会发生呢？最令人感到缭乱的是我们谈话能够直入心坎几寸深？不同制度和背景所网造出来的“人际藩篱”，可以撤除到怎样的程度？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应该回避的？我们是面照面，还是心印心？一股一股的思潮，像港九海峡的波浪，一波一波地将我摇到土瓜湾马坑涌道的中华大厦。

表哥长得比我矮，从大陆出来的一幅典型模样和气息，即使穿西装，也跃然地让你不但看得到，甚至于嗅得到。读书人的气质很浓，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有一双修长的柔软的手指，也许这是读书人的特征。黑皮鞋大概是在广州或武汉买的，不是外地时尚的所谓流线型；西装大概也不是香港订制的，一点也闻不到新的味道。就在握手的一刹那，我们又惊又喜地张大眼睛多盯了几眼；呵，朴实当然是朴实，开朗豪迈之中，似乎略带一点其他的成分。我们还只是面照面，所以，一时无法发掘这成分的内容。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还能保持开朗豪迈的性格，我们已心满意足了；否则的话，这分亲情可就难再继续下去了。

香港大学中文系邀请他演讲，语言中心也不放过他，我对语言调查的兴趣并不浓厚，港大中文系及语言中心的朋友们，我也很熟习，可是，我还是陪他东走西走了一阵子，观赏他在台上高谈阔论的风姿。表哥除了硬绷绷的学术文字，散文也写得很不错，最近，他应香港文汇报之邀而动笔的一系列东瀛杂记，读起来

就很动人。在这一系列的杂记里，首篇“色彩缤纷的国家”写道：

“扶桑正是春光好！”从飞机上看下去，大东京郊外的田野上点缀着一幢幢五颜六色的房子，纵横交错的公路上奔驰着五颜六色的汽车。东京啊，东京，你给人们的第一眼就是色彩缤纷，是一个充满着颜色，充满着活力的大都会啊！

当飞机降落在巨大的成田国际机场，我在几位前来迎接的教授陪同下乘车离开机场时，绵延几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两旁，色彩绚丽的各种花木、各种建筑不断映入眼帘。这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车窗外成行成片的樱花都像是一张笑脸迎接宾客的姿态。临近市区的时候，夜幕徐降，高大建筑物上耀眼的霓虹灯照得天空通亮，一排排火笼似地蠕动在马路上的车辆也给大地刷上了瑰丽的色彩。我们的汽车停在国际文化会馆开满樱花的庭院中，我走进会馆，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第一个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色彩，无数的色彩，绚丽的色彩，这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城市，一个充满色彩的国家。

刚到几天，一个人留达在住所附近的大街小巷，触目所见，无论是匆匆来去的行人和车辆，或是高低不一的各种建筑，五花八门的大小店铺，都给人一种多彩多姿不拘一格的感觉。那些稍有一小片庭院的住房，总是不放过每一寸土地，精心栽上鲜花，铺上绿草。比较宽敞一点的马路，中间的隔车绿带，也都是杜鹃盛开，玫瑰待放，在闹市中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这里的工作和生活，这里的习俗和人情，想必也是多采多姿、五颜六色的吧？……。

这是他应邀到东京大学讲学时，所写的一篇散文，文笔不但流畅，而且也颇为清丽。作为一名学术人员，平日所读所写的都是硬梆梆的文字，下笔时却如此清丽流畅，不亚于文艺工作者，委实难得了。

表哥实际上颇有家誉，他的父亲詹安泰教授是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著名的诗词作家及研究者。出生于公元一九〇二年的姨丈，十岁就能写诗，十三岁即能填词，可谓早慧。虽然中学上得晚，不过，他十九岁即进广东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系

的课程，并且开始在新民周报的副刊上发表小说。四年后，执教于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兼任金山中学的导师。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研究旧诗词，并且经常发表作品。一九三八年，受聘于中山大学，后来担任该大学的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院的指导教授，专授古代诗选、词选及曲选等课。一九四九年以后，除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外，又兼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七年四月，病逝于广州任内，享年六十余岁。

我无缘亲炙姨丈，不知道他的为人，不过，从时人所写的追忆文字中，多少也可以想见得到。吴其敏先生在他的专栏「坐井集」（原载香港大公报）里，曾如此写道：

詹安泰在家乡时，我们较多称他祝南先生。他虽然不过长我几岁，由于学校有不少同事都出自他的门下，所以，我一向也是以师礼待他的。但他绝不摆老师架子，每次从潮安到汕头来，一群人拥着他，听他谈文学、谈词，他总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制作的新词拿来对我们讲述，或念给我们听。姨丈似乎兼有文人及学者的两种性格；待人随和豪迈，有文人的气质，治学谨严周密，有学者的风范，宜乎以师礼事之的人非常多。这一次在香港看到表哥，其朗爽豪迈的性格，应该是来自姨丈了。

很可惜的，姨丈的一生大部分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度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际虽然他还很小，不过，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恐怕没有好日子过，实际上，他晚年即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和冤屈，才忧郁病逝在广州。吴其敏先生说：

祝南先生呆在韩山师范多年。他的韩山寓兴第一句说是“八年已共韩山老”，是以写作此词的时间计算的，实际上，从大革命失败前一春到校，以迄抗战军兴潮汕濒临沦陷时离去，前后当在十二年以上。记得丁丑夏初，他给我写了一个立轴，其后又托一位同事带给我一本「无齏词」，这就定下从此大家难再聚会的一次分手。正如所言“兵火满天，举家避难，尚不知葬身何所”，那时，大家都需要有个将何以进止的安排。

文人学者生当动荡时代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他们手无寸铁，身无余粮，即使得以避难荒野，又将如何度日呢？

虽然姨丈一生过的并不是什么安定的日子，不过，他还是非常勤奋，从不放松学术研究的工作。创作方面，他出版了无鑫词及滇南挂瓢集；学术著作方面，出版了姜词笺释、屈原、中国文学史、李憬李煜词、离骚笺疏及最近刚出版的宋词散论；至于单篇文章，目前所知的有《诗经里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及《读词偶记》等十多篇。此外，他还有《碧山词笺证》，等待出版。创作及著作，可谓丰富异常了。

看到表哥，就想起姨丈。唉，这段亲情，就目前而言，似乎只能在海外谱制而已。

五月十七日



千里相思

念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位级任老师就说过我是一名“多血质”的孩子；“多血质”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当时他没进一步解释，后来我翻遍许多辞典及辞书，也得不到要领。虽然这三个字的含义今天还是迷惑不清，不过，对我自己的性格和习性，倒是知道得相当清楚。

我是一个不太喜爱独自离开家庭的人，早年负笈台北读大学时，离开了父母兄弟，似乎就像一朵在天空飘浮的云片一样，不知要往那一处安身，失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往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有时到外地或外国去出席会议，必须和家人分离，即使短暂如一、二日，内心也感到愁郁寡欢。四年前到伦敦去长住五个月，虽然内人偕往，却和孩子们分开，一家四口，两个在东方，两个在西方，遥隔岂只千里而已！那五个月的隔离，使得我们夜晚相思、天天看表惦念他们的起居生活。前年我们来香港作客，虽然只有四个月，虽然同属一洲“就在印支半岛的那一尽头”，却也忧心忡忡，几次想挂长途电话，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内人本来在中学里教书，两人一上班，家里就丢下两个孩子，大孩子伯麟虽然小学一年级而已，却必须学会自己看家、用饭、锁门及乘 *bas sekolah* 上学等事，次女竹菱只有三、四岁，实在没法子自主，只好送回新山去。这样的家庭生活不但撕得七零八落，而且恐怕也不健全，为着家庭，内人终于搁下教鞭，把竹菱接回来，掉过头来看顾两个萝卜头。

这一次，为了出席家谱学会在香港及台北召开的会议，也为了到东京作几场的学术演讲，我们又提起行李，和他们告别一个月。虽然家母在新山照顾他们，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来，觉得身在异地，和孩子们分别，很不是滋味。

住在 Y.M.C.A.，我们经常看见一些“阁府光临”的访客，或尾随三五孩子，或手牵一二孩子，看着人家乐融融的天伦，更引起我们内心的孤单。

来马大上任之前，我们曾在新山小住一阵子，那个时候，我们才深深了解，在一个教育水准有限的大家庭，兄弟及妯娌之间的相处，的确是不太容易；而我们“多血质”的亲情，看来也似乎有些一厢情愿。我们到吉隆坡来，一方面是迫于工作不得已离开亲人，非自己所意愿，一方面也觉得苍天的安排恐怕没有差错，要我们告别那个纷纷纍纍的大家庭。几年下来，我们违逆着自己的情感，每年只二、三次回访新山，不敢多作久留，真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北上，颇有放逐犯人回访故国的感觉。

两年前，为了孩子的学业，我们又和那个有血肉关系的城市发生关系。如今虽然身在“印支半岛头顶上”的香港，遥隔千里重洋，回想起来，却是如俯首观掌纹，历历在眼前，何止于清晰可数。

伯麟好不容易考进了南洋女子中学附小，我们庆幸之余，却又为膳宿而忧心如焚。悒于昔日“兄弟妯娌难以相处”的经验和余悸，内人一开始就主张“独立”，让伯麟和一位同学共宿在学校的附近。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家母立刻想起我的二弟，让伯麟投宿在他的家，既可省却出入关卡之苦，也有个亲叔叔照顾。眼前明明是一条最理想的康庄大道，那里会有走不通的道理呢？从二弟那里回来后，我一直抱着这么样的想法。也许我们在吉隆坡住太久，早就把昔日“自愿放逐”的教训扔在脑后了；两天后，一个冷酷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二弟的太太挂个电话通知家母，她回娘家拜神求签后，神启示说“不可以接受”。当时，家母只会把整个责任推诿在内人身上，枉冤她；对于二媳妇的“挑拨”，完全不深究。我悲愤得叫伯麟收拾行装回吉隆坡，“我们不是新山人”！而内人则饮泣终夜，无语对苍天。“兄弟妯娌之间难以相处”，八年前的教训又不停地敲打着我们的后脑，难道我们忘了吗？痛得难以挨受。

旧式大家庭的产生，自有其社会条件；此制度虽屡被指责，不过，就其精神

而言，也未尝完全一无可取。互相照顾，互相协力，万一家庭里有人远行或意外，一点也不必忧虑，它就好像一个完整的“福利机构”，有温暖，有情谊；无奈大家庭的弱点实在也不少，如果家庭的成员不能互相容忍、谅解及爱护的话，在这工商的社会里，大家庭势必遭受淘汰和遗弃。小家庭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后，人们不担保没有各怀己心及视亲人如路人的心理，再加上工商社会高度竞争的刻薄无情及金钱至上的作风，小家庭之间纵使有亲属上的关系，也完全不必要保持守望相助的合作。身处这么样的社会，你会深深地感觉到，即使亲人也跟路人一样，更不必说邻居了！虽说左右邻居平日都被工商社会的忙碌折磨得喘不过气来，无法互相照应，谁敢说另一部分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不必互相合作，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呢？邻居再多也无济于事，因为那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家庭不再是一个“福利机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很多很多昔日没有的社会组织——托儿所、救济中心、老人院、孤儿院、福利部及成批的慈善机构。有用吗？檳城及吉隆坡夜晚时，路边还睡着很多人；据说纽约的公园，成天成夜睡着一大堆无聊的老人。香港呢？更不必说了。想到这里，不禁往窗外望一望。座落在对街的花园，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粉红浅白，缤纷可爱；但是，花边的长凳子上，就睡着两个身着旧式唐山装的老人家，长凳边还摆着一盒便当和一瓶汽水，准备在那里消磨一段时间。

受二弟妇折腾了一阵后，我又想起家居兀兰镇的堂妹；这个堂妹生来健壮，脾气也惊人，当年她们一家人能够从潮州南渡来马来亚，完全得力于家父，手续既由家父办理，船资也由家父承担。她当时颇有侠义之风，立刻出力相助，慨然允诺伯麟的投宿；除了庆幸之外，我们也不敢忘记作膳宿上的津贴。虽然工商业社会逼迫得人类不得不走小家庭的制度，不过，我深信，大家庭守望相助及互相合作的传统和精神是最适合人类的天性的一种生活，不但应该善予保存，而且更应该加以发扬光大。如何在小家庭的制度里保持大家庭的优良传统，更是我们所应当日夜努力的目标。好几年前，我的堂弟到吉隆坡来升学，人地生疏，投宿无处，我不但主动地接受了他，而且私底下将他父亲汇来给我的膳宿费，完全给他，

让他多一些零用钱，购买美术器材。甚至于后来他父亲中断他的一切费用，迫他退学，我还特地回去向他父亲兴师问罪，强作调人，让他继续学业。人之相交，贵在相助相爱，何况是亲情！否则的话，平日交谈聊天，碰上困厄的时候，转脸相背甚或落井下石，和畜兽的往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开始一二个月，一切还算理想，晋入第三个月，事情就逐渐不正常了。早餐没得吃，清晨五点多就让他离家走路上学校，不允许跟婆婆通电话，肚子饿了喝开水……每一件事情听起来，都足以使他的母亲及婆婆发疯！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全部的发丝摧成银白色，从发根到发梢根根都为伯麟承担一切的苦恼和忧惧。伯麟素来鼻喉有敏感症，那一阵子，虽然没完全发作，却也在感染的情况中；所幸他非常自爱，撑着身子只知用功而已。如今想起来，纵使身在千里之外，而且已是过去的事，还是鼻酸眼红，“唉，伯麟将来如果稍有成就的话，千万不可忘记当日的艰辛，要时时警惕自己呀！”这是他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离开了兀兰镇，只好撤退回新山，暂时投宿三弟的家，做个通学生。自从家父过身以后，我们的大家庭就折散了，家母安于旧环境，也就顺理成章地随从三弟住在新山。伯麟向新山后撤，说是投靠自己的婆婆，其实也就是投靠他的三叔三婶。父母生下我们四兄弟，似乎只有教育程度不太高的老三，其性格比较中庸随和，和我最为接近。伯麟投靠了他，虽然环境纷杂和急迫，倒是让我们放一百个心。实际上，我们恐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再撤退的话，就只有北回吉隆坡了。由于环境的急迫，伯麟不得不在三婶的裁缝室做功课，下午西晒不说罢，满室流行歌曲和高亢的谈笑声，似乎比西晒的太阳还刺人；有时委实受不了，就只好扒在卧房的地上摸黑用功，实在也只是隔着半道墙壁，那一扇大窗就足够把裁缝室的各种喧闹声倾灌进来了。三叔三婶对他照顾得不差，又加上婆婆的爱心，即使读书环境差一些，我们倒还甘之如饴，就让环境考验伯麟罢！吃吃苦头，又有何妨呢？说实在的，到了这个地步，有时也只好如此地自我安慰了。

将年年底的时候，竹菱也想南下，说怎么样我都不答应，一个已经搞得焦头

烂额，怎么可以再呢？无奈她老是纠缠不清，加上她母亲的“力谏”，终于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意见。家母去年把旧房子脱手后，在三弟的附近买了另外一栋房子，一则为家母自己安身，二则我们南下时有个投宿之所，三房一大厅，屋顶是斗蓬式，倒还清幽舒适。去年年底及今年年初，为着整修及布置这所小房子，又花掉我们偌大的精力和财力；说实在的，肩膀上各种无形的压力，颇使我们喘不过气来。

孩子们飞走了，偌大的一所房子，只剩下我们俩老，清静固然清静，却时常很有孤单的感觉。内人作为人母，更是日夜人在吉隆，心在新山；而我这个“多血质”的人，时常是熬不住，设法每周挂一二个电话回去，即使是三言两语，也足以安慰于短暂。唉，本性应该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却反而不能如愿，这是什么天意呢？本性不愿意外出留达，却时常必须出差，或数日，或数月，这又是什么安排呢？不晓得当年的级任老师凭什么一眼望穿我的个性，只觉得我一生到目前为止，似乎老是受这一个字所困——情，是我的血液，也是我的一生。

掀开 Y.M.C.A. 的窗帘，只见外头一片喧哗，车声、人声，混杂成一片汪洋，把整条街道泡得没顶，没有喘气的余地；而窗内的我们，却清静自如，安宁自如。

五月二十二日抄

中央之国（一）

经过一个星期的繁忙，四月三日中午，我们带着笨重的行李和疲倦的身体，踏入华航的班机继续往东北飞，到这梦寐以求的台湾来。对我来说，自上次文学会议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距今已六、七年之久；对内人而言，从一九七一年到马大上任之后，她就一直没有踏入家门。台北，是她的故乡，她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这里，梦萦魂牵，日夜相思。因此，这次来台北，在行李方面，倒是驾轻就熟地大略准备三几件春装，以应寒流来袭之用；可是，在精神方面，我们可就准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什么人应该去探望，什么街什么巷应该去走一趟，什么档铺的食物一定要再去品尝，校园的那一个角落应该去兜一兜，什么东西一定要买回来，什么东西马来西亚吃不到一定要尽量装，什么书局的什么书一定要去翻……长长地一条纸带，写写想想，想想写写，搞了好几个星期，到上飞机启程往台北的最后一刻钟，还在添添补补，比做卡片写论文还要细心。

飞机甫抵桃园国际机场，我们的心脏即刻加速跳动。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甚至于无从捕捉的清风和寒意，我们竟是那么的熟稔，就好像徘徊歧路的小羊回到娘家一样，只有母亲的体温才最适合自己的依偎。

机场公共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两旁的农庄青悠悠地躺在白云的山边，辽阔恬静，茁壮富庶，唉，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如果不能先把农庄搞好，先把财富安置在农民的手里，就只有走上覆灭败亡的路子上。早在几千年前的管仲及商鞅等伟大的政治家，即已谆谆提出忠告；中国的动乱，那一个朝代不是如此呢？这几十年来，台湾经过土地改革，有了充裕的休养聚蓄，农庄有基础，农民有生活，很有小康的局面。中国历史从来绝少有五百年连续国泰民安的，这里的老百姓早已被教训得很容易满足于最低的生活条件，这里的老百姓也早已吃尽苦头懂得乖乖地安命于做个驯良温顺的良民。今天，上苍露出一阵

子的晨曦，大地拂来一阵子的和风，只见秧苗满庄满庄地青青茁长，轻云满野满野地白白飘移，悠游，舒畅，满足；哎，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稼庄从来就没有这么样地优美过……。

转过来看看内人，只见她脸上垂着两行泪珠，白里透红。“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外面的稻草香，你闻到吗？”嘴边噙着。我了解她流泪的原因，一点也不惊讶地紧握她的手。唉，台湾的进步，自己在外所遭遇到的委屈，一喜一悲，且惊且忧，交战冲击。只有用热盈盈的眼泪来倾述，只有用最内在的神经来低吟。

中国有很悠长的历史，从仰韶文化的刻契文字数起，至少已有六千余年了。历史尽管非常悠久，但是，却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历代的所谓盛世，不过汉、唐、明及清的某段时期而已，加起来总数不会超过四百年；此外，都像一个垂老多病的老人家，仅仅维持着一口气而已。只要边疆的异族入侵，他们就无法抵抗，不是割地赔款，就是坐视骚扰，甚至家灭国亡。把蒙古人及满洲人数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那不过是后来的事；当他们刚刚夺走了中国的政权时，谁不把他们当作异族看待？至于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代，那更是中原板荡，永无宁日，中国这老人家已经是生不如死了。

虽然版图时有增加，不过，中国似乎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她看起来不过是一个版图非常辽阔的大乡村。在这个大乡村里，占绝大部分的农民，大半时间都生活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几千年来，他们永远只有靠天的雨水等待着秧苗长大，用最原始的方法驱除害虫等待稻谷收割，遇上水灾或旱灾，他们就只有束手无策自艾自怨地变作流民，沿县沿省乞食；不然的话，就是集体组织起来，向当局挑战，作死生的搏斗。几千年来，中国永远是一个农业社会，举国上下就依赖农业产品来过日子；农业既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按理应该在农业的品种、操作、土壤、水利及运输等方面有所改革及改进，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黄帝时代用水牛犁田，康熙时代也是用水牛犁田，尧舜时代是“日出而耕，日入而息”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光绪皇帝的时代也并没有两样。土地开拓得迅速的话，最了不起是积存几年的余粮，如西汉文景的时代一样；如果缓慢或者如福建省之多山无法开

发的话，那么，大家就只好“现耕现吃”，那里还谈得上富庶呢？

国家经常衰弱和困穷，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实在不容易；除了安于贫苦做农民之外，没受教育的芸芸众生，只要有法子糊口为生的话，不管是什么康庄大道或是羊肠小径，他们都往前走。中国旧社会谋生行业之多，几乎到了无奇不有的地步，甚至于在逝世的死人身上，也还有好几种行业可以做。除了令人叹为观止之外，也委实为中国人悲悯——他们过生活实在不容易。因此，南方一部分省份的老百姓实在被折磨得受不了，就时常向海外移殖，尽管狂风大海吞噬了他们的同胞，尽管中国当局三申五令严禁他们出海，他们还是冒险偷渡，离开那片可爱又可恨的贫瘠的土地。

能够提高社会的经济，加强国家的势力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的，似乎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中国的读书人似乎都相当的自私、清高和缺乏魄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先秦时代显过三、四百年的气势，在那个时候，他们热烈讨论社会改革、战场军事、治理国家及人生哲学等等问题，学问不但渊博，气魄也非常浩大，不愧是“君子儒”，有“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的伟大气概！孔子和孟子为推动自己的政治抱负，解民于倒悬，披星戴月，劳碌一生；墨子三天三夜奔到楚国，只为着解救宋国的老百姓，实践自己的反战思想；这些事情，如何不叫人感动？秦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完全失掉了昔日的气势和光采；他们一则浮沉于利禄功名，谋一家一室之富贵，累世安乐；一则高隐山林，与世隔绝，维持一己的清宁；一则守室著书，成就自己的令名，永传后世；他们已把社会改革、治理国家及解决民生等问题，完全弃诸脑后。从他们的著作里，我们发现他们所讨论的，不是愈来愈狭窄，就是与民生没什么关系；从他们的行径上，我们发现他们一仕一退，似乎都不是为广大的老百姓，只是考虑一己的安危。唉，都是自私、清高呀！知识分子既然远离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老百姓如何不被生活欺凌和折磨呢？

跨骑在老百姓的背上的，除了一批“不长进”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另一批

“不长进”的半知识分子。所谓“不长进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只知做官不知民生的人士；中国历史告诉了老百姓，一个腐败贪污无能的政府，比一批强盗还要可怕，因为前者是有组织的，后者是无组织的。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人为了躲避苛政，宁可迁居森林之地，把生命送给老虎也不觉得可惜（见礼记檀弓篇）；有人为了避开官吏的骚扰，甘愿终老山林，买两口瘠田渡日（见柳宗元永州八记）；例子恐怕举不尽。所谓“不长进的半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科场失意的读书人，为了生活，他们寄生在各种千奇百怪的行业里，污染民风，蛊惑百姓，败坏思想，使人觉得礼教会吃人，先秦儒家思想是万恶之源。有谁愿意去净化这些污染呢？有谁有能力去改革那个“有组织的强盗”呢？只有知识分子，只有像先秦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的气度和风姿已经过去了，他们沦为自私及清高的“小人儒”；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委实太可怜，知识不来照顾他们，教育不来协助他们，怪不得他们被教训得早已经知道如何乖乖地安命顺天，被折磨得早已经懂得如何默默地降低生活条件来适应环境。

想到这里，只觉得眼前一阵昏暗；拥有六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虽然一路来都有生命地生活着，但是，是不是实际上存在着呢？六千多年来，这中央之国到底怎样生存着呢？……掀开玻璃窗边的绒帘，我眯着眼睛，一面思索，一面望着野外的稼庄。

把一切的责任完全推诿给知识分子，恐怕也不见得十分公平和合理。自从嬴秦统一中国后，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语，政权是一把抓，紧得举国上下都喘不过气来，更不要说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了。书可以焚，儒可以坑，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镇压呢？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是向政权屈服，作个可怜的应声虫；就是乘桴浮于海，另觅新天地。汉代以后，未尝没有出现过先秦诸子那样气势磅礴的高级知识分子，张良、曹操、王安石、文天祥、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先生等，数量虽然有限，从他们的著作及行径里，也可以看得出，他们排名于先秦诸子的行列里，毫不逊色。无奈“政权一把抓”的历朝，一手扬着利禄，一手按着刑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欺凌他们，挫折他们，侮辱

他们，一直到近代，还有人叱喝他们为“臭老九”！知识在中国这个国家里，从秦代以来，似乎一直都没有地位。

维持一个政权既然不是依赖知识，那么，当她成立之后，就只是一个具有生命的组织而已。这个组织养着一班人，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国运好的话，五年不旱不水，老百姓才能够有鱼肉吃，有轻衣穿，而且余粮有三五年；国运不佳的话，老百姓就如刍狗，作维持政权的牺牲品，到处流离失所，变成饿殍填沟壑。所谓“国运”，就依托在那无从捉摸的苍天，而不是自己手里头的书本；这条生命维系线，说起来也实在太纤弱可怜了。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怎么有地位呢？他们不过是社会上多余的一个阶层而已。

想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唉，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是社会阶层的顶峰，汉代以后，他们后退无宿粮，前奔无坦途，将要如何自安自处呢？满肚的愤慨，实在无法排遣。机场公共汽车的冷气相当冷，披上寒衣后，我把视线转向窗外。这时候，车子已经逐渐离开郊区，驶进台北的一个卫星市板桥镇。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未免太过“自我放逐”，而且，一放逐就是好几千年。西汉初年，知识分子几乎集中所有的脑子和精力，在维持儒家的几部经典；东汉末年，时局动荡不安，生命如草芥，知识分子忙着“逃命”，有的借酒，有的装疯，有的流亡；往后几个朝代，也都莫不如此。吟风颂月、写诗填词、评诗论文、做官弄钱、注经疏典、安安稳稳过一生；到了清朝，更是步两汉的后尘，把学术搞成短钉小技，不但一点生气也没有，更和民生脱离十万八千里！所谓学术云云，到底目标何在？所谓知识分子也者，难道都应该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吗？据此以观之，中国知识分子实在太自私、太无情及太清高了。他们“自我放逐”的目的，完全是为一己之私；他们超渡了自己，然后就把芸芸众生抛在脑后。先秦诸子的气宇和风姿，何时再生？何时再现呢？

中国政治既然如此专制，任何往前猛扑的飞蛾，似乎只有自焚的余地；然而，说也奇怪，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为自己的国家想出一条具体的法制路子，如何让

民智逐渐开启，如何让皇帝囿限于若干权力之内，如何让知识运用到国家的建设上，如果让政权不再只是依靠“枪杆子”取得……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一直到清代末叶康有为、梁启超出现为止，恐怕没有发现过，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了。结果，让自己的国家老在死胡同里兜圈子，今天这个朝代，明天另一个朝代，今天你上台你改正朔易服色，明天我上台我换国旗国号。最冤枉的莫过于低层的老百姓，天虽然高皇帝虽然远，然而，国家长期衰弱和贫瘠，难保灾黎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中国土匪、地痞、流氓及强盗之多，恐怕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例，再加上火灾旱灾、土地分配不合理等足以使农村破产的各种原因，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如何找生活呢？国家永远在胡同里左牵右钻，在上头的只管享有政权；有能力提出改革意见的中层却自私、无情及清高，你说不一二百年一小乱、三四百年一大乱，以便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又要怎么办呢？

鸦片战争，只不过是六千年来多少次异族入侵的一次罢了！想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看看内人，她正握着布巾往眼角揩去。窗外，这么优美的稼庄；哎，这一次的秧苗，应该有良好的收获，答应我吗？

五月二十七日钞

中央之国（二）

六年没回台北，机场公共汽车刚奔进台北交通的洪流，心里就掀起一阵激情：哎，多年不见她，到底是进步得非同凡响。十年前，当我在这里念书的时候，生活水准、都市发展及国民所得等等，远远地比不上新马，如今，被誉为“亚洲三只虎”之一的台湾，不但早已超越了新马，而且高踞亚洲榜首，雄视各国。

我们在台北站下车，然后转乘计程车赴和平西路的明星大饭店，和我们一起来开会的林天蔚先生随后也赶到，由于行李太多，他只好另乘一部计程车了。

中国人似乎一路来都拙于管理，上自国家，下至马路，都显得没什么头绪。已经是拥有六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国家了，和世界其他国家相较，岂只是曾祖父比玄孙而已。然而，中国似乎没累积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把国家治理得好些，把行政处理得简便些，相反地，清朝以前国家是一个人的，法律是皇帝的嘴说出来的，管理国家就如中国旧式读书人管理他的书房一样，什么书当然知道摆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效率和速度，太麻烦找，太花时间翻，何况有时遗失了恐怕还不知道呢！民国以来，情形似乎没有好到什么地方去，台湾虽说尽量朝民主自由的方向跑，官府还是高深莫测，大陆的情形可就一点也不清楚了。因此，到中国的衙门官府去办事情，是一件很头痛很伤脑筋的事，部门之繁多，手续之冗杂，还有那些官员们恐怕大部分都是柔道十几段的高手，你得准备橡胶式的耐性，把脾气磨光，作好接受欺凌的姿态，然后再奉上几天的时间，任由他们折磨，那么，事情才能顺利地办妥。既然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改进国家行政，那么，老百姓们实在无可奈何，只好乖乖地做个逆来顺受的良民了。唉，奈何。

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交通，似乎比国家行政更加纷乱。中国古籍没记载古代都市交通的情形，无法详知；不过，宋朝张择端曾经画了一卷清明上河图，图内所描写的交通情形，似乎只有一个“乱”字可以形容。今日的中国，大陆没去过

不知悉，台湾的情形实在不敢领教了。台大历史系有两位教授饭后路边散步，被机车当场撞倒，魂归西天；中文系毛子水教授年迈八十余，被机车碰倒路边，弃之不顾，赖自己匍匐上计程车，才免于劫数；用“马路如虎口”五个字来形容台湾的交通，恐怕一点也不会夸张。说交通紊乱是都市现代化的过程，恐怕是推托之辞。香港人口密度居世界之冠，马路里数之少自在台北之下，然而，行人尽管拥挤拥挤，交通却一点也不紊乱。如果说这里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管理”两个字了。

中国人也许不是不善于管理，而是懒得认真去管理。马路是大家的，就是变成虎口也无所谓，顶多不是自己小心一点；衙门官府一年难得走进去一趟，反正尽量少惹他们就是了。抱着这样的苟且态度，当然没法子把公家的大小事情管理得好。大家得过且过，国家不是到了快要倾垮了，恐怕难得有几个人要去打理。你看新加坡，那是个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家，下至沟渠水道，上至国家行政，样样都不但有条理，而且样样都很有效率；除了后天的教育的不同外，我不相信他们和台湾的中国人在先天上有什么差异，人家可以搞得这么好，为什么自己只在称赞和羡慕而已呢？如果香港一路来都是中国人管理的话，我想，早就已经沉进海里去了，为什么人家做得到，自己却做不到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实在乱得可怕！”内人摇头地说。我们的司机驾着红色的 Datsun 车子，就好像在闹市场推着小购物车一样，尽管菜市场脏乱得乌七八糟，推车的人一面叱喝，一面奔驰，目中无人，如履坦道，本领之高超，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我们坐在车子里，除了心惊胆跳、头昏眼眩之外，还不禁要赞叹司机庖丁解牛式的驾车本领，只有在这么样的环境下，才能磨炼出如此超绝的驾车技术和如此大胆冲刺的勇气。

“你敢过马路吗？”我一面手指马路一面问着内人。在台北过马路，实在是一门学问，复杂高深得很，有时还得用上心理学。当你正踩着斑马线时，你得伸长颈项看看交通灯，并且以畏惧的心情猜度那一排蠢蠢欲动的机车、计程车、公共汽车及大卡车的心理状况，看看他们何时就要冲锋杀阵。这一排队伍，就像备

战底下枕戈待旦的忠勇部队，绿灯的号令只要在下几秒钟闪现（他们早已猜到了），他们立即乘着光速，蜂涌地喊叫过来。那些机车，都是高速公路上的第一等骑手，他们绝大部分都会脱颖而出，跑在时代的前头。他们夹着轰隆的枪炮声，骑着呼啸的火箭，奔驰在万民迴避的大马路上，想当年列子御风的冷然快意，实在也不过如此！公共汽车的司机是台北交通界的一绝，街旁站牌相距不过数百码，停停走走，本来也没什么快意可说，他们却认为驾车应如驾汽艇，汪洋一片当前，尽可冲浪直飞，明明是一部载客七、八十人的大车子，却跑上快速的路线，作马奔式的驰骋，享尽快意，看看站头快过去了，立刻作紧急的曲线插入，车子像西班牙斗牛场的疯牛一般，气得车胎直叫，车身直摆，使劲地要把乘客抖出车外，咆哮地要把左右两旁的车子踢翻。至于计程车，那更不用说了，他们驾车就像青蛙三级跳一样，神通广大，左右逢源，永远跃在人家的前头。看着这些当街表演的竞跑决赛，你还有勇气横步穿越吗？

中国人不愿意管理公事，恐怕跟懒散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一路来都是农业社会，虽然一年到头有繁忙的时刻，却也有好几个月是休闲无事的日子。你看，刘备下乡去三顾茅庐的时候，不但诸葛亮睡到日上三竿，他周围的读书人甚至都是一只一只的闲云野鹤；再看看水墨画里的人物，不是坐在溪边赏瀑布，就是在书僮陪伴下倚杖漫步，要不然就是两人树下对聊数个时辰。说农业社会是个半静止的社会，实在一点也不夸张；中国几千年来都泡在这么一个社会里，要不是鸦片战争敲醒了他们，恐怕他们永远还在半睡的状态中。要推行现代化，就必须改变为讲究效率和速度的性格，而效率及速度大半都奠基在“管理”之上。今天，“管理”已经是一科专门的学问了；如何管理，用什么来管理，如何简化管理的层序，如何把管理运用在各种事物上，这些，已经是现代化的一科重要学问了。如果拙于管理，不要说谈不上速度，连效率都大成问题。这十几年来，台湾逐渐披上现代化的外衣，私人企业及部分国营公司的确已经懂得“管理”的重要，效率和速度的性格已在成长之中，只要循此努力，有朝一日，将成为他们新性格的一部分。

人口是那么地众多，耕地又那么地有限，如果要维持安分守己的生活，只有克勤克俭一条路子。如果生活条件充裕有余，过的是克勤克俭的生活，那才是值得称道；如果是因为生活条件太差，人口又众多，不得已大家只好省穿节食，那么，所谓“克勤克俭”就不是什么值钱的美德了。不用人定胜天的毅力去现代化及广开经济来源，反而要大家省穿节食，在我看来，恐怕是本末倒置的一种治标办法而已。无可否认的，中国人及海外的华裔得益于“克勤克俭”的古训实在太多，不过，清代以前中国是个人口多国家穷的农业社会，“克勤克俭”恐怕是为了维持集体的生存，而不见得完全出自于内心的美德。

试看台湾，经过几十年的休养聚蓄，不但迈进工商业社会，而且是亚洲富庶国家之一，我就看不出台湾中国人骨子里头含有祖先们克勤克俭的美德。餐馆天天暴满，炊金馔玉，一食万钱；舞厅夜夜笙歌，左拥右抱，金迷纸醉；电影院场场满座，灯烛荧煌，热闹喧腾，那里像是“克俭”者的后代子孙？

中国大陆吗？情形可就不清楚，不过，在香港住了好几趟，依稀可以知道一些。他们的制度跟民主自由国家完全不同，“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另一方面，他们在生活上不需要竞争（在政治上却又太尖锐了），所以，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克俭”是不得不做到！因为人口比从前更多，国家还是那么穷；

“克勤”倒完全不见得了，反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何苦去“勤”呢？许多从大陆逃出来的难民，在香港帮人打工，不上几天就被辞掉了，为什么？“太懒了！”这是雇主的答覆。唉，中国人“克勤”的性格到那里去了呢？

计程车飞驰地经过罗斯福路，刚转进和平西路，突然就停下来，明星大饭店摆起巍伟的身体挡在面前，差一点和我们相撞。四顾一下，这里不是当年国都戏院的旧址吗？我和内人还在这里看过根据徐速原著改编的「星星、月亮、太阳」以及杨群主演的「路客与刀客」呢！当年这里只不过是条巷弄，拥挤促促，吵吵闹闹，完全是都市的一个偏角，好像人体的盲肠一样，如今，街道宽敞，大厦栉比，车如水、马如龙，和现代都市没两样。看到这景色，内心焉得不开怀舒畅，唉，来得还算不迟呵……。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志之士不知开了多少济药方，找过了多少外国医生，消耗了多少国家元气，戮杀了多少无辜生命，如今，台湾终于摸到了一条门径，至少在经济方面是相当不错，政治方面总还是民主自由体制，为中国的未来开启一条模范的门径；至于大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得让世人引颈长待。如果整个中国能有今日台湾的成绩的话，那么，为中国而捐献一生的孙中山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之下，万死而无憾的。做为一个中国人，祖先优良的遗训一定要遵守；即使富甲天下，也得“克俭”；即使国有余量，也该“克勤”；如此，祖先们“克勤克俭”才得到新的见证人，发扬光大，成为世界美德之一。也许百余年来太苦了，也许百余年来太不安定了，今天，好不容易赚得个小康局面，应该坐下来享享福了。抱着这种心态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人就应该奢侈吗？人就应该懒散吗？人类还有多少年的前途，人类还有多少代的子孙，为什么不为子孙们节省一点？为什么不后代们勤劳一点呢？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已经变成“不浪费不懒散就无法生存”，刚刚坐起来的中国，你们应该知所警惕的，不是吗？想到这里，不禁触景生情——新马华人的先辈泰半白手创业，既勤又俭，如今年轻一代，恐怕就没这美德了。

中央之国（三）

台北除了人众车多之外，传统的寺庙及外国人的教堂也特别多，几乎到了每巷一庙每街一堂的地步。寺庙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吉隆坡、檳城、马六甲及新加坡也随处都有，看起来似乎还习以为常；惟独天主基督的教堂及会所，会所之多，会名之奇特，看起来总觉得有点儿别扭。不晓得中国大陆从前是不是如此。不过，想起协和、清华、燕京及辅仁等大学当年的势力和声威，以及当年教堂教士的特权，那么，情形大概也和今日的台湾差不多。新、马地区华人不可不谓多，但是，那有这么多名称不相同的教会？又那有这么多的会所？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台湾的不正常了。

尽管是一个摇笔杆的知识分子，对于任何宗教，我都有几分的敬意和亲切感，佛教、天主、基督乃至伊斯兰的圣典，都略加涉猎；即如流行于新、马两地的德教，也因为好奇而在研究之中。说我因为没信教，才看不惯台湾教堂林立及耶诞节贺卡雪片般纷飞的现象，是冤枉之辞。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不但两次受过异族的统治，而且经常在北方、西方、南方，甚至于东方的不同民族的暴虐淫威之下，饱受欺凌和屈辱。蒙古人及满州人的入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方匈奴骚扰战国、秦、汉，西方突厥骚扰李唐，东方倭寇骚扰朱明，南方越南骚扰今日之大陆，其他还有五胡乱华、契丹、女真等等，多不胜数；说中华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即在金戈铁马、枪林弹雨之下过日子，恐怕并不过分。另一方面，人口多，永远维持陈旧的生产工具，除了开疆辟地作农耕之外，不会发展其他经济资源，内有隐忧，外有强寇，于是，打从明代开始，南方的人就不断向海外逃生，你说他们是不可教养的顽民也好，你说他们是“不安本分”的流氓也好，总之，他们是冒着生命的绝大危险

离开那个地方。如果家暖室香的话，谁个愿意到蛮荒不毛之地去冒险？华夏民族不能安居于自己的土地上，举此二例，其他的就可以了若指掌了。

再以文化而论，这个庞然大国，不但时常受外国文化的影响，而且，甚至于以外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汉朝开始，从西方传进来的佛教，就一直震撼着他们，不出两百年，这股文化几乎风靡了整个黄河流域。到了南朝的梁武帝，舍身出家，惹得臣子们花一大笔金钱去把他“赎”回来。在朝的如此，在野的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唐朝更不小必说，举凡美术、音乐、绘画及文学等等，都莫不受佛教的影响；当时的哲学，除了佛教思想，中国本身的那一套简直是消声匿迹，不知道隐藏到那里去。韩愈的原道及原性，李翱的复性，如果和鸠摩罗什、道安及慧远的译著相比的话，大概跟小巫见大巫差不多，佛教“倾天下之民”的局势是注定的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央之国，再加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历史，面对着这股西来的外国文化，竟然瘫痪而失去招架的能力。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尴尬难安——亏得儒家厚植了千多年的根基。一直要到宋朝，儒家学者才好不容易把这粒坚硬的舍利子，囫圇吞枣地嚥进咽喉，成就了自己理学家的大事业。其实，宋代理学就好像裹着肉馅的包子一样，那薄薄的一层面皮是孟子的性善学说，而那一团肉馅却还是佛教思想。说中华文化善于融合外来文化，甚至于说中华文化胸襟博大，“海不辞水，故成其大；泰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似乎都只往好一面说；设若身毒当时是个人口众多的强国，除了宗教之外，尚且挟其万钧难当的政治、军事东向而来的话，又要怎么个说法呢？蒙古及满洲所以“淹没”在中华文化里，那是因为他们只有军事，没有文化；身毒有崇高的文化，如果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和坚强的军事政治的话，那就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了。西北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及云岗石窟等的美术绘画，今天看起来，还是使人怵目惊心，喟叹不已；当年中华儿女被震撼惊撼的程度，是可以想像得到了。

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去了那里？偌大的一个国家，政治军事被人欺凌，宗教艺术哲学也漫长的一段时间让人称王称帝，要不是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话，恐怕已经是蛮夷之邦了。知识分子呵，知识分子，到底去了那里？

中央之国未尝没有杰出的知识分子，你看，先秦诸子那个不是生龙活虎、雄纠纠气昂昂地开创他们的思想？从儒家到纵横家，从老子到公孙龙，他们无一不学富五车，农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国防等，都是他们研究的范围，都是他们驰骋才智的疆场。今天到齐国，明天到魏国，后天到楚国，转战千里，迂迴异地，身担万民之大任，肩负天下之道义，气魄何其雄伟，意志何其坚韧，视野又何其辽阔。他们的思想，如闪闪发光的雷电；他们的脑筋，如澎湃不息的洪流；像这么样大开大阖的气度，真是壮如山河、猛如虎豹。汉朝以后，知识分子完全变成“书生”，守着父子相传的经书，抱着师徒传授的义理，矻矻琐屑，支离残缺，没有勇气雷越一步，更不要说开创新基业另垂新统范了。两汉四百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其他的都把脑袋消耗在守成之上。回顾起来，真有些可惜可叹。

孔子不相信怪、力、乱、神，他老人家是现实主义者，主张人类的眼光要在人生现实社会里，即使你想越脱的话，也在你今生的当世，而不是在茫洋不可知的来生。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一切宗教都想根据人死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一切宗教都把事奉鬼神摆在事奉人类自己之上；孔子的思想恰好相反，人生比人死还重要，事奉人类自己比事奉鬼神更要优先。正因为孔子极度重视人生现实世界，所以，他完全把人类精神上的慰藉和乐趣寄托在现实世界里，通过道德的实践和仁爱之心的发挥，人类在现实世界里既已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和生活上的乐趣。孔子晚年之际，子路请问他的人生大志，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试问，这和宗教生活及宗教乐趣有什么差异？孔子的想法和做法并没差错，问题是，孔子是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他的想法太清高了！清高得连普通知识分子都无法领悟和实践，更不必说没有受教育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面对漫长无尽的死亡，孔子“不要看、不要想”的态度解决不了烦恼，一般知识分子只有求助于老庄思想；通过后者，他们才得以自我排遣和解脱，得到逍遥达观的精神慰藉。然而，老百姓呢？没有受教育的芸芸众生呢？他们要怎么办？天变地幻，电光雷响，山崩地裂，生老病死；这些，对他们来讲，

更是恐怖无措。谁去满足他们的幻想？谁去慰藉他们的精神？那些文绉绉的书生，垂下门帘自我隔绝在屋子里头，守着自认为有用的圣典，焚膏继晷，孜孜不息；任江山荒芜，任民生枯朽，任嗷嗷百姓饥饿终生。他们太清高，也太自私了！他们获得知识后，竟反脸把供养他们的老百姓撇开，任他们烦恼一生。当佛教从西东来时，还有什么要犹豫？还有什么要等待？情形就好像干草逢时雨一般，全部倾倒下去了。

乱也乱过了，杀也杀过了，到了休息片刻的时候，于是李唐来了。李唐来临之际，知识分子几乎都往佛教那里钻，那些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莫不“brain drain”，把脑筋虔诚地奉献过去。智头、湛然、玄奘、道宣、神秀、慧能、马祖道一及百丈怀海等等，都是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及韩非子，气度高昂，胸襟博大，才华卓越。到了这个时候，传统的知识分子才楞住——中华文化原来地倾东南，传统的文化原来并不完整成套。意识到情况的不对而作出反击的，是道教和所谓理学先驱的韩、李。道教历史未免太浅短了，似乎不是佛教的对手，虽然几次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却始终无法取代这股“外国宗教”的统治。韩愈和李翱势单力孤，更不必提了。

赵宋之际，儒家和佛教表面上平分天下知识分子，实际上几乎所有儒生都熟读佛教的经典。明朝的时候，儒生承继宋代的事业，把那粒舍利子再行消化，继续讨论心性的理学。这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一部分很关心政治，但是，大部分都中了舍利子的毒——学了禅宗的榜样，不读书，不顾民生民族。你说，这是先秦诸子的后裔吗？谈了大辈子，都只在“尊德性”“道问学”里逗圈子，百姓不饥饿流离、国家不衰弱凋弊沦落在奸诈的手里，才是稀奇可怪的事。看看先秦诸子，甚至于只是书生本色“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他们谈政治，谈经济，谈军事，谈国防，谈教育，谈工商农业；为什么汉以后的知识分子，越谈越少，越谈越琐碎？

清代入主中国之初，倒还有几位诸子模样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及黄宗羲等，不愧博学之士，只因时局所限，不能坐言起行而已。往后的知识分子，似乎都不

能多看；他们几乎把全副的脑筋放置在故纸堆里，一字一句，一行一节，一章一卷，像吃桑叶的春蚕一样，一点一滴慢慢地咀嚼。经史子集，然后是科际性的文字、音韵、校勘及训诂，块砖碎石像砌金字塔般地砌上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白首皓发也在所不惜。他们说，惟有如此细心耗时地研究，才能探获古代圣人、特别是孔孟的伟大道理，大部分知识分子因此而埋葬整个人生，他们不是追求不到孔孟的圣学，就是陷进去而无法自拔，迷失在琐屑零碎的纵横交叉道路上。其实，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在应该知道，即使获得了圣学，也一定不适合于今天。所谓圣学，只是几条大枝大节的原则；后人只需掌握这几条大原则，自己创造适合自己时代的标准和思想，作为立国立国的精神就行了；剩下的时间，尽可用在民生民族的问题上，犯不着在故纸堆里钻一辈子。如果把大部分一流人材的脑筋，用在开发资源、建设经济、巩固军事国防、创造成套文化、提高国民道德及改革败俗陋习之上，那么，大清的江山恐怕还保存到今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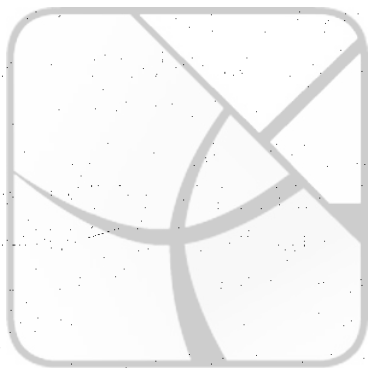
清代号称学术鼎盛，实际上只得“考据学”三字而已。美术、音乐、绘画及文学，都比不上“外国文化”统治的盛唐；至于哲学思想，严格说起来，却是非常的贫弱，甚至于“空白”二字也用得上。民国建立以后，思想上的真空立刻受到外国思想的填补，一时，什么易卜生主义，什么杜威思想，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共产思想等等，真是多如过江之鲫，另一次外国文化的统治似乎不可避免了。满清知识分子自鸣清高，闭门追求“圣学”，在哲学思想上交白卷，不但自己误了国运，也贻害国民。唉，从先秦诸子身担万民、肩负天下的气势，到清代叮叮雕虫的小家子气，相差岂只十万八千里而已。

掀开来大饭店的窗帘，台北教堂栉比鳞次，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第一流人材都躲到“学术”去，其他知识分子又有啥作为？什么宗教，什么风俗礼仪，什么制度，任其荒芜，任其枯朽。梁漱溟在民初说过，中国文化是“早熟”的；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中央之国汉以后并不是没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些知识分子都闭起门来“守家业”，不肯去另创天地，否则的话，先秦恐怕只是个“启蒙”而已。

当然，这个地方过去的统治阶级也非常刻薄冷酷，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眼中钉，不让他们有好日子过，更不要说放手给他们胡思乱想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第一次警报，汉高祖臭骂儒生，甚至尿在儒生的冠帽里，更是第二次警报；往后因文字狱而被杀被夷的，更是多如草芥，几年前还得了个“臭老九”的雅号。唉，这种可怜的境地，恐怕也是世界第一。一方面是当政者刻意安排，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没法逐步争取，所以，知识分子落得只好消磨一生在故纸堆里，组织文字，憧憬古代的圣贤，“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语），想想也实在是可怜可叹。国家的损失，也是民族的损失呵，中央之国。

把藩篱撤除罢，把藩篱撤除罢！为政的，还有知识分子的。

六月十五日抄



文化协会两年

大马华人社群基本上是个商业社会，除了商场之外，其他文化层面也或多或少地沾染上商业气息。乍看之下，不免觉得难过呕心。华人在这里搞政治，实际上恐怕和做生意没两样，几个股东联合经营，生意越做越旺，自己却由于经常变卖股权，而且时常削价做亏本生意，反而越来越无法维持下去。家庭负累那么重，公司发下来的红利及薪金却是越来越少，虽然在股东会议占有小部分席位，偶而也抬头吭声，无奈自己那一分是越来越难于养活一家人口。在这么样的情形之下，只得利用下班的时间，在外头搞些小买卖，补贴家用；否则的话，一家数口在通货膨胀的今天，如何生活下去呢？生意做到这个地步，责斥他腐败无能的确是腐败无能，怜悯他可怜也委实是可怜。谁说做生意不是如上战场？你不力拼就是被拼，你不力争就是被征服，这是没人情的现实；华人这场大生意做得一点也不好，不但亏本，恐怕后代子孙都要负债。

前几天，黄昆福医生及赵自新先生来台北，见面之后，内心不禁激起一阵阵的涟漪，许久无法平息。文化协会准备本年八月间在吉隆坡举办一个最大型的书展，由台北出版界资助，他们俩人千里迢迢飞来此地，向台北出版界请教，并且邀请他们前往参加。作为文协的顾问，也略尽棉力，力促其成，为马来西亚成就一件美事。

文化协会是华人社会下班后的小生意，虽然规模很小，只要于生计有补，你能说不支持吗？你认为政党不是你整体的一部分，他在方桌上却是公认的代表；今天生意做到这个地步，过去的部分经理及职员固然有责任，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是有问题的。同是一条船，舵手及桨手有问题，沉下去的是整条船，而不是舵手及桨手而已。

参加做小生意的工作，应该是那年从伦敦回来后的事。理事会的名单我并不是完全满意，开列名单者不听我的劝告，拟出这样的一分名单，使我陷入困境——以一个党外的人士，来领导绝大部分是政治人物的理事，顶头的会长又远在千里之外，这样的工作如何会讨好？这样的生意怎么可以做？义务秘书几次到研究室来，我都一再摇头叹息；唉，华人对政治缺乏眼光和胆识，从文协第一届理事的名单，似乎可以一览无遗了。如果文协是政党的，文协似乎不需要注册，而且更不需要成立，他们各州及中央不是有文化局吗？成立了文协，简直是叠床架屋；如果文协是开放性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全体华族推动自己的文化，那么，大可遴选无党无派的文化人进入理事会，产生推波助浪的作用，早日达到预期的目标。如今，既注册为民间团体，理事会又尽是政治人物，文协最终不紊乱自己的脚步，才是一件稀奇可怪的事。

“政党人物和非政党人物为什么不能合作？成为文协的骨干分子。”谁愿意否认这个可能性，无奈在目前的现实里，这句话说得太早了。文协的成立，只是一个起站；是不是要从起站向前跨，主催者必须表示其诚心以及考虑当前华人社会的客观环境，而华人知识分子恐怕有责任撮合两者的关系，俾使文协向前开步走。如果文协不能在理事的名单里表示其诚心，文协顶多只是个文化局的翻版，难于影响华人社会；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负起撮合的责任，设法为这条船开启新航线，那么，所谓知识分子云云，和世俗一般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从伦敦回来后的第三个月，文协的组织就重新厘订，理事的名额也重新规划，文化界的活跃分子又逐一被邀请参加。这个时候，非政治人物的理事就大量增加，文协注入新生机后，理事会的会议才不至于像过去一样经常流产或改为非正式会议。

新理事成立后，文协开始准备活动；这个时候的文协，窘事特别多，想起来真是不胜吁嘘长叹。

文协的“迷你”会所约四十平方呎，除了七、八张旧桌子和整十张旧椅子之外，简直是“家徒四壁”，连开会时一个喝水的茶杯也没有。除了每月一会，这

个会所永远是深锁的，没有电话，没有办事人；会毕，所有理事就“化整为零”，烟消云散。

因为组别太多，大部分的月会都是马拉松式的，上午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四、五点为止，昏天暗地的五、六个小时就靠一碟“炒棵条”和一杯“咖啡乌”的午餐来维持。这种傻劲如果用在商场或情场上，我想，早已致富成殷商或女朋友上打了。无奈这十几个大傻瓜却偏爱到这里来吃“炒棵条”和“咖啡乌”，每月一次，而且还有气力争得脸红耳赤！那家别无分号的“炒棵条”实在太难吃，量少还不打紧，炒得黑黄黑黄的，吃起来真不知是什么味道；尤其是那些烂豆芽，根比茎长，直叫你的牙缝难过。半年后，经济稍微好转，每人才一包肯德基家乡鸡，让与会的人比较心满意足一点。

会所的冷气机是人家淘汰过来的旧货，用得太久就会发脾气吼叫，最后索性罢工休息，十几二十人闷在“迷你”房间开长会，味道如何是可想而知；亏得郭小姐及一位女理事沉住气，陪我们十几个“臭男人”挤在房间里！几次向楼上交涉，一个字也没发下来，其窘更可想而知。

首一年半的文协并没有全职的秘书，郭小姐只是借调过来兼职而已，除记录会议外，平日绝不在会所，协会有活动要办理时，就得到五楼找她“帮帮忙”。清楚地记得，为了推动第一届文学奖，我就央托她帮了几次忙，并且站在那里等她把事情办好。其他几位热心的理事，想来也莫不如此。当时站在那里的窘态，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更非外人所能了解。

每次开会，最使人担心的倒不是“等一下吃什么”，而是“Quaram 够吗”；理事会挂名的人实在太多，他们已经身兼政经数职，那里有兴趣来这里闷吃炒棵条？缺席的老是那十几位，经常阻碍月会的进行。碰到这问题时，义务秘书最伤脑筋，最后通过一条议决：“三次连续缺席，以自动辞职论。”结果还是不管用。理事会新旧理事非常多，三分之二是挂名，真正推动文化的只有新进的三、五位而已；说起来也委实可怜可悲。

第一届文学奖是在极度艰难的情形下创设成功的；自己草拟章则，站着等郭小姐打字及发新闻，托人写成叠的信封及贴成叠的邮票，自己组织评审委员会等等，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已沦为文协的秘书了。第二年春天，钟先生推动了“七八年美展”；夏天，又主办了“书法训练班”，文协的名字乃逐渐打开，让华人社会感觉其存在。

文协的人事还算相当和顺，会长黄医生是政坛元老，那时又是上议员，德高望重，对于文协的工作，他永远是抱着最大的热心，时常飞上飞下，不过，由于为人太好，有时倒无法制止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另一方面，他远在吉兰丹，文协发生什么事情，几乎大部分必须由我来取诀，无形之中，我的责任竟不逊于黄医生，美展及书法训练班的推动，都得由我来参与奔走及克服困难。一九七八年夏天决定主办“文学研讨会”时，我的工作更加繁重，而文协却连一个全职的秘书也没有。为了迎接“文学研讨会”，我决定一口气出版三本学术丛书，工作更紧张得如从政者应付全国大选一样。那年秋天，文协请了一名全职秘书上任时，研讨会及丛书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就在研讨会举行的前两周，黄医生远赴香港。对华人社会来说，这是第一个民间的研讨会；往后留台联总、南大校友会及马华公会的研讨会，都受此风气之影响。研讨会结束后，“文协的工作不可以再做下去了！”我萌起离开文协的心意。

一直到目前为止，一九七八年是文协最活跃热闹的一年——七八年美展、文化团体联谊会、书法训练班、文学研讨会、歌乐节、学术丛书及个人画展，总算为文协的活动奠下一个规模。除了书展之外，这么多年来文协的活动，都没有跳出当年所订下的项目。

全职的执行秘书上任后，并没有给文协带来太多的益处。文协是一个推动文化的单位，但是，他却带进太多的政治味道。几位理事都忧心忡忡，认为文协将被带引到歪路上去；几经折衷，却没法收到效果。一九七九年春天，受港大副校长之邀，我到港大去担任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员（fellow），临行之前，辞却了文协的工作。

文协的目标是正确的，我们有句话说：“不以人废言。”难道就因为主催者的旧账，连推动正确计划的协会也要废弃吗？华人社会目前不能接受文协，也许并不完全是华人社会的错误，不过，历史将会证明，文协这档小生意是值得去做的。谁不知道大生意能赚得更多？更能维持整家人？可是，你得承认，如果小生意走的是正确的路子，也能够有补于家用；至少你得承认，小生意并不碍于将来大生意的发展。就以书展来说罢，谁愿意千里奔波来办这件事？难道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吗？如果文协愿意办，你就以其“人”而废其“事”吗？走千里路，必须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登千呎峰，必须从山下的第一级开始；今天的华人社会，难道不是需要从重新开始吗？

勇于推动这个巨轮、敢于撮合华人社会的裂缝，必定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除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还会是谁？

六月五日抄

国 宝

中国拥有很多国宝，不论是台湾或者大陆。这些国宝，有的已经被发掘而重见天日，有的还继续深埋地底，包括祖先们及后代子孙们践踏的土地。

在台湾，著名的故宫博物院早已威震遐迩，成为观光客必到之地，也成为当地国民接受历史教育最理想的场所。博物院座落在外双溪，以宫殿式的巍伟姿态向两边山隩伸延，中间的大殿鼓着肚皮仰首靠在山边，整座建筑物的气势，就如六千年古文明从天外垂云而下，直压到你的额角一样，迫得你只觉渺小短暂。在这里，宋、元、明、清四朝近千年的历史文物集于一处，件数之多，非你我所能记得牢；据说，院方即使按照正常的展出每四个月更换一次展览品，也得十六年后才回头轮番一次。所藏国宝之丰富，恐怕不亚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

在大陆，晚近数十年出土的文物和竹简帛书，数量虽然还赶不上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不过，其价值之昂贵，影响之深远，恐怕非寸管所能形容。平山县出土战国时代中山国的十五件编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山东临沂出土的竹简，骊山边出土秦始皇时代的巨形陶俑等等，虽然样式略嫌单调，不过，却都是公元前二百年以前的宝物，对古代历史及文献的影响将非常大，其为国家之瑰宝，更无庸多费笔墨了。

在台北念书的时刻，我经常以朝圣者的心意，乘大有四十五路的公车，花一个小时的车程，到这座象征六千年古文明的现代宫殿，焚香作揖，顶礼膜拜。这里是亚洲文明的泉源，在太古洪荒的时代，是北京人提起第一把石斧，敲响了人类文明的第一声；是北京人划出第一根火把，将亿万年混沌蒙昧的历史焚烧成灰烬；这一股文明，像四射的五彩烟花，冲向苍穹，笼罩整个黄河流域，照亮了大半边的渤海湾，也照亮了整部亚洲历史。

回来马来西亚后，由于研究上的兴趣，时常留意大陆考古界的消息。尽管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政治搞得天怒人怨，不过，田野工作倒是做得相当杰出，至少是空前。这次经过香港，就曾经向饶宗颐教授说过，这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方面数得上手的，似乎只有一个半手指，田野考古是一个，语言研究是半个，其他几乎都数不上。他同意我所说的前一个手指，对于后面那半个，“语言学的理论还是老一套，顶多只有三分之一”，不表赞同。说实在的，这十多年来出土的古代文物，不但显示出这个国家远古文明的确是灿烂无比，同时也向世人显示，还有无数的宝藏深埋地底，留待后人的发掘。

什么毛公鼎散氏盘，什么白玉茶壶肉形石，什么竹简帛书，什么编钟陶俑，你以为真的是国家之宝吗？过去的及今天的人都作如是想吗？发掘自祖先们踩踏过的土地，是奇玩古董；真正的国宝，是发掘自今人所踩踏以及后代行将踩踏的土地上。

远在春秋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故事。

楚国有一位大夫，名叫王孙圉，受聘出使晋国。晋定公对这位使者非常礼遇，特地举行国宴来欢迎他。席间，晋国的赵简子击着叮当作响的玉佩，带着关心的情意走到王孙圉的面前，问道：“贵国的白珩还保存着吗？”王孙圉答道：“保存着。”简子带着羡慕的神色，赞叹地说：“那是一块最珍贵的国宝，传到现在不知已经多少代了！”王孙圉迷惑地摇着头说：“我们楚国从来就没把它当作国宝。”赵简子楞住了；难道他的耳朵听错，像白珩那块举世无双的玉佩，竟然不是国宝！王孙圉见他狐疑不定，立刻详细地解释道：“我们楚国所引以为宝的，是下列几件；第一件是贤能的观射父，我们楚王如果和其他诸侯相周旋，他能代写各式各样的外交讲稿和来往辞令，写得非常得体稳当，不会让我们的国君召来丝毫的是非；第二件国宝是左倚相，他能讲述古代各朝的文献和掌故，并且分辨人间万物的长幼次第。每天清晨及黄昏的时刻，他就向楚王讲述过去的、当代的善善恶恶，使到楚王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不要忘记先人所传下来的国家。他还能够很妥当地侍候上上下下的鬼神，疏导它们的喜怒，使到鬼神不会来惩罚我们的

国家。我们楚国又有一个很辽阔的云梦泽，那里出产金、木、竹及箭，还出产龟、珠、角、齿、皮、革、羽及毛；这些土产，除了用来充当我们的军饷之外，也足够我们防备各种意外。以上三件，才是我的楚国之宝。至于说白珩，那不过是先主的古玩罢了，怎么配当国宝呢！我们楚国虽然只是蛮夷之邦，也知道什么才是国宝呀。”（此事见于国语楚语；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齐威王及梁惠王的问道，内容略与此相同。）

王孙围是多么地执著，执著得近乎痴迷不醒；他也是多么地睿智，睿智得闪烁发光，照耀无尽的历史及无边的世界。玉佩和白珩，不过是前人的奇玩、今人的古董而已；毛公鼎及竹简帛书，不过是过去的文明、现在的陈迹罢了；真正的国宝，应该是于今日国家、明日子孙有贡献的活人。玉佩和白珩，可以在深山里觅得，即使缺少了它们，只不过少了件奇玩古董而已；毛公鼎竹简帛书，在先人踩过的土地就可以发掘得到，即使没有它们，历史还是依旧，文化还是依旧；但是，今日国家明日子孙的国宝，要去那里寻觅，要去那里寻觅呢？

传说远古殷商的时代，有位帝王叫武丁的，他为了振兴中衰的国家，四处搜索贤人，日夜探求才士，无奈事与愿违，每日猎毕总是空手而归。三年来，他脸无笑容，口无一语，只为了获得一位贤能的干才，为国家带来大治，为百姓带来繁盛。也许是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求才若饥若渴的精神感动了天神，某天夜晚，武丁居然梦见天神，启示他日夜梦寐的贤者的面容长相。高兴若狂的武丁，第二天凌晨，立刻把全部的大小臣子召到殿上来，逐个详观细睇；没想全部不合格，梦中人不在簇簇行列里。绝望之余，他把梦中人的面容长相仔细描绘出来，下令臣下按图索骥，搞得朝廷上下翻滚沸腾。事有凑巧，在北海的虞山边，武丁发现了一位受过腐刑的修路工匠，衣衫褴褛，通身污臭，面貌竟长得和梦中贤人一模一样。就像在深山里掘得珠宝一样，武丁毫不考虑地立刻将他抬回朝廷，宣布获宝经过，并且授以国政。这个梦中人，就是极受孟子赞扬的傅说。

也许这个传说并不完全真实可靠，不过，武丁求才甚于求宝，却是千古不移的史实。

战国初年，魏文侯初即位，以卜子夏为国师，以田子方为严友，以西门豹为河内守官；百姓乐业，国家强盛，为七国之首冠。虽然如此，对于才士，他还是时刻留意，视若国宝。当时，在魏国某个穷乡陋巷里，正住着一位年迈的老者段干木，德贵义高，才学兼人，故尔声驰千里。魏文侯仰慕其人，如渴者羨时雨，如枯草临甘露，无奈段干木怀君子之道，不趣势利，不染俸禄，非文侯所能亲近。一位是高洁如碧玉的贤者，一位是胸怀万壑的圣君，却因为道不同而无缘见一面。魏文侯每经这个穷乡，必定放慢马车，然后，轻车绕过那条破旧的陋巷；抵步之前，更必定手抚车轼，身往前俯，向巷弄里行鞠躬之礼，一直到车出乡口，才肯挺身仰首。

说玉佩白珩是奇玩古董，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被欣赏、被玩弄地存在着而已；说传说段干木是国宝，那是因为他们被衷心地爱戴、诚心地尊敬着，成为今世后人的明灯，照耀千古历史的明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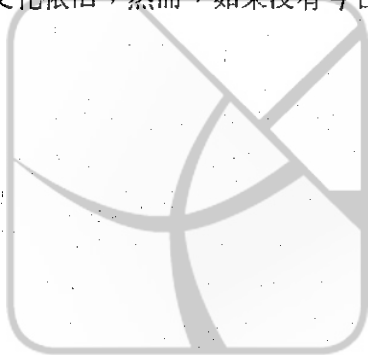
故宫的历史文物不是国宝，我们要的国宝是大智大慧的思想家；他们能牵合东西文化的不同，他们能融化东西思想的矛盾，他们更能统摄上下数千年的东方思想，为我们东方人指引出一条康庄坦道。这类国宝，先秦出现了整二十位，汉代以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一直到宋明二朝，才再出现整十位。两三百年来，东方无光，一片玄黑，西方的暗流肆意倒灌，东方的长城经常倾毁，我们没有哲学者犹如航海失去罗盘，我们没有思想家犹如夜行没有北斗，昨天抬一个高鼻灰头发蓝眼睛来祭祀，今天搬一个黑皮肤卷头发长耳朵来膜拜，东方的家神去了那里？去了那里？我们要看到的，是为家神披上新妆的祭坛牛耳，为旧有思想重作新解的哲人；惟有他们，才是故宫里的故宫、国宝里的国宝。

竹简帛书不是国宝，我们的国宝，是旷世才华的作家，通过他们波浪壮阔的笔端，把东方多灾多难的历史反映出来，亚洲大陆惊天动地的革命再革命，东瀛军国主义挥兵鲸吞的油煎火熬，黄河流域黄毛丫头的沸腾澎湃，印支半岛放臣逐民的惊涛骇浪，都应该留传给子子孙孙，作为基本生活的镜子和教训。应该有上百年了，自从曹雪芹完成红楼梦以来，就不再出现顶天立地的大文豪大诗人，为

我们这个可歌可泣的时代留下史诗，为人类这个永无宁日的一隅留下传奇。只有他们，才是活的竹简、活的帛书，成为活生生的国宝。

我们的国宝，不在故宫，不在山东临沂，也不在长沙马王堆。这数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几位思想家及历史学者，他们为儒家作新解说，为传统文化贯注新生命；我们也看到几位画坛老将，为水墨画开辟新境界，让水墨画蘸吸世界的生命，成为非传统既传统的新画风；我们又看到一些新起的作家，带着那支且吟且歌的秃笔，按着时代的脉搏，奏出哀哀鸣鸣的曲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土地上的国宝，都是后代子孙日夜挖掘的国宝。

你说，钟鼎彝器、竹简帛书有什么用，它们只不过是奇玩古董而已。没有它们，江山依旧，历史文化依旧；然而，如果没有今日活生生的国宝，今日国家多难，明日子孙多殃。



根的文化

抵台后的第二天，我们立刻参加此地宗亲谱系学会为我们安排的节目，包括开会、族谱参观、微卷阅读及晚宴。

家谱学会在这里推展探访搜集的工作，已经有三、四年的历史了；光是几个地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挖出”四千多种家谱族谱，蕴藏量之饶富，真叫人羡慕。根据宗亲谱系学会的估计，只要再继续“挖掘”，三几年后，总数肯定会再增加至少半倍以上。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根”的民族，如果家谱学会把计划延伸到中国大陆去，所能获得到的数量，岂只于区区一个小台湾的千百倍。前几天在香港，就听到一位来自上海的学者说，光是上海市立图书馆，就珍藏了二、三千种，其他南京、北京及武汉等地，更不必说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根及重视根的民族。在他们的文化里，有一种代表根的源头的东西——姓氏，恐怕是亚洲以外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日本、越南及韩国等民族也有姓氏，不过，他们不但比中华民族来得晚，而且，还是受中华民族的影响。根据古籍的记载，黄帝一共生了二十五个孩子，其中十四个被赐以姓，另外十一个“德薄不录”，无姓可言；在那十四人里，有两个被赐与黄帝的本姓（姬），所以，所谓十四人，实则只有十二姓而已。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距离今天已近五千年，在那么悠邈的时代里，他们就已经知道用姓来作为传宗接代的依据了。

说中华文化是根的文化，说中华文化是由成千上万的根错综复杂地组织成的，恐怕都不会是夸饰之词。

先从个人说起罢。所有炎黄子孙，都必定有一个姓氏；这个方块字，就像你身体上的血液一样，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你还没诞生之前，它就像一个无形的符号，烙印在额上，公告世人；成亲生子后，你不但将它别在你太太的

胸前，以示名花有主，还将它交给你的孩子，以期万世相传。它是你这一族的注册商标，你可以改易名字，但是，你不可以换一个树头，另认他祖。如果你有家谱族谱的话，你可以追本溯源，从叶找到枝，从枝找到干，再从干找到最终极的根；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也无所谓，只要和你的商标相同的，准是同一条根同一株干的花花果果枝枝叶叶，不是三百年前，就是一千年前。

提领这个商标，是一件庄重严肃的事情，在你这一生当中，你必须认真对待它，而且，还得时时刻刻体认它的存在。你要奋力不懈地去发光，照耀其他的人，表现你根源的品种的优越，让家人颂赞，让旁人称羨，光尔宗耀尔祖，为全族带来光彩。农业社会大多数是一姓一乡，同乡的人几乎都是一株树的种子，所以，如果你在事业上有什么特异的成就的话，全乡都沾光升天，“吾乡之光”绝不是句虚语。中华民族五千年前都是一家亲，所以，“吾乡之光”“吾族之光”顺理成章当然可以写成“吾人之光”“吾国之光”了。相反地，如果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丢脸的不仅是你自己，你的家人及先辈也被你侮辱了；司马迁当年惨遭宫刑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甚至于“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有些人甘做敌人的奸细，卖家卖族，一生见不得人，最后只好一面迁居他乡，易地为良，一面改名换姓，以示一个毫无来历的人。这些，推究其原由，不外自己行径有辱祖宗，良心上愧对先人。

如果沿这条思路想下去的话，就可以发现：你的行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必须向额前的商标负责，向整个家族及乡邑负责，你是来有所自去有所踪的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你结婚生子，是为全族全乡，所以全族全乡必须参与；你和邻邑的异姓涉上纠纷，甚至于动起干戈，那是两个大家族的事，乡邑械斗意味着即将爆发；你干坏事受处决，遭殃的不是一叶一枝而已，而是连根拔起地夷门灭族，甚至于异姓朋友也数在内。古老的中华文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可以了解一部分了。

其次，就个别社群而言，也未尝不是如此。

一个大家族，就等于一个小国家，你看红楼梦里的贾府，地广人众，和春秋时代的小国有什么不同？而贾政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个人只是一片叶子罢了，地位不但轻微，而且也没有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在乡邑里，你活动于自己的家族内，予取予与，一切都自足。出外谋生经商，你考虑搭上线的，首先是你家族里的人，同姓同宗，可以推心置腹；其次，是和你同方言的，虽不同宗同族，总算是同邑同乡，还可稍稍宽心；如果既无同宗，又无同乡，虽然满街都是肤色相同的人，你还是觉得人海茫茫，伊人不知在何方。血缘性及地缘性的会馆到处林立，不管在中国本土，或在海外，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了。说华人生活在根的文化里，实在并不夸张。

如果这条根有一两个人向海外拓殖，那么，这个大家族大乡邑就好像钩子挂上对岸似的，纷纷顺着这条绳索攀缘过去。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新的拓殖区的华人，竟是由一条一条不同的根组织而成的。咖啡馆是海南人独揽，脚车机车修理是福州人的天下，京果杂货是潮州人的地盘，而树胶买卖却又是福建人的独家生意。泾渭分明，令人叹为观止。

任何树枝及树叶，都必须归根，对他们而言，孝道即是归根的实践。祖坟及宗祠，是你家族的力量来源，也是你家族团结的象征。中国社会安定的维持力量不在国家的法律，而是在家族；个别家族必须培养淳厚敦朴的礼俗，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长，使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那么，国家自然安宁平静了。礼俗的成败，完全系于孝道，完全是基于枝叶的落实归根。

个人及社群是如此，国家呢？

民国以前，中华民族其实并没有国家，有的只是朝代而已。尽管大学里说过“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后来儒家也一致推崇，赞许为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不过，这里的所谓“国”，依然是指朝代而言。朝代是个别家族所拥有的，汉朝是刘家天下，唐朝是李家天下，宋朝是赵家天下，是你凭武力打出来的，所以当然是你的私人产业。汉高祖刘邦在生时，就再三嘱咐他的大臣：“不是姓刘的，不准封他为王侯。”把国家当作刘家财产的欲念，完全暴露无遗。所谓国家

云云，不过是朝代，以根依据的朝代而已。

如果皇帝换成另一个姓氏，那就表示易朝换代，和先前那一朝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了。如果有人想揭竿起义，推翻“今上”的话，当朝的皇亲国戚都得协力镇压，而且，也会被视为“叛逆”“流寇”，因为天下是私人财产，焉可掠夺？西汉被王莽所篡，刘秀就必须奋力，以便夺回刘家的“天下”。东汉灭亡后，只有蜀国被承认为“正统”，因为蜀主刘备和东汉同姓。这些，无不一再地说明，中国只有朝代，没有国家；而这些朝代，实际上就是根的文化的集大成，根的文化的最大组织。

最有趣的，莫过于天下大乱之际，在那个时候，所谓群雄逐鹿中原，其实就是根与根的互相残杀和斗争。他们各自拖着长长的树根，把张良、萧何及韩信等人卷进去，把范增及项庄等人卷进去，就好像拖着巨龙的长尾，滚动着汹涌的风尘，翻腾着澎湃的人马，披坚执锐，嘶喊狂吼，互相摧毁，彼此残杀。从黄帝、炎帝之战开始，就是一个姓推翻一个姓，一支根鞭垮一支根，一条龙尾压翻一条龙尾。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才结束了这种朝代互易、姓氏相残的局面；然而，却有多少人不过瘾！满心的不惬意！

此外，某国家族取得政权后，往往可以把自己的姓氏赏赐给大臣们，受赏赐者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数典忘宗”，“跳糟”为国姓大爷，而且还要以此为无上的荣耀，大事宴客。西汉早年，娄敬有功于汉室，高祖赐他姓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时，纵使所赐者跟皇室不同，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殊荣；明代宦官马三保，有功于明室，成祖赐他姓郑；虽然不是国姓爷，是皇帝亲自点名封赐的，谁说不长高三呎呢？

从上面这些事实来观察，你能够说，所谓“国家”者也，不是一个姓氏的家庭事业吗？

中华民族根的发现固然可以追溯到黄帝的身上去，不过，黄帝似乎没有使它成为文化的凝聚力量。许多学者都把这分功劳归到周公的身上去，这当然没有错；是周公，建立起大宗小宗的制度，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有权利接任先人的地位和产

业，上自国君，下至王侯，莫不如此；是周公，通过大宗小宗的制度，把血统从文化里检出来，当作是团结的表征和依据，国就是家，家也等于国，不同之点只在于大小而已。有一次，有人问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去从政，以便治理国家？”孔子回答他说：“古书上说过：「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才是真正的孝。」只要我在家庭里推行孝道，也就跟治理国家一样，何必一定要去当官从政呢？”家和国不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孔子的话就是一个明证了。所以，说周公是以根为文化的始建巨人，恐怕没有差错。

其实，夏禹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人，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把天下私有化的人；天下既然变成私人的财产，如何使这分财产永远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就必须多多讲究了，当然，夏禹没建立大宗小宗的制度，根的凝聚力还没完全巩固，这是他逊色于周公的地方。

周公从朝廷做起，推行大宗小宗的制度，王侯乃至于士庶人，都莫不竞相仿效，根的文化于是就逐渐建立起来，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质。

想到这里，我不禁对宗亲谱系学会另眼看待了。当年在台大求学时，我参加了孔师德成教授为他长子举行的婚礼，考古学家李济之教授是证婚人，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孔子及孔子的后代，是中国第一世家。”至今记忆深刻。我想，宗亲谱系学会应该是中国第一学会，不管从历史背景或文化渊源来考察，这种称呼是很恰当的。

六月十日抄

文人的书房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人如何治理国家，不妨先观察他们的文人如何管理书房。

中国文人似乎最不善于管理他们的书房。客厅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事关体面，布置自然井井有条，书画古董，茶几案台，都安置在最悦人心目的地点内。厨房是妇女们的领域，女性向来有洁癖和秩序癖，再加上女佣及婢女的协助，不但整齐清雅，而且也跟客厅一样窗明几净。前庭和后院是休闲止息之所，花花草草的栽饰，幽径明阶的曲折，莲池假山的多姿，应该是整座楼房精华之所在。惟有书房，既不是招待客人的地方，也不是妇女及短工所管辖得到的地方，它是整座楼房里的“土多”，是花园里的废墟，是人体里的盲肠，是楼房主人隐形的地方；只有他独擅此斗室，只有他统治此方丈的天地。

因此，文人的书房只有一位国君，也只有一个臣民，他的命令“无远而弗届”，他的行止是举国“认同的对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这个国家里，他可以任意搬运东西；昨天摆在书橱里的书，今天可以陈尸在门边；今天躺在地上的，明天可以打开胸膛展露皙皙的颜如玉。四周高耸的书柜已排得密不通风，按理来说，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各部各类的书籍，然而，我们的天子偏爱“感情用事”，不但书桌上书体横陈七零八落地筑成“书的森林”，即使地上的甬道，也横躺直卧、倒翻竖立地搭起“书的积木”。一套几十册的资治通鉴，腰斩成数段，首三两册在东边书柜的顶端，中间五六册斜站在书桌的左角，还有三几册上个月翻阅了不知塞到那里去；一套二十四史乱得更惊人，大部头的四史、两唐书及宋史，已经失去秩序塞在书缝中，小部的陈书、北齐书及梁书，挤得亡身沟壑，不知去向。至于经书，早已不是经书；子书，更不成其为子书；勉强可以成套的文学作品，也许这位天子对它有偏好，还整整齐齐排阵在那里，让尘埃为它们上胭脂，画娥眉。总而言之，这个书房在他的“颐指气使”之

下，所谓书斋，实际上是书本到处泛滥为灾，祸殃全国。

曾经辉煌一时的摆设，也由于多年来的“意气用事”“朕即天下”的态度，而把书房沦为古董储藏室。一幅幅的书画，不管是赵子昂的画或是王羲之的字，都被“书的积木”逼得贫无立锥之地，贴得墙壁连喘口气的余地也没有。零零星星的古玩玉器，星罗棋布地散在每个角落，东歪西倒，黯然无光。

所谓书房，到头来除方桌上一尺见方的小方方供他开展书本外，这位天子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读书了。

书房固然“乱得不成样”，但是，就好像女人的八宝箱一样，要是想找什么东西，这个主人倒也还找得到哩。找一部书，找一个砚台，你不能说它石沉大海无处觅，它总是“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多费时辰准可以找出来。说这书房整齐有序，它却又未必然，任何古籍或文具，你总没把握伸手即得，它就是要你“寻寻觅觅”“上穷碧落下黄泉”，然后才亮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露在你面前，让你又惊又恼。

紊乱之外，脏也是书房特色之一。傍晚时分，蟑螂像回巢的蝙蝠，伸展翅膀，乘长风，破万里，任意飞翔；夜晚的时候，老鼠带领着一家的老少，从这座森林驰骋到另一座森林，到处野餐和跳圆舞曲；还有，那些永远饥饿的书蠹，把书房当米仓，养得一家家人丁旺盛，六代同堂。

就在这样的半整齐半紊乱、半肮脏半清洁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天子行使他的统治权——或埋首写信写应酬文章，或摊开宣纸挥写斗大的毛笔字，或捏着线装书摇头摆脑地吟哦长歌……春秋冬夏，年复一年。

我们有句老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所说的“家”，在我看来，指的似乎应该是书房。能够把书房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读书人，大致上已经具备了治理国家的基本条件；然而，我们的文人大部分当书房如卧床，乱得如狗窝。

就以交通的管理来说罢。台北比较著名的大马路至少都拥有四条线，来往各两条，大一点的马路甚至于六条线、八条线；大马路两边又有慢车道，专供摩多

车及脚踏车的奔驰；慢车道两旁又有宽敞典雅的红砖行人道，八呎、十呎不等；似此设计和铺设，并不会比外国差，然而，台北的交通只得一个大字——乱。台北的高楼大厦，这十年来的确是达到栉比鳞次的地步，综合大楼、私人住宅、旅馆饭店及电影歌厅，星罗棋布，到处都是，然而，许多房屋都不符合建筑规格，没避火巷，没屋檐，门口盖在马路上，卧房的墙壁就在大路边……。至于街道的设计和房屋的排比，有的是菱形，有的是三角形，有的甚至是弧形，左弯右拐，迂曲前进，和高楼大厦、宽敞大街相配，实在很不调和：乱，乱，乱。有的房屋已经入伙好多年了，暴露在外边的墙壁总是不肯为它们铺上一层士敏土，让一块一块不整齐又丑陋的红砖，怒目张牙地暴露出来，让人们觉得碍眼难过，怎么老是叫自家的楼屋露着排骨掀起嘴唇呢？至于私下加盖的违建，几乎达到了“每座楼一层违建”的地步，木板、水泥，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真是又乱又脏。

有人说，交通管不好，房子整不好，那是没法子的事，因为台北人口太多啦，香港人不是更多吗？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也不少呀！怎么人家搞得来，他们却搞不来呢？交通、房屋及市容，不过是外表的；至于内在的，如官场、政圈及党界等等，那更是不忍谈说。

中国不是没有法律，早在战国时代，法家已经建立了很完整的理论，不但协助秦国并吞天下，统一四海，而且也有过很辉煌的“执政经验”，战绩累累，值得永垂丹青。更远一点的春秋时代，郑国在鲁昭公六年时铸刑书，将法律的条文明白公布全国；晋国在公元前五一三年也步郑国之后，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鼎上，让全国人民有所遵循。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一部四库全书就有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多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套书能够和它相比拟；然而，中国图书分类并不精细，界限时而混淆，书房如同卧房，此中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中国法家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然而，他们并不讲究法律、遵守法律，更没有使中国进入法治的国家。

以法家本身而言，早在先秦时代，已分成“势”“术”及“法”三派，重点不同，矛盾丛生。主张重权势的慎到，认为统治者无论贤不肖，都必须尽量掌握

权势；惟有权势，才能驱使臣属人民。主张“术”的是申不害，他认为权术是万灵丹，统治者运用各种权术来驾驭臣下，是政治的至高境界。这两派学说，实际上已严重地破坏了法家的法治精神和立法基础——统治者既拥有绝对的权势任意驱使全国；那么，统治者不是驾凌在法律之上，而成为“法外之人”了吗？他们既然可以“逍遥万法之外”，谁还甘心来服从法律呢？既然有人可以幸免于法律，那么，间接地也就等于鼓励暴力的产生了。政权必须靠权术来维持，那么，法律还有生存的余地吗？统治者用权术，“爱之者欲其生，恶之者欲其死”，臣属和人民岂不是如堕笼罩中，任由摆布了吗？就在这两派的夹攻之下，重法派丧兵失土，几乎到了无以容身的地步。

即以著名法家人物商鞅而言，当他下令全国推行新法后，太子竟然犯法，商鞅大怒，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立刻要处罚太子。然而，太子不可施刑，只好处罚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名重全国的商鞅尚且必须避“势”用“术”把“法”暂搁一边，至于普通的法律执行者呢？那更不必费辞了。因为“势”必须回避，“术”必须运用，所以，“法”就无法贯通上下，彻底推行。我们经常听到：某某权贵“吃了一笔账”，却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依然尸位素餐；某人的公子“依仗老子的权势”，一手遮天，瞒天过海，四周的人即使瞠目结舌，也徒叹奈何而已。这些，都是“势”的泛滥，“术”的暗施，“法”自然要退避三舍了。

既然法律并不是阳光，可以普照每个角落，那么，“朕即天下”就像支魔棍一样，可以到处乱窜乱钻——裙带关系、跑后门、泰山压顶……，不一而足，只在于你“会不会动脑筋”而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书房焉得不紊乱又肮脏？二十四史焉得不被分尸倒置，亡身沟壑？古画名帖焉得不黯然失光，退逼得缩起脚跟贴在墙上喘气如游丝？谁说他们没有自由？有势、有术的人，那块土地就是他们的天堂。

你说他们没有法律吗？他们是有法律的；就如你说书房的图书没有秩序吗？那又未必然一样。你说他们不进步吗？他们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文明；就如你说书

房没有古董名画吗？那又未必然一样。书房是主人的天地，图书只有主人能够寻索得到，主人不幸归西天，图书古董不是散亡外流，就是尘封为废墟，另一个书房必须由另一个人动手从头做起。国家是天子一个人的私产，法律、臣属和子民都是因他而生存，天子如果英明圣哲，政治就会修明，万一天子撒手升天，就只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如果天子暴虐无道，那么，这个书房就只好准备让尘埃和鼠狼之辈来封闭，另一个文明只有由另一个朝代动手从头做起了。



血缘凝聚文化

晚近一百年来，是中国历史剧变的时代；首先是康梁维新保皇运动，其次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推翻两千多年来的帝制，接着是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闹得民穷财竭，然后是共产政权成立北京，国民政府鼎移台北，暂告一个章节。在这波翻浪腾的层层险涡中，还渗进了外国力量，或直接出兵干预，如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以及日本军阀的西向；或幕后操纵指挥，如溥仪的满州帝国及汪兆铭的南京政权等等。在这风卷云奔、诡谲多变的动荡时代里，一个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力量在那里？所谓“力量”，不是指军事和经济，也不是直接指政治和法律，而是指民族的凝聚力。换句话说，他们能有多强韧的凝聚力，把整个民族组织起来，突破一连串波滔汹涌的险滩？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计划、有系统地把这个民族组织起来的著名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周公。周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姬周本来只是困居西北文化落后的一个小民族，周公佐助武王推翻殷商之后，势力才入侵黄河流域。论文化，殷商比姬周优越；论政治，姬周不过是僻处岐山的小侯，殷商却是庞然大国，组织完善，政体周密；论军事，殷商拥有数百年的国基，护翼她的小国散布四裔，军力之雄厚，自非姬周能比；论经济，姬周僻西北，殷商处黄河流域，土壤肥瘠优劣，悬殊颇钜；再加上各民族杂居其中，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各有差异，于是矛盾丛生，利益不同，试想想，剪除了殷商中央政府的姬周，要如何吞下这头巨象？

为了应付这个严重的局面，周公以他气宇恢宏的大气魄，创制了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制度——通过不同层次的分封，把整个黄河流域瓜分为大大小小的不同土地，然后，逐层地派遣姬周的血统，作军事上的占领。周天子是大家长，其他各

封国是家长的子女；对封国而言，封主是家长，从封主再分封出去的，是封主的子女；如此一层一层地架构下去，整个国家就像个大家庭。他们世代沿袭，区域性的小国以封主为凝聚对象，各地封主以周天子为凝聚对象。伟大的封建制度，把姬周民族巩固及凝聚在自己的血统上，一方面对殷商及其他民族作军事监视，一方面以周家血统作为全国认同及效忠的对象。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周公的封建制度是成功了；他成功地镇压周初殷商及其他民族的叛乱，也成功地把殷商的后裔同化了，更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体系和政治制度。周公历史地位远在孔子之上，而且是孔子一生膺服崇拜的对象，原因恐怕在此了。

突破周公的创制，把凝聚力量从家族往前再提升一级的，是法家的管仲和商鞅。很显然地，周公把凝聚力摆在姬周的血统上，等于把全国划分成两条阵线，一条是掌握政权、军事及法律的姬周，一条是手无寸铁的殷商及其他民族，两线矛盾丛生，倾轧无宁日，国家进步缓慢，国基也时受腐蚀。具备革新精神的法家管仲和商鞅，为着在黄河流域的国际舞台上争霸权，先后突破了家族凝聚的局限，把全国人民重新组织和整编，团结在国家的基线上。在他们的脑筋里，政府比民族更重要，国家比血统更至高，根据史籍的记载，这两位法家把齐国及秦国全体人民整编成一支军队，总司令是国君，参谋总长是他们自己，向经济生产及国际地位开步进军。在此新凝聚目标下，全国不分畛界，上下一心，为民为国。不及数年，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首霸，而商鞅也为秦国奠下雄厚国基，开启并吞天下的序幕。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依旧把全体人民的凝聚目标摆置在国家之上，他推行郡县制度，废除同姓分封的封建制度，最可以看出他的积心处虑了。

如果说周公创立封建制度，把姬周民族团结在一个皇族血统里，对周朝八百年的天下有卓越贡献的话；那么，法家自管仲、商鞅而至秦始皇，逐步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个极权的中央政府底下，让黄河流域摆脱家族血统的分歧，为中华民族开拓崭新的凝聚目标，应该是法家对中国未来历史的一大贡献。

非常可惜的，法家的努力和贡献，不出数十年之间，就被“家天下”的思想

活埋了。

家天下的思想虽然由来已久，不过，它得到封建制度的支援后，更是如虎添翼，根植人心。法家打破封建制度，无形中即等于打破了宗法的血统观念；在法家郡县制度底下，全国人民凝聚对象不再是皇族血统，而是极权的中央政府和架空的君权。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幸由于他过分骄恣和专横，“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四句话，就复活了“家天下”的幽灵；刘邦平定天下后，“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更把天下当作一己私物；刚刚被法家敲破的宗族血统思想，在秦始皇、汉高祖极力膨胀扩张帝国大家长的权力以及严厉限制大权外流之下，立刻假借“家天下”的尸骸，重新回魂，再度新生了。

秦汉以后“家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定制，谁人坐上那张龙椅子，天下就是他一个人的，并且子子孙孙永嗣罔替。所谓国家，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放大”；所谓家庭、家族，也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缩影”。某个姓氏得天下，整个家族都“鸡犬升天”；不幸失败下台，整个家族一定被“赶尽杀绝”。所谓逐鹿中原，所谓改期换代，绝不是政见相异的几群人在角逐政权，而是一支血统和一支血统的争夺战。

在这套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之下，姓氏和血统很快地发展成为整个民族的凝聚对象。家族和血统既然是民族凝聚的对象，那么，家庭的功能必须发展起来，家族的责任也必须扩大出去。

在旧式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打从呱呱坠地到归宁西天，几乎一切都可以依赖家庭和家族来供给：孩子在家庭里出生，所以，家庭是接生院；孩子由家庭的长辈看管照顾，所以，家庭是托儿所；私塾设在家庭里，所以，家庭是学校；成亲是在家庭里，所以，家庭是行礼的教堂及宴客的菜馆；创业时由家长族人放账，盈余归家长族长管存，所以，家庭是银行；有了疾病，医生上门打脉，草药就在家泡煮，全家老少都是护士，所以，家庭是医院；年老力衰，由子女供养，所以，家庭是养老院；不幸子女流落他乡，或者膝下无丁口，同族人士有责任收养

和照顾，所以，家庭是救济院；有朝一夕西归仙逝，丧礼就在家里举行，所以，家庭是殡仪馆；祖先及仙佛的灵牌设在家里，经常可就地膜拜祈福，所以，家庭又是庙寺。在旧式的农业社会里，家庭的确已经尽到了“物尽其用”的境地，成为世界上“十项全能”的机体。

以姓氏及血统为骨干的家庭、家族既然受强调，并且作为民族凝聚力的对象，那么，周公当年以姬周血统来对抗殷商及其他民族，很快就被利用为不同血统和家族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这一副作用，在“家天下”“改姓易朝”的纵恣之下，竟然掩盖活葬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共同凝聚力。

我们把这种血统凝聚以及经由此凝聚而产生的大家庭制度、族长责任和血统间的对抗争夺，称之为“血缘凝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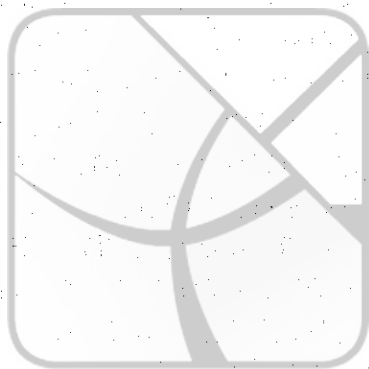
“血缘凝聚文化”的翻版是“地缘凝聚文化”“方言凝聚文化”及“业缘凝聚文化”。中华民族既然习惯于家庭、家族当作团结的对象，自然也就可以比照这种凝聚的方式，将力量归结在乡域、方言及行业的点线上。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许多不同的凝聚文化线，它们像几支富有滋性的铁棒，错综复杂地浮现在今日任何地区的中华文化里，一方面是饱吸各阶层的力量，一方面是彼此离析对抗。

在帝制还没结束以前，我们看到“血缘凝聚文化”里强大的一支，高高驾凌在所有文化线之上，它自动地、强迫地催使底下所有的文化线向它认同和凝聚，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清室逊位，帝制结束，所有文化线彼此排离对抗的弱点，立刻完全暴露出来。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曾经感叹中华民族只有家族，没有社会，更没有国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演讲时，再三长叹：“中国是一盘散沙。”在乡治及农政贡献精力的梁漱溟，壮年时即著书指出，中华民族只有家庭组织，缺乏集团生活。这三位先生，似乎颇能凭自身的经验，把“血缘凝聚文化”指点出来。在维新运动、国民革命及农政建设的过程中，他们一定个别深受此文化的苦恼和迫害。

今天，虽然时代过去了，环境也大不相同了。然而，血缘凝聚文化依旧盘据在任何地区的中华文化里。在中国的本土，在东南亚华人麇聚的国家里，在伦敦、

温哥华的唐人街里，以一支一支的脉系作为凝聚对象的文化组织，充斥街头巷尾，他们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共同凝聚力量，他们更忘记了过去法家整编全族的彪炳事业。在面对风卷云奔、诡谲多变的大时代，他们似乎是瘫痪和无能为力的。



师友记

早在吉隆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好一张名单，密密麻麻地，大约有整五十个字，准备抵达台北后，逐一探访，畅述多年相思之情。情形就好像那张“什么街什么巷应该去走一趟，什么档铺的食物一定要再去回味”的纸条一样，明知两个星期的时间实在太有限，绝对不可能“搞掂”，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想想写写，添添补补，临上飞机还加多几个名字。也许在台的时间太久了，师长多，朋友更多，除了耶诞节及农历新年来往贺卡聊表关怀之外，平素少有音讯来往，所以，分离得愈久，就愈想见一见面，好把对方最新的发展像补充新资料一般，填进自己的“感情资料袋”内。家谱学会早已把首六天填满了节目，剩下的六天，即使串门式的把名单跑一趟，每天少说也得跑上七八户；似此情形，“腰斩”名单作重点式的突击，恐怕又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到文学院系里转一圈后，眼前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看来此行恐怕全部会落实了——系里师友们准备在四月二十日晚上为毛子水老师庆祝九十岁大寿，我尽可以在晚宴上一口气饱览全系的师友。惟一顾虑的是，我没报名参加，又没被邀请，如何出席这个盛会呢？

“那有什么关系呢！”台（静农）老师见我犹豫，立刻摇摇手说：“难得你回来一趟！说不定大家看到你，会更加高兴呢！”

回到旅馆，从内人手中把名单拿过来，一口气就删掉一半！看来在吉隆坡东添西补边想边写的工夫，是没有白费的了。

中文系所有师长里，体型最大、酒德最好的要数台静农教授了。

台公体型大，却大得一点也不俗气。他有一个很会装酒装肉的肚脯（台公不

蔬菜水果），当肚腩装满适意的酒肉后，他就会很愉快地背靠宽敞的沙发，一面回銜雪茄喷浓烟，一面双手快意地上下左右摸挲肚皮，一遍又一遍，似乎有说不尽的快慰和适情。除了肚腩，台公有个相当高大的骨架，配上他的方脸、宽肩、长手，远远看起来，似乎像故宫博物院悬挂着的穿西装的历代开国名相一样。当他来往中文系迴廊时，沉重的身体，配上敏捷的脚步，使人很自然地想起庄子“运斤成风”的故事。他身体的沉重，和铁斧没有差别；铁斧可以运转成风，而他的身后，就因身体的运作，而经常带着一股旋风。说中文系有一位“肚里能撑船”的宰相，恐怕不是夸张。

台公是鲁迅的学生，当年在上海，曾经和友人一起搞过一个叫“未名社”的文学团体，协助他的老师推动文学；这是中文系学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擅场于短篇小说，很得鲁迅的真传，可惜当年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无法在台北找到他的小说。前两年，一位有心人从旧杂志里把他的小说辑出来，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并且为文加以评介，才让我们了解台公小说工力之深厚甘醇，实在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台北某书局后来将它们编印成“台静农短篇小说”，可惜此地买不到）。到台北后，台公从此“歇手”不再写小说，连学术论文也难得一见；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也只有从一些传言去东猜西想了。

潇洒、放任及无为，似乎是台公的三大美德。台公嗜酒，特别是香喷喷的高粱酒；只要美酒当前，他绝不肯错过，即使高血压医生叮嘱他不可“以身试法”，他还是以“一杯就够了”“再来一杯就可以了”“再来一杯也无妨罢”“已经喝过三杯，多一杯也没关系”“这次最后一杯了”“真是最后一杯了”“应该够了，再一杯吧”“这是最后一杯，不可以再来了”等等的“藉口”，适情快意地一杯又一杯，喝得比我们这些没高血压的更多。台公喝酒见潇洒，却也不失其酒德，每当七、八分醉意来临时，他就以雪茄代酒，吐烟纳雾，吟哦自如，魏晋时代文人名士如果有高粱酒喝雪茄烟抽的话，潇洒也不过如此而已。放任自由，是台公对学生的基本态度。上课从来不点名，下课从来不理学生，平时不改作业，考试

不会不及格，毕业典礼不必出席；行之日久，几乎成为系里师长们的特征。“我们当年北大就是如此。”台大向来以继承北大的传统自许，台公是北大国文研究所毕业的，提起北大的传统精神，他就会侃侃而谈：“那有举行什么毕业典礼？我们毕业考试一过，大家就散得连影子都没有了！”一直到现在，我这个台大生，也还深染此习。至于说无为，那似乎只有比较亲近他的师友们才知道；台公今年八十，而且身壮如彪汉，一方面得益于他的“家学”（台公家传都长寿），一方面恐怕与他的无为处世态度有关。

台公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他的隶书和行书，更是独步台湾，无人可出其右了。十几年前，他很少向人“露”出这一手的，晚近几年来，也许向他求字的人太多了，他才为人题书签写对子。隶书写得“匀”和“备规格”，似乎不太难；要写出神气、古拙凝重以及脱俗，特别是要把隶书当行草来写，那真是不容易了。台公写隶书，落笔就如踩掷中文系迴廊的脚步一样，凝重有力；当他运起毛笔，就如运作身体一样，虎虎生风；倏忽之间，一幅叹为观止的古隶，就展露在你面前，楞得你连赞赏都忘记了。

被中文系称为“寿公”的，是毛子水教授。毛教授自五十多岁开始，便被人改称为“毛公”，原因有三。第一、史记魏公子列传有毛公其人，是一位隐居在城市里的贤者，据说，毛教授就是毛公的后代子孙。第二、毛公生来矮小，头发很早就脱光，不论春夏秋冬，永远一袭长袍，加上手边的拐杖，远远看起来，和寿星公似乎没有差别。第三、毛公是中文系年纪最大的师长，也是中文系身体最好的一位师长，他七、八十岁还会举起手杖跑着去追搭校车，八十余岁被计程车撞倒，还会爬着叫车子自己上医院求治。

据说当年胡适甫从美国回到北大教书，年纪不过三十出头，“骚动”了北大的学生，纷纷想撤他的讲台。毛公和傅斯年先生（后来的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及台大校长）那时是学生领袖，到讲堂旁听几节后，以一句“他的治学方法很新”才把骚动平息了。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大概只有毛公自己才知道；不过，毛公和胡先生是最要好的朋友，倒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虽然他最長老，不過，他的思想卻非常新穎，新穎得幾乎使你不敢相信。一般人講論語，不是把它講得道學味道太濃厚，就是講得文皺皺毫無生氣；毛公講論語，幾乎把孔子的喜怒哀樂講活，把孔門師生的艱苦奮鬥講盡，使你深深覺得，原來論語是一部活生生的書，是孔門日常生活的一部實錄。我相信，撤走道學的招牌來講解論語，只有北大台大這一系才做得出，而毛公正是北大台大的代表人物。毛公一生從不知道有“火氣”這回事，更不要說脾氣和肝氣了。也許因為如此，毛公永遠笑口常開，而且紅嫩的“童顏”永遠印在兩頰上，好像上了胭脂似的。考取學位最後一關的口試時，幾位考試委員相續提出問題後，臨到主席毛公；在做總結之前，他將我序文里的一句“到了民國初年，研究古史的风氣似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挑出來，淳淳地告誡我，以後寫論文時，應該避免使用“高潮”之類的字眼——“即使是事實，這樣的字眼，也會引起不必要的情緒”。當時似乎不太在意，如今年過四十，愈咀嚼愈有味道。怪不得毛公講書、閑談，甚至於晚宴，永遠那麼沖淡自如、平靜純如，像一池只興漣漪不掀波浪的碧水。

有“聖人”之雅號的孔公，似乎是中文系的一霸。孔德成教授，字達生，是中國最了不起的哲學思想家孔子的七十七代子孫；由於政府委任他為奉祀官，他只能以兼任教授的身分出現在中文系里。聲如金鐘，笑如排浪，只要他在第五研究室講課，中文系整條迴廊甚至於前後座其他研究室，到處都是秋天里的萬壑松，吹得你隨風逐浪，無盡的歡欣和無限的敬意。孔公治三禮、古器物學及甲骨文金文，一部儀禮，他可以講上幾年，使你越聽越新鮮；至於說金文，不但獨步杏壇，而且寫得一手好金文（孔公的小篆更叫人稱羨）。孔公上課不喜歡學生多，五、六個最好，十個還可以，過此就嫌多。上了他幾年課，我們只有“愛恨交織”一句話可以形容；說愛嗎，他的書講得好，特別是前面所說的那幾科，綿密細緻，鞭辟入理，真叫你折服再三，覺得“沒人可講得更好”了；說恨嗎，不留心听讲，不能“舉一反三”，他當場就“叫醒”你，甚至於將你“罵一頓”，罵得你臉紅耳赤，“羊毛衣里一直冒汗”。

孔公平时不苟言笑，“恂侃如也”；走起路来，“襜褕如也”“翼如也”，很有“虎威”，俨然有圣人的模样。实际上，孔公是一位很爱护学生的老师，而且，是一位很能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包括经济）的老师，一点也没有道貌岸然的圣人样子。记得那一两年总统选举，孔公是国大代表外加奉祀官，“来路”相当可观，平日豪迈成性的他，一下课就叫我们这六、七个学生尾随他到会宾楼，吃山东菜，喝绍兴酒，行酒令，写小篆，少说也要搞到十一、二点才散。会宾楼是标准的山东馆子，孔公到那里去点菜，更是山东菜里的山东菜，绝对不敢走样；我们有幸吃到上好的山东菜和北京菜，还是央托孔公的福呢。最使我毕生难忘的，莫过于学位考过准备南返，孔公在那里设宴为我饯行的时候；宴罢向前辞行，孔公竟伸手将我搂抱，当时的我，泪珠几乎夺眶而出。今天执笔临纸，还是感喟再三！唉，同窗曾永义教授说过，孔公对学生用情最纯真，实在一点也没错。不知道我们这些学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报答他。

孔公是圣人的后代，山东人见了他没有不“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的；他又是中国第一世家，所到之处，没有不受崇敬爱戴的。五十年代初期，孔公应邀到越南、日本及韩国访问，当他抵达东京时，欢迎他的人几乎到了万头攒动的地步。“孔子，是东方最伟大的圣人，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圣人之一。”主持欢迎会的主席，这么样地介绍道：“今天，我们日本人最崇敬的这位圣人，他圣洁的血液就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先生的身体内！”一时，全场的人都肃然匍匐跪下，一些老者甚至爬到前方亲吻孔公的脚面。孔子是以道德教育在你我的心扉里建立起世家，皇帝可以更改，朝代可以推翻，惟有孔子世家不可以改写；大陆及台湾的中国人，切切记住这句话。

和孔公有同乡之谊的屈公，是中文系最严肃认真的师长。屈公，名万里，字翼鹏，治经学及古文字学，对于古史，辨伪及目录版本学等，更有心得，著作非常多。屈公嗜酒，年轻时即酒精伤胃，动手术把胃割去了泰半，所以，一路来身子并不十分好。尽管如此，我们当研究生的时代，他还是喝酒如故，酒兴时，还把酒瓶紧握手中，占为己有，“这样子，倒起酒来才方便。”他说。平时上下课

都非常严肃的屈公，我们最高兴看到他的时刻是：孔公、台公及张（清徽）公在座，大家都喝了几轮的杯中物，这个时候的屈公，那里是什么严师，更不是什么畏友；只见红红的脸颊，不时地绽开微笑的花朵，伴着的是情感高昂的谈话声，豪迈朗爽的干杯声，以及没有拘束的笑声。

屈公除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外，早年曾协助傅斯年校长处理校务，后来，他觉得行政工作太剥削精神和时间，才向傅校长“乞命”回中文系担任教授。在接任中文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长之前，屈公又担任过三几年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屈公早年本来就是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的主任，当局将他聘回中央图书馆，不但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也想藉屈公对图书版本的熟稔，把中央图书馆搞得更加出色。无奈屈公不爱做官，三年后辞命回台大，而且终老于台大及史语所，过着一辈子平淡的书生生活。

台大传统虽说是自由放任，不过，中文系师长们上起课来却是一万分的严肃。人家是“三分之一讲外头的杂事，三分之一讲自己的私事，剩下三分之一才讲书”，台大完全不是如此，中文系从来没有一位老师在上课时讲过杂事和私事，更绝少老师用“讲笑话”的方式来“提起学生的精神”“引起学生上课的兴趣”，屈公更是中文系师长们讲课的表率。屈公讲课，就好像唱昆曲平剧一样，一板一眼。绝不马虎，进讲堂第一分钟到铃声响的最后一分钟，没有一分钟是例外；坐在台下的学生，经常是中文系最大班（中文系最“卖座”的师长有三位，屈公是其中的一位），也不会有学生打瞌睡。中文系师长里，屈公是以严格闻名，而有“勇气”来选修他的课的，都是准备接受严厉挑战的学生，所以，那一个会在堂上打瞌睡呢？至于说考试，大题目你得准备，小得像毫毛的你也千万不可放过；试卷派回来，七十分已经很不错，八十分算高分，八十五分以上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了。

七十年代下半期，屈公患上肝癌，无日不跟可怕的病魔作战；尽管如此，他还是写文章、教书和指导学生，过着往日的勤奋生活。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病情

开始恶化，电疗的次数逐渐增多，那个时候，师友们还积极为他出版七十荣寿论文集。翻过一九七九年，他实在支持不了，丢下一切进医院去了。那一年，我恰好受香港大学黄丽松校长之邀，到港大去担任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员”；二月十五日离开吉隆坡，当天中午抵达启德机场，准备在港大安顿一、二天，办理赴台签证手续后，继程北上，探望危急的屈师，没想二月十六日凌晨四点，屈公竟离开人间，让我空悲切。两天后，遇到艺术系系主任庄申先生，他才点醒我一件事：“为什么不在吉隆坡签证？”是的，为什么我不在吉隆坡签证？否则的话，我还可以看见屈公最后一眼！如今，空负恩情，只有一辈子追悔。五年来台出席会议，屈公曾邀我到会宾楼吃午餐；这次系中盛宴，宴开四席，热闹异常，就是缺少了一位屈公！

被四十九级誉为保姆的老师，是当年清华大学的校花——张敬（清徽）教授。张公把我们从大一带上大二，又从大二带上大三；到了第四年，选课分得太散了，我们才没机会听她讲书。由于四十九级是她亲手“带大”的，她对这一班的学生特别关照，不但全班六十多名学生的名字都记得牢，当我们念博士班有了家眷后，她还时常来探望；至于我们，对她也特别有感情，有苦向她申述，有事向她讨教，是我们全班公认的家长。许多同学毕业后，都时常要买机票到台大去探望她。说也奇怪，我们这一班似乎也还相当争气；取得博士学位的有三位（二位在本校，一位在加拿大），没博士学位而担任大学教授的，也有两位（一位在本校，一位在外校），和其他各级相比的话，四十九级似乎没有逊色，推究其原因，张公的爱护和鼓励恐怕有莫大的关系。

担任我们大一的功课时，张公虽然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不过，从她脸上的轮廓，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清华大学这朵校花的明艳。光是“明艳”并不能引人欣赏；张公除了明艳之外，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都很有韵味；即使到了六十多岁的她，头发全白，举止缓慢，还是那么地耐人欣赏。怪不得刚上她几堂课，许多有关她当年的流风韵事，就不绝如缕地在耳边传来传去。

张公的家庭并不美满和谐。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时常听到看到种种事情在折

磨着她，甚至于搞得她冬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只好伏在研究室冰冷的桌面上，哆哆嗦嗦地一分钟挨过一分钟。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中午从她研究室旁边的长廊经过时，总是怀着同情而又欲助无力的心情，把脚步声压低，徐徐而过，极不愿将她惊醒。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当年在清华时，今日语言学家罗常培就追过她，而且已经到了出双入对的阶段，无奈罗家极力反对，罗是个孝子，只好别娶，张公盛怒之下，也马上宣布他嫁，和空军上校缔结鸳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时至今日，虽然两个孩子长得身高体壮，张公恐怕也还会追悔不堪的。

考进研究所硕士班的时候，中文系在美国东亚学会的资助下，成立了“仪礼复原研究计划小组”，希望通过集体的研究，将仪礼的某一些仪式复原过来。主持整个研究计划的实际指导教授是孔公，系主任及所长台公也参与其事，研究员包括刘文献、曾永义、陈瑞庚、张光裕及笔者，一名讲师（刘）及四名硕士班研究生。我们的“领班”是张亨先生（副教授）。除了在校上孔公仪礼一课之外，我们堂下还得自己披阅清儒的著作，搜集有关的资料，以便完成各自的计划。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聚会，轮流报告工作的进度以及所面对的难题，由孔公、台公及张先生协助解决，报告完毕后，就是余兴节目——上馆子。偶而地，张公也参加我们的行列，到会宾楼吃山东菜。张公是中文系惟一的一位资深女教授，她能来参加仪礼小组的雅集，自是人人欢迎的。在餐会上，不但增添许多谈话的资料，也使到整个餐会的气氛轻松了不少。张公偶而批评孔公时，那种半诙谐半讥讽的“剑及履及”的话语，真是入木三分，动人耳目；事隔十多年，至今犹记忆清新，半句也不会忘记呢！

“仪礼复原研究计划”第二年就改变了一些班底；刘文献完成了“竹简本仪礼校正”后，第二年就到日本留学去，由考古系研究生沈其丽递补他的空缺。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刘文献长我们三、四岁，他不但是孔公最忠实可靠的助手，也是我们全体公认的“大哥”。他照顾我们，协助我们，使我们免除许多摸索的冤枉路子。年底离开小组而去，无疑地，是我们的损失。

第三年考进研究所博士班，小组增添了许多新的研究员，包括黄启方、章景明以及后来的吴宏一等等，成为中文系最庞大的一个研究计划了。

第三学年开始，我们就积极筹备复原的主要工作——将研究的成果生动地复原过来，拍摄成电影。第一部我们想拍摄的是“士昏礼”（古代士人结婚的礼节和过程）。我们向大学当局借了一块空地（就在第十二宿舍前方运动场的旁边），由研究古代建筑的笔者，负责指导工人将古代的房屋搭建起来；沈其丽负责古器物，小组花了许多经费，在他的指导之下，制作了婚礼所必须采用的器物；其他陈瑞庚负责服饰，曾永义负责乐器（士昏礼不用乐器），都莫不如此，一一加以复原。张光裕是研究仪节的，他对婚礼的仪式和过程最为清楚，所以，他担任“大导演”，指挥整个拍摄的工作。因为经费有限，我们请不起正式的摄影师，只好请求台视的摄影采访记者庄灵来充当；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慕陵）的第四公子（老大庄因是作家兼学者，老二庄申是教授，老三庄吉是画家），他和台、孔二公是世交，所以，在“世伯”的召唤之下，只好义务地和我们泡在一起，冒着寒流的袭击，挨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冬天。现在想起来，实在回味无穷。

整个拍摄过程到底花了多少天，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而言之，我们这几个傻瓜（两个大傻瓜和七、八个小傻瓜）为着这个学术计划，都吃尽了苦头。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事情都忘记了。惟一记得最清楚的，是生平第一次听见台公口出三字经。事情的经过是如此。

宫室完全盖好的那一天傍晚，我们大家就开始担忧：如果没人看守的话，会不会被人深夜撤走拿去作违建房屋的材料？如果不幸如此的话，我们经济上不但损失，明天还不能按照计划“开镜”。要人看守的话，明天大家都得赶来工作，怎么休息呢？最后，在孔、台二公的建议下，只好通知校警，请他们多到运动场来巡逻。那一晚，我们一面抢时间布置宫室，一面看守到深夜十一、二点。我是负责宫室的，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就骑上单车往学校运动场跑，希望看到宫室“完整无缺”，待会儿才可以按时开镜；刚一抵步，就气得七窍生烟，果然一

部分的材料被人半夜撤走了！台公听到消息，早餐丢下就赶到现场（他住温州街，距离学校很近），我带着他巡视整个宫室，他一面摇头叹息，一面不停地“他妈的”骂出来。在台十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听到台公“出口成章”，真把我楞住了！如今想起来，似乎还有点不相信呢。

经过了不少的工作天，拍摄工作总算完成；那一年的农历新年，我们过得特别愉快，因为我们终于完成了复原计划里最艰钜难当的一部分了。往后影片的旁白、说明和裁剪，张光裕的贡献独多。黑白摄制，全长约莫一个小时，是研究仪礼的好参考及教授仪礼的好教材，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的。

仪礼小组工作最勤的要数张光裕和曾永义，前者研究仪节，后者研究乐器和车马饰，在孔公的悉心指导下，成就特别大。曾兄后来接替张亨先生，成为小组的“领班”。他是台湾嘉义人，对诗词曲有特别的嗜好。大学时代的他，不但旧诗写得好，还负责“大学新闻”的编辑工作；在他积极策划之下，“大学新闻”不但水准提高了，而且由学期刊改为月刊，由月刊再改为半月刊，成为一分全校性的学生报纸。曾兄能酒，也嗜酒，每次喝得七、八分时，也是他最潇洒开怀之时，吟诗唱曲，甚至台湾小调，动人心弦。有一次大伙儿喝多了，一面在校园逛，一面抱怨刚才孔公逼迫我们喝酒，曾兄说：“你们现在是抱怨，将来你们就会回忆这段日子的可爱！我们情同手足，相聚这么多年，将来还会有机会吗？”十多年来，每想起台大的生活，就想起仪礼小组这段日子；每想起仪礼小组，就一定想到曾兄这几句话。他说的真是一点也没错，如今兄弟们各飞东西，要再喝个酩酊大醉，会有机会吗？

小组里年纪最幼小的，便是来自香港的张光裕；广东人，又加上香港长大，所以，华语至今还带广东腔，蛮是好听的。和曾兄相反，张兄是最不会喝酒，纵使孔、台二公极力“谆谆善诱”，想把他训练成材，无奈他就是那么“不长进”，三杯落肚，就脸红如关公，高挂免战牌而投降了。孔公也特别钟爱这个小學生，常常特别“下诏”批准他免战，咱们兄弟大战之中突然少了一名对手，不免扫兴。

得很；私心自忖，怪不得张兄“不长进”，原来是为师的不认真训练，经常让他作沙场逃兵。

张兄有一副非常结实的身体，他冬天参加雪地爬山队，夏天参加越野竞走班，几年下来，壮得由一头水牛变成一头犀牛。有一次，为庆祝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台北某单位举办“一百公里越野竞走赛”，从台北出发，路过阳明山向北部基隆、野柳绕了北迴公路一大圈，全长一百多公里，再回到台北市。我们这位小老弟，不但参加比赛，还过关斩将夺了一个亚军的银盾回来！真是气势壮如山河，为我们小组争光。

这些事情，转眼就是十年。如今，师长们或者作古，或者在南洋，同窗们或者在外国，或者在外地，能够见面的，虽然是绝大部分，但是，总是不惬意。还有，像龙宇纯、陈修武学长，以及才女方瑜等，为什么此趟没来出席晚宴呢？即使不能多谈，握握手传传心声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呢。

移民●愚民

梁任公在他的“新史学”里，曾经说过如此的话：“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这话虽然说得未免太过分，不过，中国历史治少乱多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旁的姑且不说，中国史第一页黄帝、蚩尤之争，就是血腥腥的一场战争。至于说改朝易代，或者每朝中叶的叛乱、革命，不但绵延数千万里，而且派系之间的拉锯战，一股一股势力漫无目标地流窜和洗劫，祸殃千千万万无辜良民，哀鸿遍野，伏尸如丘山。有两句话说：“宁为太平狗，不作乱世民。”真是道尽老百姓的心声。

由于治少乱多，老百姓在忍受不了的情况之下，只好作他迁的打算。殷商的名臣箕子，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迁的移民，他忍受不了殷商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眼看国家大动乱即将来临，自己又无法施展才干，只好佯疯装狂，移居到朝鲜去。今天，据说在北朝鲜的平壤，还有箕子的衣冠冢呢！道家的始祖老聃，也是一位移民。他本是周室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学问渊博，思想卓著，无奈“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朝衰弱，天下动荡，他只好出函谷关，到外国定居了。他到底到什么国家去？也许没人能够回答；不过，他移居外国，却是千真万确的。鼎鼎大名的孔子，当他目睹周室崩析，理想无法推行时，不禁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竟然兴起移居海外的念头。孔子的“海”是何所指，恐怕无法知晓；不过，以鲁国当年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指的应该是渤海以外的水域。著名人物尚且忍受不了连年战乱的祸害，纷纷外迁，至于普通的老百姓，那就更不必说了。

在人类的历史里，中华民族的外迁似乎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例子。我们有一句“安土重迁”的老话，说这个民族很依恋自己的土地，不喜爱迁居到外地去。然

而，我们看到的却很不相同：打从殷商开始，这个民族已经有人迁移到外国去，弃故土如遗履，二、三千年来，这个外迁的念头还一直横置在他们的脑筋里，而且外迁的潮流也老是络绎不绝或明或暗地进行着，似此强烈的外迁念头和持续不断的外迁行动，世界上其他民族恐怕少有这种情形。翻开地图望一望，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这个民族，他们宁可孤单地游魂于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宁可二、三代后改姓易名地化为其他人种，就是不愿意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这些浪子，据说总数在二千多万以上，外迁人口数量之庞大，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与伦比。所谓“安土重迁”，恐怕是一句不符事实的空话。

即使今天，这个民族也无不喜爱外迁，缺乏土地执著的观念和行动。以中国本土而言，台湾人民向美国、加拿大及南美洲等地移殖的，多得不成体统，他们卷走资金，带走家人，泯灭所有的回忆，在外地购屋置产，入籍为他国之民；中国大陆的情形并没有好到那里去，人潮不断涌向香港，留学生、外交官及运动员，也时而滞留外地，不愿“回家”，甚至于香港1997年大限将临，香港人竟然出现“不愿回归”的调调。流风所及，长期在外的后裔，也秉承这个传统，这儿住不惯吗，索性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什么公民非公民，不过是一张白纸吧了。

安定的生活，似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既然乱多治少，老百姓本诸人类的天性向外迁居，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事。问题的严重性和矛盾性在于：中国历代政府都不允许、不鼓励老百姓外迁！他们认为这些百姓是“不安分守己”的坏分子，是“化外的游民”。他们颀预专横，始终不承认这些无辜的老百姓离乡背井，到另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去冒险谋生，是由于政治经常动乱所逼迫造成的。他们腐败无能，对各种天灾水祸无力拯救，对大自然环境无法进行改造，以便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削除他们外迁的念头。他们只知道闭关自守，不准外迁的老百姓“回家”，藉以杜绝外迁的浪潮；他们只知道下诏，通令全国，宣布和这些移民脱离关系，藉以阻塞外流的趋势。说实在的，如此泱泱大国，却不断发生老百姓外迁的事件，岂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吗？拥有广阔版图的大国，老百

姓却接二连三地流窜外国，终老不愿回家，甚至衣锦还乡炫耀外国财富，岂不让自己大失尊严吗？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下诏痛责这些坏分子，并且砍断他们“回家”的路子。

从内心无限的羞赧，到采取威逼恫吓的敌对手段，似乎是自大、颓废无能者的连续心态。中国自古以来对待自己移民的态度，大部分都是如此。今天，海峡两岸似乎也还是抱着这种狭窄的态度；大陆老百姓非公务在身，不得私有出国护照，公务办完回来了，护照必须“上交”；台湾五、六十年代严禁老百姓出国观光及移民，“以免资金外流”。对老百姓而言，这种态度不但“困囿”了人类改善生活的共有天性，也戕害了老百姓对移殖外地的意义所应有的准备和认识，从而扭曲了他们对血缘国的情感的正确发展。对中国政府而言，她不但丧失了一大批拥有外国知识、视野宽阔的人士来协助发展，也失却了协助百姓外迁所应有的道义责任，任由他们蛮闯横干，自生自灭。

既然断绝这些移民的后路，“脱离母子关系”，“老死不相往来”，按理来说，自此以后，应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才是。然而，事实上又不是如此。满清闭关自守，不承认这些移民为“炎黄子孙”，怒斥他们是“不安分守己之流民”，但是，到后来却不断地拉拢这些移民，向他们送官赐爵，要他们捐款输粮，支援满清政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降至今日，这种矛盾的情形还是重复着：台湾限制观光移民，但是，每年十月却是“热烈欢迎归侨”；大陆百姓不准出国，但是，“港侨”“美侨”“澳侨”却是上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至于海峡两岸普通老百姓对这批移民的欣羡，似乎到了“一厢情愿”的地步。

实际上，这一大批被目为“不安分守己”的中华移民，在不被鼓励，又被长期敌视，更无任何支援的情况之下，却是辛酸备尝、血泪内流的。他们教育水准不高，对外一无所知，言语更是一窍不通，就赤手空拳“乘桴”冒险而往。在那些完全生疏的土地上，他们要学习如何缩紧腰带，学习如何与其他民族交往，学

习如何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学习如何容忍欺凌和顺从专横；政府不是他们的，土地不是他们的，法律不是他们的，唯一是他们的，只是两只手和一幅血肉身躯吧了！谁说那一代的移民，不是用血泪来铺路呢？“不安分守己之流民”也好，“热烈欢迎归侨”也好，一朝满头白发，腰背佝偻，还能分辨出那是什么心态吗。

在这样的心态和处理方式之下，中华民族散播在外面的种子似乎无法正常地生长。世界上五个大洲，到处都飘散着种子，那一处的种子曾经开花结果？那一处的种子能够受人善待，并且与人携手合作，共建家园？就在她的门口，她的种子甚至已经和当地的人民结合在一起，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品种，但是，曾几何时，好梦成空，依然挫折沦亡。在人类的历史里，中华民族拥有最悠久的移民历史纪录，也拥有最庞大的移民数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们的移民史似乎是黯然无光彩。

如果人类还有明天未来的话，中华民族儿女们的移殖例子是值得全体人类参考的。这个民族为什么持续不断地向外移殖？他们在移殖的过程中，如何成功、失败、挫折？在不了解其他民族的性格、文化、宗教及历史之下，他们如何学习共同相安相处？他们如何学习西方的法律和知识，为他们的下一代“武装”起来，以便和其他民族并驾齐驱？在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中，他们如何陷于困境？如何挣扎、奋斗？又如何沦入幻灭？在处理血缘国的关系时，他们如何作理智及情感的抉择？又如何被血缘国所误导和利用？在天命来临之际，一部分的他们如何无援地被消灭在地平线上？另一部分的他们又如何发挥人类求生的原始潜能？在一个不断发生天灾人祸的土地上，人类如何连续地外迁以求生存？不同文化、宗教及历史的民族，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如何交锋以见高低？一个文化在作整体外迁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她如何自我协调？自我抗衡？一个民族在复杂的竞争之中，如何自动地、被动地分为几支派系，以便在保守或激进之间迂曲蠕动前进？只是为了生存，人类如何以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等区别为一簇一簇的群体，

然后争夺竞赛，排挤消灭其他群体，机械性地完成了所谓“人类文明史”。这一问题，应该有历史学者走出研究室来，将它搜集，将它研究，将它撰成论著，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明天的文字纪录。



许云樵教授印象记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新山有一位很爱护年轻学生的前辈，他不是在职的教师和校长，也不是社团的主席，而是一位虔诚的依伊斯兰教长老——马俊武（笔名摩西）先生。马先生是一位颇有幽默感的前辈；他养上百只的鸡，就将鸡比喻为人，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养鸡记》；他的浮脚楼有许多壁虎，夜深人静，他一边抽烟一边“作壁上观”，将壁虎的种种动作写成文章；最使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悬在门口外面的那块木牌了——“马寓”，那种毫不在乎“住的是马还是人”的自若神态，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我正念高一，根本不晓得马先生和马华公会的关系，也不知道他在伊斯兰教里的地位，只知道新山除了宽中之外，“马寓”也在提倡读书和讲学，让新山这个沉静的小市镇有一点文化活动的氣息。

“马寓”经常举办学术演讲，有时是双周的，有时是一个月的，主持人是马先生，主讲者都是文化及学术界的人士。当然，他们都是马先生的朋友。演讲完毕后，就让听众发问；发问完毕后，就是茶点招待。那个时候，新山根本没有演讲会，即使宽中，也绝少有这种活动；而马先生就在他的“马寓”里，创下这种读书和讲学的风气，怎么不叫我们向往和倾心呢？

怀着一股倾慕和景仰的心情，我见过了学术文化界的一些先辈，包括在南洋研究方面有很高深的造诣的许云樵先生。

清楚地记得，许先生那一次的讲题是“古代中国和马来亚的关系”。高中时代的我们，不但没有马来亚历史的知识，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史迹，所知也有限。许先生的演讲不但新鲜，而且也是我们在课堂上听不到的；古代中国和马来亚到底有什么关系？郑和为什么下西洋？马来亚早期的历史是什么？那个时候，许先

生是南洋大学的教授，除了抱着求知若渴的心情之外，我们也抱着崇敬学者的态度，前来“马寓”聆听教益。

演讲会约定是七点开讲的，可是，时过七点半，还不见许先生的踪影。我们这十多名学生嘀咕，东主马先生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马寓的大门已经敞开了，那条中间夹着一排青草两边长着芒刺的窄泥路，也早就准备妥当，从大门“肃静回避”到铺满碎石子的凉台边。无奈半小时已过，客人还不来。

接近八点的时候，在一位老司机的操作下，一辆旧车子像笨重的黑狗熊一样，颠颠簸簸地直立走进马寓。主人欢呼之下，我们这群学生也立刻骚动起来——从车子里钻出来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瘦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文弱书生。呵，那就是许云樵教授了。哎，南洋大学虽然开办，和南洋大学相距仅十几英哩的我们，却无缘目睹一位教授的风采，未免是一件遗憾的事；今天，能在马寓里偿到这份夙愿，怎么不叫我们群起骚动呢？车子抛锚而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点也没有磨掉我们聆听教益、瞻仰学者的虔诚之心。

许先生演讲的神态并不精采，也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然而，他博闻强记，旁徵博引，条分缕析，几乎把我带进了忘我的境地。只有高中一的我，实在没法了解许先生的全部演讲，特别是他所徵引的那一大堆古籍文字，更是我无法讲得通及串联得通的；不过，整整一个小时的演讲，我幼小的心灵就好像坐在一个磁场里，深深地接受一波一波的“学术震荡”，强烈地领受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感召”。这种“学术的洗礼”，是学堂里领受不到的；这种“学术的虔诚”，更是课本里培养不出来的；而许先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适当地散发出学术的磁力，不停地荡击着我幼小的心湖。

许先生是南洋研究的专家，早在1940年南洋学会成立发行南洋学报之前，他已经在风靡一时的东方杂志发表文章，一九三五年元月一日第三十二卷一号他发表“林道干略居淳泥考”（在这一期里，连士升也发表了“英国经济史学的背景和经过”），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六日第三十七卷四号发表“暹罗罗华化考”（陈序经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第三十五卷二十号发表“暹罗革化考”，许先生撰文

应之)。一九四〇年，他和张礼千等人合编《星洲十年》后（由星洲日报出版），就和一批友好组织了南洋学会，致力于推动南洋研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同好向东方杂志投稿的兴趣；例如张礼千，他于南洋学会成立后，就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第三十七卷十七号“艾葦考”，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第三十九卷一号“志新加坡”，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第三十九卷二号“释槟榔屿”，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第三十九卷三号“怀满刺加”，一九四五年元月十五日第四十一卷一号“东西洋考中之针路”……。虽然未必都是受许先生的影响，不过，平辈中能兴起南洋研究热，并且能够在学问上互相砥砺切磋，许先生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继“马寓”之后，我又在义安学院看到许先生。那是一九六四年九月的一个晚上，也是南洋学会举办某一次学术演讲会上，许先生纤瘦的身子，站在台下立刻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感觉到他就是十年前在“马寓”里见到的学术演讲者。那次的主讲者是张君勱先生，这位曾经在中国政坛叱咤一阵子的书生政治家，透过报章上的新闻传播，一口气就吸引了成千上百的听众和观众，即使住在隔海的新山的我们，也驱车赶到义安学院投进这股热潮，瞻仰其风采，聆听其言谈。主持演讲会的，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连士升先生，也就是当时南洋学会的会长，戴着一副眼镜，通身沾满了书房的气味，站在台上介绍主讲时，纤弱得让人透不过气。台下的听众和观众相当拥挤，也有一点紊乱，我们虽然赶上开讲的时间，却也只坐在半中间；看着四周攒动的人头和嘈切的人声，心里头有些烦闷，不知待会儿如何听得了主讲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瘦的人影从前面第一排站起来，转身向着后面的人群，高举双手，示意安下情绪静下声音——呵，那不就是曾经出现在“马寓”的许先生吗？是的，就是他。纤瘦如故，书生如故。许先生是南洋学会始创人之一，对于学会非常热心；今天学会举办学术演讲，他当然出来协力。

来马大任教以后，我断断续续地见过许先生几次面；其中一次是在他赴曼谷

出席亚洲史学会议，路过吉隆坡之际。那一次，似乎是由苏莹辉先生作东主，在交谈中，我感到相当吃惊，他竟是乘火车到曼谷去。垂垂老矣的他，还能忍受这么长远的跋涉——自新加坡北上吉隆坡，自吉隆坡转车到北海，再自北海转车到曼谷去。如果说他千里奔波心怀目的的话，那也就只有“学术”两个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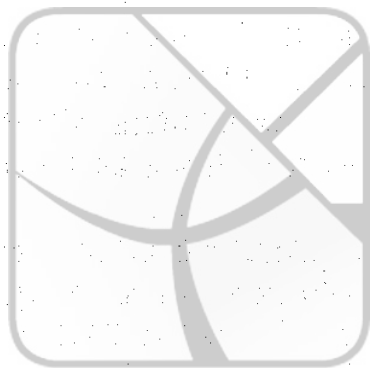
后来，我还和许先生通过一次信。

来马大任职后，逐渐对本地区的历史和社会发生兴趣，因此，也就注意搜集一些有关的专著和期刊，南洋学报是本地研究最有分量的中文学术期刊，自在我探求的范围。只是，这套书的第一卷出版于一九四〇年，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指七十年代中叶），不要说完整的一套，即使是不太完整的，恐怕也不容易找得到，尤其是战前出版的那几卷。非常幸运，承蒙友人的协助，不久之后，我就拥有相当完整的一套，查点之下，只缺三期，真是欣喜万分。再找谁来帮助我补充这三期呢？许先生。于是，立刻写封信给他，希望能一偿夙愿。一个星期后，他送了我一本，并且附了一封信。虽然是芝麻小事，也是我和许先生交往的一段因缘。

许先生晚年，穷病得有意将他的藏书加以出售；对于一位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逼迫得只有出售藏书来维持生活，实在是一幕悲剧。南洋社会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许先生是学术垦荒者之一，按理应获得支援和协助，如今，却必须撒散多年的心血，卖给外国的学术单位，实在是本区社会的一大讽刺。从友人那儿获得消息时，内心难过了好几天。一年后，文化协会兴起采购这批藏书的念头，而且事先由马华公会在报章上披露了消息。那时，我虽然已不是文协的署理会长，不过，却非常关心这件事；心想，如果许先生的丰富藏书能够入藏文化协会的图书馆，作为发展本区研究中心的一个开端，未始不是大马知识分子的一大佳音。书得其人及书得其所，而不流散街头的话，也聊以对得起许先生多年搜集的心血！何况新马本是一家亲，相距也咫尺，两地人士参考起来也还方便。因此，在文协理事会讨论这件事情时，我表示支持，后来准备派遣三人过去了解藏书的情形以及洽商采购的方法，我却因为时间不适当，无法参与。这批“交易”后来并不成

功，也许是处理不恰当，也许另有问题。

这段往事勉强算得上是我和许先生的因缘，也是我和他最末了的一段因缘了——不久以后，许先生就仙逝了。



扶桑●汉学

东京，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

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及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研究所作学术演讲，应该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这是我第一次飞临扶桑，一方面和几位通过信的学者见面，一方面是藉演讲会多认识一些异国同道。台北两个星期会议快结束时，我就“斋戒沐浴”，准备北上作另一场硬战。

把日本形容作中国以外的一个汉学重镇，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分。

许多汉学名著，特别是大部头的书，几乎都是日本人编写的；例如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皇皇的十三钜册，一万三千七百余页，气魄之大，真是惊天动地！这部近三十年前的大书，迄今还叫中国学术界汗颜；台北六十年代初期编的中文大辞典，号称四十余册，不过，绝大部分的材料还是过录自大汉和辞典；大陆这两年正积极编纂大字典，据说一九八三年年底可以完成初稿，次年可以完成审订稿，成绩是否在大汉和辞典之上，只好拭目以待了。又如二玄社编的书道全集，整整一百钜册，不但印得非常精美，而且版面也制得非常清楚，搞艺术的，研究书法的，都莫不参考这部书。

根据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日本全国大学职员录”的统计，一九七七年全日本四三〇余所国立、公立和私立的大专学院里，从事中国文史哲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学术人员，共计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分别开设将近二千五百门中国的课程，如果将那些著名的名誉教授以及退休的学者计算在内的话，数目就更加可观了。试想，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国家拥有这么庞大的汉学队伍？至于卓然成大家的，那更是数不清了；青木正儿的戏剧，仓石武四郎的语言文学，铃木虎雄的诗论，藤堂明保的音韵，梅原末治的艺术考古，竹添光鸿的经学，贝冢茂树的

古代史，岛邦男的甲骨，吉川幸次郎的文学和历史，白川静的金文，武内义雄的子学和哲学，真是数不尽、说不清。说日本是中国以外的汉学重镇，怎么会是阿谀之辞呢？

当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几位学者的引导之下，参观研究所的藏书时，一个很强烈的印象不停地在我的脑筋里烙印着，使我事隔几个月后，仍然久久不能抹去。整整的五层建筑物，藏的尽是汉学研究的书，从善本的线装书到最近出版的平装书，简直像台北的公共汽车一样，挤得到处水泄不通，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似乎不过如此，更不要说中央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了——“你们简直把汉学当作你们自己的文化来研究！”我不禁失声地叫起来。

说实在的，汉学对日本人来说，简直是他们自己的学问，如果有一天你向他们宣称：“汉学是我们的。”他们保证瞠目咋舌，以为你神经有点不正常了。你看，日本学者注解中国的古籍，东洋文化研究所搜集得一箩筐一箩筐，陪我来参观的松丸道雄教授说，其他几个大学都莫不如此。前面我举过经学家竹添光鸿，几十年前写的左传会笺、毛诗会笺，徵引资料之宏博，文句注解之细密，至今还为人所乐道，台北大专上课用它们，研究生写论文参考它们，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一些光彩。去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出版，才争回一些面子。你再看，松丸道雄是研究甲骨学的，他是日本甲骨学会的会长，在他送我几部书及告诉我这个组织时，我几乎不太相信，“你们有多少会员呢？”我一面狐疑地问，一面在想，至多大概也只十几二十个会员吧。“我们有六百名会员。”像这么冷僻的学会，不但台湾成立不起来，中国大陆迄今也还没成立，而他们竟然有六百名会员！而且还出了十多期很有水准的学报。如果汉学是外国的学问，他们会这么样的热心吗？

每想到这里，心里总是酸溜溜的；唉，汉学似乎已经给他们占为己有了！中国学术界如果再不迎头赶上，将来的汉学专家学者，就只有出现在东京和京都了。

我们住在文京区本乡，距离东京大学只有一箭之遥，每天穿梭其间，有说不尽的感触。光说日本是个经济强国，说日本人是经济动物，实在有欠公允；日本

固然是亚洲一等强国，国富民强，然而，日本的文化、艺术、道德、文学及学术等等，又何尝不是雄视亚洲、媲美欧美各国？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她不需要文化、道德等作基础，就能建立起一个经济强国，历久而不衰；那么，一个强国的建立未免太廉价了。你相信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只靠金钱，就能够称雄称霸睥睨几代吗？世界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在日本以外，我们只看到日本的经济；只有踏进日本的土地，才知道这个国家何以喝叱几个世纪。

日本商店一般上在门口都摆上很多商品，小至卫生纸牙膏等日用品，大至相机手表等名贵东西，从店里摆到店外，密密麻麻地；亚洲其他地区如果也这样地摆设的话，不要说相机手表，便宜如卫生纸牙膏，也都会给人扒走的。在日本，店东经常就“躲”在店铺里，门口边及门口外的商品，根本就“远在天边”“鞭长莫及”，然而，就没听说给人顺手牵羊带走拐走。除了商品，大部分店东还“高雅”得很，门口不是摆两盆很精心的盆栽，就是在路中央安全岛上种上几株小巧可爱的花卉，购买东西的人固然可以驻足片刻，玩赏盆景；路上行人也未尝不可以“走马看花”，比较比较那一家种得别致有韵。走在日本街道上，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高雅，即使是小偷毛贼，也不知道邪念为何物。试想，亚洲那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道德水准？

我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研究所演讲的时候，甫刚入席，坐在旁边的一位最老的教授即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向大家说：“今天的演讲会，我们还没决定由谁来担任主席；看看在座的教授里，我的年纪最大，所以，就由我来担任主席吧！”台下立刻响起一阵掌声，这位老教授就带着当仁不让的神情，慢慢地走向主席台上去。尊老，原本是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是，日本人却全部搬过去，并且将这个传统发挥在现代的工商社会里，成为这个机械世界、工商社会的润滑剂。在东南亚，在香港，甚至于在台北，如果有一位老教授胆敢如此“狂妄自大”，恐怕就会招来大大小小的物议，甚至于成为日后嘲笑的话柄了。日本的集会，据说经常就是如此，临场由最长老的一位“自己站起来”担任主席，台下的人都莫不

“言从计听”“千依百顺”；你说，这是个工商社会吗？据说，美国现在正流行一种新风气，儿子跟父亲打招呼，学生向老师请教，都是直呼其名，连“先生”

“教授”都省略了，俨然以平等身分出现；说得动听一点，是“打破彼此之间的隔膜”“把人为的距离缩短一点”“以朋友对待，比较亲切”，实际上，这正是人伦开始崩溃的征兆。人伦道德崩溃了，国家还能单独存在吗？没有肉和骨，皮肤要附在那里呢？

不但如此，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也备受尊敬和礼遇；在老年人面前，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年轻人只有必恭必敬的分儿，如果你有什么轻浮浅薄的举动，譬如傲慢地一面摇脚、一面站着吸烟啦，或者跷着二郎腿“左顾右盼”地看女人啦，这位老年人按照规矩可以送你一巴掌，痛痛快快地教训你一顿，那个时候，你只有乖乖地如“败家犬”地低着头，吭也不敢吭一声，至于旁观的人，只觉得这位老者做得好做得对，那里会兴起帮忙年轻人打抱不平的“邪念”！除了社会上一般性的“权威”，国家也提供了许多“礼待”给老年人；譬如，所有国家经营的交通工具，包括火车、地下铁及公共汽车等，老年人一律免费。外国的老年人，也在礼待的范围内。试想，光是以金钱起家的国家，会是如此吗？单靠经济来称雄称霸，会是如此吗？

实际上，日本所以成功，除了西方工商业的文明，充沛地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恐怕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如果说日本有什么文化，中华文化恐怕就是日本文化的一个主流。学术、风俗习惯、社会礼仪、伦理道德、艺术、宗教、建筑、书法及茶道等等，到处都是中华文化的影子，甚至于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复活和再生。这里，或许可以举些事实来谈一谈。

“勤”是日本人共同的一个精神，也是他们工作干活的一个准则。日本已经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国家了，按理来说，可以不必那么“孜孜矻矻”地卖老命，享受一阵子“二世祖”的清闲，然而，日本举国上下，时至今日，还是莫不以“勤”字称著。老教授每天晚上在研究室里熬到深夜十一、二点，不论春秋冬夏，数十

年如一日，几乎是常有的事情；你说，这是为着什么？已经是教授，再勤下去也没等级可升了，天天卖老命做什么？但是，人家就是如此。试问，这个“勤”字从何而来？还不是古老的中华文化？

“忠”是日本人的第二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皇军敢死队，到处冲锋陷阵，是什么在作祟？我想，任谁也会知道个中的原委——忠于天皇。今天，日本人把“忠”字和“工作”结合在一道，把“忠”字运用在现代工商的社会里，成为发挥速度、效率、可靠最犀利的一把武器。日本人不但轻易转公司换雇主，实际上也绝不喜爱转公司换雇主；一个毕业生踏进社会，他的第一分职业，往往也就是他终生的职业。如果你换上两个职业，不但新公司不会录取你，你的朋友也会鄙视你，认为你的操守大有问题。这是什么在作祟？无他，“忠”字而已；忠于职守，忠于公司，忠于雇主。试问，“忠”字从何而来？还不是古老的中华文化？

“敬”应该是日本传统精神之另一面。敬老这件事，我们前文已经提过了；“敬业”，更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旧调重弹”的。日本人不但忠于公司，对自己在公司里的工作，也抱着一种“无我”的敬业精神，“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不但把工作做到至善至佳的境地，而且，也以此至善至佳的境地作为一种殊荣。“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投机取巧”“迟到早退”“拖延怠慢”等等“邪恶的念头”，恐怕在日本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我们不是有句古老的成语吗？敬业乐业——很多东方人已经忘记了，然而，在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却到处可以嗅得到、摸得到，你说奇怪不奇怪？

研究汉学有什么用？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对于日本人而言，汉学已经是他们自己文化的一门学问，千多年来，这门学问被他们占为己有，而且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主流。通过集体的研究，经过千多年的提炼和累积，他们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吸收进去；当西方工商文化来临之际，他们胸有成竹地协调中华文化，

把优良的传统和精神保留下来，并且和工商文化相结合。日本之所以成功，恐怕跟这个道理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日本没有雄厚的汉学基础，恐怕就不会有今天了。



年如一日，几乎是常有的事情；你说，这是为着什么？已经是教授，再勤下去也没等级可升了，天天卖老命做什么？但是，人家就是如此。试问，这个“勤”字从何而来？还不是古老的中华文化？

“忠”是日本人的第二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皇军敢死队，到处冲锋陷阵，是什么在作祟？我想，任谁也会知道个中的原委——忠于天皇。今天，日本人把“忠”字和“工作”结合在一道，把“忠”字运用在现代工商的社会里，成为发挥速度、效率、可靠最犀利的一把武器。日本人不但轻易转公司换雇主，实际上也绝不喜爱转公司换雇主；一个毕业生踏进社会，他的第一分职业，往往也就是他终生的职业。如果你换上两个职业，不但新公司不会录取你，你的朋友也会鄙视你，认为你的操守大有问题。这是什么在作祟？无他，“忠”字而已；忠于职守，忠于公司，忠于雇主。试问，“忠”字从何而来？还不是古老的中华文化？

“敬”应该是日本传统精神之另一面。敬老这件事，我们前文已经提过了；“敬业”，更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旧调重弹”的。日本人不但忠于公司，对自己在公司里的工作，也抱着一种“无我”的敬业精神，“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不但把工作做到至善至佳的境地，而且，也以此至善至佳的境地为一种殊荣。“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投机取巧”“迟到早退”“拖延怠慢”等等“邪恶的念头”，恐怕在日本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我们不是有句古老的成语吗？敬业乐业——很多东方人已经忘记了，然而，在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却到处可以嗅得到、摸得到，你说奇怪不奇怪？

研究汉学有什么用？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对于日本人而言，汉学已经是他们自己文化的一门学问，千多年来，这门学问被他们占为己有，而且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主流。通过集体的研究，经过千多年的提炼和累积，他们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吸收进去；当西方工商文化来临之际，他们胸有成竹地协调中华文化，

把优良的传统和精神保留下来，并且和工商文化相结合。日本之所以成功，恐怕跟这个道理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日本没有雄厚的汉学基础，恐怕就不会有今天了。



第一代知识分子

雪隆台大同学会将于十一月出版十周年纪念特刊，内辟“校友专访录”，笔者被列为采访的对象。奉知此事之次日，笔者即南返新山，准备出国，无法制作专访。兹利用旅途休闲之时间，写成此文，并于报端先行刊布，以教正于留台前辈同学。

我是1960年九月到台湾去升学的；在去台大之前，本来还有两条路子走，一条是到南洋大学去，一条是到澳洲去，当时班上的同学都推测我会走上这两条路子。在去台湾之前，我对台大一无所知；当时，我只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去念中国的文史哲。因此，我挑选台大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大感惊讶。

另一方面，我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菜商，底下还有三个弟弟，担子相当重；如果往南大或澳洲跑的话，我的弟弟们恐怕就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了。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恐怕是当时赴台升学的学生的一般情形。

我在台北一口气住了四年，总算还自爱，获得稍微理想的成绩。1964年七月，我回到母校——宽柔中学教书，虽然只教了半年，却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学习到书本以外的知识。第二年，我回到台北投考台大的研究所，重过读书生活。当年的研究所，并没有“保送”这条路子，不管你是什么国籍，你想读研究所的话，只有参加考试。理工学系毕业生，成绩好的都往美国跑，中文系恰好相反，好的学生都留下来攻读研究所；因此，竞争非常激烈。清楚地记得，那一届报名中文研究所的，一共有七十多名，除了本校成绩优良的同学，还有师大、政大及淡江等高材生，按照往年录取十名的惯例（如果第十及十一名成绩相同的话，第十名

也会被“刷”掉），必须淘汰六十多人。竞争的激烈，气氛的紧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在还没参加考试之前，人家还告诉我，如果你不能名列榜首的前几名，你宁可落选，因为榜尾的学生，教授们不太乐意指导。我很侥幸，一考就考中，而且还名列第五。

我的硕士班只读两年；两年后，在激烈的竞争下，我又考取了台大的第一届博士班。1971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天，我就回马，到马大来上任，担任中文系的讲师。1976年升为副教授，现在是系主任。

我一共出版了十四本书，属于学术的有十本，属于半学术半文艺的三本，属于编注性质的一套三册，有好几本书已绝版，也有几本正在发行第三版。那套编注的“师训华文”，一共发行了三、四版，是我国1974—1981年度师资训练学院的课本。这些书都在不同的国家里出版。至于单篇学术论文，大概总在六、七十篇之谱，都是发表在亚洲各国的学术期刊上。

我还很年轻，跟人家比起来，我还远远地落人之后。所以，我时常利用出国的机会，向旁人讨教，向旁人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跟人家并肩共进，庶几乎不会辜负台大培养的大恩以及马大这么好的治学环境。

如果大马学生想到台湾攻读中文系或历史系，而且又想念出一点成绩的话，我想，他们事先应该准备，多读一些课外书，开拓及充实自己的文史哲知识。台湾的中文程度非常高，我们这里的学生和他们比起来的话，简直是差了一大截。以文史哲水准来说，台湾生排第一，香港生排第二，新马生大概只排第三、四，如果事前没多加准备，如何跟人家拼呢？很多香港生考进研究所，有的考了两、三次才被录取，我们新马生更不必说了。

读些什么书呢？应该随个人的兴趣而决定。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先秦的子学、四书、史汉，都是最基本的。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也许是负担重了一点，不过，

如果你不这么样拼的话，你到台北就输人家。你不要忘记，你是到中国的土地上去念中文系，情形就好像到英国去念英语系，到德国去念德语系一样，人家才不饶你呢！

台北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都市，过去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如果你自爱、肯上进的话，只要你勤奋，你一定可以学到很多好东西；如果你放纵，懒惰及堕落，你就会失败得一塌糊涂，而且还学坏回来。中学毕业的年轻人，不过十九、二十岁，血气方刚，目空一切，加上第一次远离父母兄弟，没人监督，享有完全的“自由”，只要稍微不自爱，立刻就被召引到邪恶的路子上去。所以，到台湾去念书的同学，首先要养成一股万恶不人的“定力”，电影尽量少看，歌场舞池及咖啡座绝不可以去。

至于功课方面，绝大部分学生都比不上本地生；每次成绩放榜，外地生总是“包尾”。新马生一般来说，素质并不太差，只要发愤图强，假以时日就可以迎头追上去。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要有“定力”之外，还应该拥有“奋力”——奋发的毅力。怎么样奋发呢？很简单，事事向本地生看齐。台湾的学生非常朴素，能吃苦，爱书如爱命，毕业回来的同学一定知道我所言不虚，还没去的同学将来自己去发掘，我这里不必多费口舌。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想出人头地的话，这两种“力”不可不养成。

我们华人社会，前一代大部分也许没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多是南来的小商人，或者只是工人农夫吧了。我们留台同学，虽然有好些已经从商，不过，我们和南大等其他校友一样，毕竟还是受过大学教育。将这前、后两代相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似乎是华人社会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这个发现具备了两个意义：

第一、华人社会不但已经在此落地生根，而且逐渐在长大之中。华人社会不再像当年开发檳城的赖特所说的，“全是工农商人，绝少知识分子”，“活着只

是为了生存和赚钱”（大意如此），而是拥有知识并且知道利用知识的一个社群。一个人拥有知识及知道怎么样利用知识，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最起码的，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去维护及坚持生存的意义、原则和目标了。

第二、华人社会虽然已经长大了，不过，年纪还相当轻，看起来不过三十多岁而已。今后，我们要如何安排自己投入社会，来饱经阅历、磨练自己的服务毅力以及接受各种折磨和考验，以便有朝一日达到成熟练达的境地，就完全看我们这“第一代的知识分子”了。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们留台同学也好，南大同学也好，似乎就身负承先启后的重任了。我们是华人社会第一代拥有高深知识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如何发挥我们的力量，使到我们生存得更有意义、更有原则和更有目标，那就完全看我们如何努力和奋发了。

知识绝对不等于智慧，年轻人拥有知识，壮年人及老年人才拥有智慧；知识可以从书本里得到，智慧则必须将知识拿去阅历、磨练和考验，然后才会闪烁发出火光。知识是脆弱的，只有智慧，才是力量的泉源。光是知识是不够的，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强调成熟练达的道理。

留台同学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方面，我只想举一个，即留台同学和南大同学一样，不但了解华人社会，关心华人社会，而且也爱护华人社会。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至于缺点，我倒想多谈一些了。

首先，留台同学并不十分团结。我们都是同一地区的毕业生，既无政治偏见，又是高等知识分子，理该团结在一块儿才是；然而，我们却有台大的、师大的、政大的、成大的，又有雪隆台大的，雪隆留台的……名目之多，同学们都没法子分辨得清楚。我们时常指责华人社会分帮分派，自己就不是在搞帮派吗？我们说

老一辈搞的会馆乡团落伍，我们受不了，试想，我们又进步到那里呢？如果说我们是知识分子，我想，我们的知识也非常有限。这些知识分子太年轻，太幼嫩了。我曾经听过一位南大校友说：“你们说我们南大校友有中立派、左派及右派分子，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有台大、成大、师大、政大等等，派系比我们更多！”真是一针见血。如果我们不能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们的形象，我们永远只是不长进的青年人而已。

其次，留台同学没有什么朝气，好些地区的留台同学会几乎和旧式乡会没有不同，也比不上一些上轨道的新会馆。每年一度的“文华之夜”，我们就是如此而已吗？留台同学的目标在那里？留台同学的精神在那里？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没有具备意义的活动，而许多同学会就迷失在“不知要从事什么活动”的困境里。留台同学会仅止于“照顾同学的福利”而已吗？苟如是，我们未免太菲薄自己了。五十年代回来的同学，今天少说也五十多岁；六十年代回来的，也已四十多岁；二十年来，除了“文华之夜”，还有什么值得称道激赏的？不少同学会第二代的领导人物已经产生了，我们的贡献又在那里？如果我们不赶快奋发图强，同学会的形象迟早会被“定型”下来，到时积重难返，再回头已垂垂老矣。

第三，留台同学逐渐世俗化。知识分子如果不时常进修，充实自己，那么世俗化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一些同学受生活折磨和摧残而世俗化，那是值得同情的；许多同学却是自动放弃进修，不愿意再充实自己，将自己沦为“赚钱的机器”，就有点值得惋惜了。知识分子世俗化以后，就不会有目标，不会有眼光，不会有理想，也不会对未来作策划和推动；到那个时候，他已是一名“干枯的”知识分子而已。如果对留台同学展开全面性的调查，我敢相信，许多同学只是过着“看报纸，不读书”的日子。几年前，总会想成立一个图书室，后来失败了，却也不见有人扼手称惜；读书风气之差劲，真无愧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高等知识分子世俗化、平庸化，是一樁悲剧。

第四，留台同学似乎在“自我放逐”。留台同学既是华人社会第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校友并驾齐驱，数量又相当多，按理应该汇为一股力量，成为华人社会一股主要的潮流；然而，我们留台第一代的领导人物过去了，我们有什么特别卓越的建树？为后来的同学铺下什么崇高及一贯的奋斗目标？为留台同学坚立起什么值得尊敬的形象？有人曾经形容过我们：“如果将留台各种人材汇聚在一起，来兴办一所大学的话，简直是绰绰有余。”我们“遍地是人材”，但是，我们却默默无闻，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自我放逐”，离开华人社会。留台同学似乎都患上过度关心自己的通病，只顾“成就自己”，不愿意“普渡众生”；这是知识分子的自私。留台同学应该“回头是岸”，以实际行动来参与富有意义的活动和建设，在这个社会国家的土地上真正落实生根，并且休戚与共。

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建议，同学们毕业回来后，除了找寻工作及专心工作之外，应该立刻把马来西亚的历史读通来，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历史。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所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很早以前甚至于已作如此主张，所有华文中学必须明列“马来西亚史”、“马来西亚华人史”为必读必考科。我们虽然已在此落地生根，而且茁长为年轻人，不过，我们时有“自我放逐”、“无法认同”的感觉，一部分原因恐怕就是对这里的历史不太认识。

作为普通公民，当然应该在这方面下点工夫；有意在社会上服务和活动的，更应该多下工夫，了解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们的先人没受过什么高深教育，把马来西亚开发成这个样子，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今天已是八十年代，我们再也无法驾着先人那部旧车子，在快速公路上和人家竞驰了。我们不知过去，如何谈将来呢？我们不知历史，如何搞活动呢？如果我们自许为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应该左手握知识，右手掌历史，才来参与社会国家的建设。

有关“马来西亚史”的华文学术著作，似乎相当稀少。如果马来文及英文行

的话，就会方便得多多了。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似乎就只有零星的论文了。

此外，语文的学习更是不可忽略。马来文已是我们的国语，而且也被正名为“马来西亚语”，其地位和力量是不容低估的。留台同学如果能够掌握这语文，才有机会发挥其知识。不要说“年纪大，事业有成，还学来做什么”，更不要说“年纪大，不管用了”，我们应该克服弱点，完成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顾炎武有两句诗说：“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年纪大，才有卓识，才有智慧。

愿与诸同学共勉之。

一九八二年九月上旬稿于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



迎接家岳李海萍首次画展

许多人到了六十岁，生理上及心理上，就已经产生“暮年”的感觉。家岳李海萍先生三十多岁在槟城以一座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雕塑享誉艺坛以来，就过着隐居式的沉寂生活，一直到六十五岁的今天，才发奋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老夫聊发少年狂”（苏东坡语）的特殊例子。

家岳的艺术生命，实际上应该从他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开始。那一年，他刚从国立杭州艺术学院毕业，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专攻西画，就参加了鲁迅所发起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初试啼声，那个时候的他，不过是个二十岁刚满的少年而已。三年后，他以二十三岁的年纪担任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院的美术主任；一九四〇年大战来临之前，他回返出生地——苏门答腊，结束了他在中国的艺术生命。

尽管担任了苏门答腊培善中学的美术主任，尽管战后回到新加坡，这个时期的他，似乎只在生活线上挣扎而已！在这商业社会的南洋，除了中型以上的学校勉强养得起一名画家之外，什么地方能让画家容身呢？于是，这位一口气养了三女一男的艺术工作者，很快地就咀嚼到穷困的苦汁了。生活迫得他降低人格，在新加坡为人家画广告；生活迫得他将子女遣散，大女儿留香港过着孤苦零丁的生活，三女儿及四男儿送回中国大陆娘家。一直到他转往槟城执教于韩江、中华及日新（大山脚）等校，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之前，他一直因为穷困而出卖崇高的艺术的灵魂；唉，艺术家的生涯就是苦涩的吗？

一九四八年后，家岳才从槟城开始塑造他自己的艺术生命。槟城，应该是本区艺术工作者的天堂——她有幸让近代大画家徐悲鸿在这里住过一段时期，并且使徐悲鸿留下不少的作品，使到享有东方之珠美名的她充满了艺术的光彩；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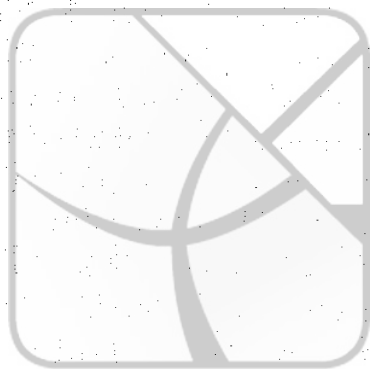
有幸地出生了一批爱好艺术的儿女，为她方圆不过十哩的小天地创立了艺术协会，使到丹絨武雅的海边更富诗情画意。家岳抵达这块天堂后，出版了两本画集——儿童画习作及海萍素描集；在当时的新马来说，这似乎是个创举。几年以后，他以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半身雕塑参加南大义展及第一届全马画家美展，赢得主办单位艺术协会主席骆清泉先生的极高赞誉，并且缔结金兰之交。

就在艺术生命的花朵开始张放之际，家岳母身染重病，必需南下医疗，于是，这位三十多岁的画家不得不收拾行装，摘下这朵即将怒放的苞蕾，携女带儿奔新山。在新山，家岳有一分安定平稳的生活——担任新山宽柔中学美术主任，按理来说，应该继续完成他在艺术上的理想；然而，他从檳城摘下的那朵艺术苞蕾，却不再继续开放了。这个时期的他，除了出版一册“美术”及担任政府师训班美术讲师之外，他就过着寂静的日子。虽然他作画，虽然他研究画技，虽然他开馆教授学生，但是，他的艺术生命似乎就随着家岳母的逝世而草草结束了。这朵曾经在中国传过芬芳，又曾经在檳城展示瑰丽花色的艺术花朵，应该在新山怒放然后结出累累果实的，然而，它却收敛，它却萎缩。这样的艺术生命，未免结束得太早，也未免结束得太无理，怎不叫人惋惜长叹呢！

新山，是家岳一生居住最长久的地方，却也是家岳意志消沉的地方。他似乎就困居在那里，就好像他受某些人的情感所困缠一样，忘记了除肉身之外，还有一条生龙活虎的艺术生命，等着他去狂奔，等着他去飞腾。三年前，一般人认为“暮年”的六十二岁，他却兴起组织艺术协会的念头，而且，还得到士乃村长彭局绅的鼎力支持，东奔西走，到处找赞助人和会员，搞得兴致勃勃。年底，他以“李萍画苑”及“艺术协会筹委会”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师生作品展览，他所展出的几幅油画，技巧、设色、布局、光线等等，竟是完美得令人惊叹不已！人虽然老了，宝刀不但犀利依旧，而且挥切砍劈，样样得手应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三年后，六十五岁的他，挟其万钧的笔力——雕塑、油画、水彩及粉画集于一身，毅然地离开了新山；他要到吉隆坡来举行生平第一次个展，他要到人文荟

萃的首都来广交画友，谁说不是他另一次艺术生命的开始？虽然是迟了，但是，却是炉火纯青的。欢迎你的来临。





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ri**,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1A, Bras Basah Complex, Block 231, Bain Street, Singapore 0718.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425764, 481806.